

牛虻文丛

# 路标与灵魂的拷问

袁伟时 著

我这个人，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说，是一只牛虻……这个国家好比一匹硕大的骏马，可是由于太大，行动迂缓不灵，需要一只牛虻叮叮它，使它的精神焕发起来。

——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

广东人民出版社

牛虻文丛

# 路标与灵魂的拷问

袁伟时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02655\*

责任编辑：余小华 钟永宁

封面设计：创 视

责任技编：黎碧霞

## 路标与灵魂的拷问

袁伟时 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韶关市金启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厂址：韶关市陵南路8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375印张 170,000字

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218-02823-3/D·303

定价：14.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 《牛虻文丛》序

袁伟时

知识似乎是与不安分结缘的。自从社会分化出知识界——在古代，是巫祝和史官，总会留下一些令人沮丧或奋起的种种问题。

专心致志从事专门学术研究的学人在本门学术内也是不安分的，否则不可能有新的建树和发明。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如此说来，国事、天下事，无一不在份内之列。可是，又有“思不出其位”的古训在，视野太宽，思虑过多，又有僭越之嫌了。

“天地之间，几案之侧，方何必皆中圭，圆何必皆中璧，斜何必皆中弦，直何必皆中墨。……皆名其名，皆形其形，是为好削成。大命以倾。”这是不屑“文格渐卑庸福近”<sup>①</sup>的龚自珍警世和自警的箴言。一切要求中规中矩，是使中华民族自我更新机制消磨殆尽的文化基因，而

---

<sup>①</sup> 《龚自珍全集》，第417、44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其余毒至今仍历历在目。

现代公民应该是有知识的。过去我们曾慷慨地把大学甚至高中毕业的人士统称为知识分子。可是，不少国家和地区，大学教育已进入普及阶段。思想日益走出浑沌的中国人，逐渐懂得专业技术人员及学人、文人、知识分子是趋向各异的社会群体。特别是有政治或金钱的权势在，就有帮闲或帮忙的文人，鲁迅早已为他们留下惟妙惟肖的画像。把他们混同于学人和知识分子是不准确的。知识分子的标志是既有知识，又有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勇于履行和维护公民的权利。

说人类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专家、学者不再贬称为毛。承认他们也是国家主人，至少在口头上恐怕没有多少人敢于反对了。与此同时，人们不应忘记，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的狂狷之士，他们的臧否评点是维护正气于不坠的重要因素。其思绪和作为至今仍为不少中国人所景仰，一些知识分子则在精神上与他们一脉相承。在尊重专业人士的同时，没有理由不为后者保留足够的自由空间。

自古以来，西方的思想和言论自由空间通常比东方大。决定性的因素是社会结构的差异，但也受益于生动地体现在苏格拉底身上的知识阶层的两个传统：

一是理性地自由论辩。智慧与愚昧、是与非、善与恶……都在论难与思考中逐步澄清，不断冲破有形无形的思想牢笼。

另一是维护个体的独立和尊严，以批判的眼光看待一切。用苏格拉底的话来说是：“我这个人，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说，是一只牛虻……这个国家好比一匹硕大的骏马，可是由于太大，行动迂缓不灵，需要一只牛虻叮叮它，使它的精神焕发起来。”<sup>①</sup> 即使在最神圣的集体——国家面前，也拒绝翩翩起舞，而是爱之深、恨之切，揭疵斥秽，充分显示自由公民的权利和尊严。

东西方的优秀传统都应继承。没有完美无缺的人，也没有止于至善的社会，任何事物都要不断推陈出新。正因如此，一个健全的社会，总是需要为数众多的牛虻，鞭笞黑暗，揭露污秽。人们向往文明、自由、民主、法治、富强、有序进化的社会，其不可或缺的因素是在分权制约的社会架构下，有遍布各领域的强大的知识分子群体自觉不自觉地承担着牛虻的职责。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辈虽胸无大志，但对邪恶和奸佞免不了有几分愤慨和蔑视；对公共领域的种种问题也不时有些感想。于是，在治学之余或在学术文章之中，也偶尔对此类事物发点议论。同好有日多之势，感兴趣的读者估计也颇众，这个文丛由是诞生，略寓以文会友之意。

1998年6月23日于广州

中山大学

---

① 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

## 目 录

《牛虻文丛》序·····	袁伟时 (1)
讲真话·民族自省·学术遭遇·····	(1)
林则徐·岭南文化·学术尊严·····	(14)
曾国藩·马克思·毛泽东·····	(29)
两次世纪之交大改革的若干交叉点·····	(40)
近代中国研究：一论独霸到三派鼎立·····	(56)
改善学术文化发展的社会环境	
——答《开放时代》记者曾德雄·····	(68)
建立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心态	
——敬复李慎之先生·····	(78)
学术的尊严与学者的自尊	
——“百家争鸣”40年祭·····	(99)
人文精神在中国：从根救起·····	(108)

## 文化与伦理

——答《人民日报》记者…………… (127)

## “文化中国”若干问题

——与杜维明教授对话…………… (135)

历史与理论…………… (152)

借鉴香港，建设特区文化…………… (164)

开放国度的封闭群体…………… (169)

你无法不面对顾准…………… (173)

## 企盼学派崛起与回归五四

——答《南方周末》记者谭庭浩…………… (184)

推荐三部好书…………… (190)

## 寻求现代社会的共同性

——我看黄仁宇的“大历史”…………… (193)

## 路标与灵魂的拷问

——读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 (203)

## 中国现代化的陷阱在哪里？

——再读《现代化的陷阱》…………… (213)

## 个人主义的无罪辩护

——读钱满素的《爱默生与中国——三对个人

主义的反思》…………… (217)

这些官员和报刊的法治观念到哪里去了？…………… (235)

闲话“实事求是”与“蠢蠢欲动”…………… (238)

编后余绪…………… (254)



## 讲真话·民族自省·学术遭遇

---

史学要不要讲真话？这大约是一个相当荒唐可笑的问题。尽管史家们已认识到要完全弄清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不可能的，但这不等于人们在历史研究中可以说假话。不过，咱们国情独特，其中之一是公不公，私不私，这样一来，可闹得学术界颇不安宁。

中国的父母们大都反复教育自己的孩子要诚实。这当然是对的。但是，这并不等于事事都要对父母说，孩子不能保留自己的私人空间。一向对个人的独立自主理解不够的同胞，在这方面便弄出不少怪事。比如，官员们以“父母官”自

居，要子民“以国为家”，对所辖地区或单位中百姓的一切“无微不至”地“关怀”，于是，以打小报告争宠求荣之辈应运而生，践踏公民权利的悲剧就连绵不断了。对那些习惯化私为公的中国人，听听昆德拉的一段话也许不无好处：“请注意：摩西在归纳上帝的十诫时没有包括‘汝不得说谎’！这并非偶然！……上帝没有给人以非要别人回答的权力。如果我们平等待人，那就绝不能对别人用‘不许说谎’、‘照实说来’一类字眼。”在时时事事都要如实“汇报”、“交心”的威胁下，人们不可能自由思想、自由交谈，必然“变成了一群智力上永远不会成熟的可怜虫”<sup>①</sup>。与宋明假道学一脉相承的“狠斗私心一刹那”和所谓“革命大批判”造就了多少讲假话、大话、空话的“先进”、“优秀”人物，不但令真诚期望后辈诚实的父母摇头叹息，其戕害民族生机的后果更是难以数计的。

学术是公器，理应让学者自由参与，却偏偏化公为私，一言九鼎。查语录、看风向、对口径代替了诚实、刻苦的研究，连绵不断的假大空对人文与社会科学糟蹋，制造了多少不堪卒读的所谓“学术著作”，乃至什么“重大学术成果”，特别是自苏联移入，而与中国古老传统相结合至今仍不时可以看到的怪胎——含血喷人的“革命大批判”！

从70年代末开始的史学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变

---

<sup>①</sup> 《不朽》第107~108页，作家出版社。

革，很大程度上是从重新厘定公私界线，重新做好研究的基础工作开始的。这个变革的基本特征是求实。作为一直注视和参与这一过程的一员，看了新近出版的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后，涌向心头的是“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欢快和感慨。这不但是对又一杰出史家脱颖而出的欣喜，而且庆幸中国近代史研究终于走上在严格遵守学术规范的基础上求真、求新的正轨。

二百年来，影响中国历史行程的最大事件莫过于鸦片战争。人们所说、所写、所绘不知凡几，但关于这次战争的有些最基本的情况却淹没在史实与神话交织的烟雾中。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内部存在严禁派与弛禁派的斗争吗？促使道光帝下令严禁鸦片的是林则徐吗？当时的广州有叫做“平英团”的组织吗？三元里民众曾歼灭数以百计的英国侵略者吗？琦善是不是卖国贼，他有没有陷害过林则徐，关天培之死和虎门战败是他的过失吗？吴淞之战失败、陈化成战死是两江总督、“投降派”牛鉴的罪过吗？战争中清廷内部有没有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斗争？是不是坚决依靠林则徐等人，中国就有可能打赢？……

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不”，19—20 世纪的中国人从背着书包上学堂之日起反复接受的有关观念就会受到全面的冲击。而《天朝的崩溃》的作者恰恰毫不留情地向传统的错误观念挑战，坚定地说了一个“不”字。

这是一记当头棒喝，令人震撼的不仅是它的结论，影响更深远的是它的方法。作者考虑和研究了 10 年，对中

国和国外的史料——重新梳理；对现有论著中的结论——重新审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冷峻严谨，拒绝个人情感的臆入。现代史学传入并在中国逐步生根已经超过百年。这些方法本来是治学 ABC。作者追求的不是方法上的创新，而是遵循治学的常规，求实据，说实话，实实在在做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学术研究。这是从 70 年代末开始的史学研究变革的主要特征之一。十多年来人们一再呼吁解放思想，实质就是反对以种种堂皇的借口去歪曲事实，实事求是地认识客观世界。不幸，由于错误思潮根深柢固，这种实话史学常常招致奇怪的非议乃至沉重的压力。现在，又一部巨著摆到书架上，无论是它所吸收的前人的成果或新的结论都有经过认真考辨的史料为根据。一幅鸦片战争的全景图清晰地展示在人们面前。只要在学术领域中讨论这次战争，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你都无法绕过它。后来者要否定它的结论，只能和它的作者一样从梳理史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开始，任何空言都无补于事。这是非常平常和正常的史学研究方法。可是，由于史坛多年流行“以论带史”、以抄代著和有意无意歪曲或割裂史料的恶习，一部部实实在在的学术著作便成了抗击那些逆流的堤坝和回到学术正轨的路标。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来说，茅海建虽不是开风气之先的第一人，他的前辈和同辈史家中已经有一些拿出过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但有了他的成功，必有更多的后来者。支流、潜流必然汇合为波逐浪涌的洪流。这个学风转变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茅海建的成功不仅在于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还由于他的深邃的思想。如果仅有前者，终究逃不脱匠气，不可能成为卓越的史家。他的史识高超之处在于一直紧紧抓住一个基点：一贯沿用的坏人当道、好人遭厄的“忠奸模式”不能解释鸦片战争的必然失败，“正是让‘奸臣们’承担了本应由中国旧体制承担的责任”<sup>①</sup>，“鸦片战争的真意义，就是用火与剑的形式，告诉中国人的使命：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合世界之潮流”。<sup>②</sup>换句话说，是否有利于改革中世纪的旧体制和推进近代化事业是臧否人物、评论史事的最高准则。这个基本点的确认不但对鸦片战争而且对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师夷长技”、办洋务、改良、维新、行新政、革命都是手段。有利于改革旧体制、推进近代化，即使是改良，也有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福祉。革命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最后手段，其代价是社会进步必须付出的成本。可是，如果与走出中世纪，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背道而驰，就是血流成河，也不是真正的革命，亦不应盲目歌颂。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但中国大陆的近代史学界不知为此浪费了多少笔墨！30年后新一代的史家翻检这些材料很可能会说：“这些爷们真蠢，争论的尽是常识！”但今天茅海建把这个观点作为贯串全书的指导思想却是十分高明的一着。

①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第19页，三联书店1995年版。

②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第25页，三联书店1995年版。

正确的思想观点能够提纲挈领涵盖全局。反对随意涂抹历史的忠奸理论，着眼于当时的制度和文化，对鸦片战争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不愧是知本之言。

正因为抓住了根本，《天朝》对皇帝及其文武大臣和山野草民行为方式的剖析成了全书最具特色的笔墨。20世纪的中国人都痛骂帝国主义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可是，这是当时大清帝国的统治者主动拱手送给英国侵略者的。悲剧酿成于文化差异。“在西方，商业活动已不再受官方的具体管制，商人只需遵从法律即可；”而在中国，“每一个人都都在官府治理的网络之中，很难想象脱离这种治理之民。国家设官治民。既然中国官府无法治理这些英人，把他们交由英国官府来治理也不失为一种办法。”<sup>①</sup>愚昧的钦差，就是这样顺理成章照会约翰牛，申明如有交涉狱讼之事“英商归英国自理，内人由内地惩办，俾免衅端”<sup>②</sup>。要是说上述意见仍是一种分析性的探测的话，那么，费正清在他最后的著作《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中，则以确凿史料证明，这些国家主权的丧失不是始于中英江宁条约。1835年处理浩罕入侵喀什噶尔的行政协定乃至中古时代对阿拉伯等商人的管理，早已确立了这样的模式。<sup>③</sup>不敢正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弱点，就无法揭示这些

① 《天朝的崩溃》第497页。

② 《天朝的崩溃》第494页。

③ 《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第215-216、218、221页，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版。

奇特现象的谜底。

人们至今仍然衷于歌颂三元里人民的爱国主义。但作者却直率地告诉读者：“我以为，三元里民众抗英斗争，无疑是一件值得百年称颂的事件，但将之提升至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精神展现，则脱离了当时的时代。”“在鸦片战争以及后来的诸次列强侵华战争中，绝大多数民众的态度，是置身事外。”<sup>①</sup>“三元里等处民众进行的是一次保卫家园的战斗，而不是投身于一场保卫祖国的战争。”<sup>②</sup>

人的行为方式不能不受特定社会的文化状况制约，清帝国的臣民也不例外。林则徐、琦善、耆英……和所在皆有的顺民和旁观者都是中国传统文化造就出来的。读来令人痛心，但与某些文化明星编制的华彩乐章相比，要实在和可靠得多。文化本来是历史的产物，让文化回到历史特别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中去，摒弃无根游谈，也许有助于在思想文化领域中清除泡沫，留下更多结结实实的成果。

作者过人的史识还在于把民族自省规定为史学的基本任务。“我们的历史中看得最少的是，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究竟犯了哪些错误，尽管历史已经明白无误地说明，我们犯过错误。”“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所谓‘以史为鉴’，正是面对错误。”<sup>③</sup>“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自我批判，正是它避免重蹈历史

① 《天朝的崩溃》第313页。

② 《天朝的崩溃》第313页。

③ 《天朝的崩溃》第25页。

覆辙的坚实保证。”<sup>①</sup>真是掷地有声，发人深省。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有如此清醒见识的不多见。其实，这是中外哲人一再强调的重要见解。“殷鉴不远”，中国传统文化一再强调的“以史为鉴”，最重要的就是以近代史为镜子，避免重蹈覆辙。当代法国年鉴学派巨子雅克·勒高夫也断言：“拒不思考历史的民族、社会和个人是不幸的，同历史遗忘症引起的伤害相比，往昔的创伤微不足道。”<sup>②</sup>

近代中国有一个特殊情况：中国是被侵略者，总的说来是正义的一方，而列强是非正义的侵略者。晚清的官绅和20世纪的一些知识分子，往往以此为理由把肯定西方和检讨本国弱点或错误的言论视作大逆不道。出现这个思想迷误的原因，在于忘记了中国除了反对侵略维护自己的主权外，还要学习外来的先进文化和反对本国的中世纪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而有识之士肯定的恰恰是西方的先进文化，对本国的抨击也是那些应该抨击的中世纪专制主义的黑暗和愚昧。历史已经证明，说这些话的人，通常都对中西文化有比较深切的了解，而又急切地期望自己的祖国走出黑暗。“先走一步就是异端。”<sup>③</sup>因这类言论一再遭受流俗痛诋的郭嵩焘、胡适、鲁迅等人都是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留下了光辉足迹的杰出爱国者。

① 《天朝的崩溃》第26页。

② 《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4期第91页。

③ 陈旭麓：《浮想录》，《陈旭麓学术文存》第1348页。



这些有深切民族自省精神的先驱者所以不被理解甚至被诅咒为“汉奸”、“买办”，重要原因之一是有些人陷入了狭隘民族主义的泥淖。被侮辱、被损害激起反抗，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无论个人还是民族，成熟的标志是从情绪化走向理智。这就要求在观察和处理事关国运的大事时要有世界全局的认识和眼光。用先驱者的话来说，这叫“世界人”意识。

上一世纪的最后一年，在第一次奔赴美国的旅途中，梁启超写下这么一段话：“余盖完全无缺不带杂质之乡人也。曾几何时，为十九世纪世界大风潮之势力所簸荡、所冲击、所驱遣，乃使我不得不为国人焉。浸假将使我不得不为世界人焉。……既生于此国，义固不可不为国人。既生于此世界，义固不可不为世界人。”<sup>①</sup> 在任公看来，乡人一国人一世界人，乃文化思想升华的三个阶段，是现时代中国人发展的历史，又是无可逃避的责任。

事隔 18 年，这个中国人一世界人的问题又一次被提出。说话的是鲁迅：“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我以为‘中国人’这名目，决不会消灭；只要人种还在，总是中国人，……但是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得住脚：这事极须劳力费心。……有人说：‘我

---

<sup>①</sup> 《汗漫录》，《清议报》第 35 册。

们要特别生长；不然，何以为中国人！’于是乎要从‘世界人’中挤出。”<sup>①</sup>

什么是“世界人”？也许可以简单地界定为：具有世界历史和现状的基本知识和摆脱了狭隘民族主义的人。在健全的教育制度下，一个高中毕业生不难达到这样的水平。一个民族只有多数成员具有这样的素质，才是真正的现代民族。“文化大革命”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是“胸怀世界”，那时的权威诠释是“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未解放”，要不断造反，直至造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不幸，当世界经济统计资料不再保密，人们稍加比较才恍然大悟，咱们这个泱泱大国要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至少还要埋头苦干50年，而且要老老实实学习别人的长处，不再花里胡哨吹出那么多“世界第一”才行。

“世界人”意识的养成实质是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过程。整个国家的经济能否达到和保持世界发展的平均水平以上并融入全球一体化的大潮之中是决定这个过程成败的基础。健全的教育和思想文化环境亦是重要的动力。两者互为因果。生为中国人的困难在于来到这个世界之日起，就被一套完整的思想文化体系所笼罩，而这个体系的基石是以本民族为中心的“天朝意识”。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不冲决这个思想罗网，要如实地认识世界、认识本国只是

---

<sup>①</sup> 《热风·随感录三十六》。

一句空话，更谈不上正确处理本国与外国的关系。有位年轻学者说得好：“中国人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世界主义化过程。”<sup>①</sup>

茅海建的史识归根到一点，就是有从世界历史发展全局去观察中国命运的眼光。这种眼光历来是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现代爱国主义赖以滋生的思想基础。它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与忧患意识是融为一体的。王韬漫游欧洲后才吹响近代中国第一支启蒙号角——《循环日报》。黄遵宪、薛福成、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是以批评中国的落后为自己救国活动的起点。这绝对不是给中国人“抹黑”，也与某些人罔顾事实的恶意诽谤迥异。茅海建的史识是与这些先进中国人的思想一脉相承的。杰出史家的力作必然是“有思想的学术”。大多数读者很可能会和我一样，为《天朝》一书学术与思想交融的强烈震撼力而激动和沉思。

这部书从社会形态——制度与思想文化去剖析历史，是与马克思的史学思想完全一致的。更令我震惊的是它与马克思对鸦片战争的直接论述也有那么多的共同点。马老先生毫不含糊地谴责英国进行侵略中国的不义战争和侵略者的残暴。与此同时，他指出“当时人民静观事变，让皇帝的军队去与侵略者作战，而在遭受失败以后，抱着东方

---

① 曲一日：《鲁迅“世界人”概念漫议》，《现代与传统》第八辑。

宿命论的态度服从了敌人的暴力”<sup>①</sup>。这与《天朝》一书中对民众态度的分析如出一辙。对于这场战争的总态势，他说得更加尖锐：“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sup>②</sup> 在他老人家眼中当时的中国和中国是“半野蛮人”和“陈腐世界”，而侵略者却是“文明人”和“最现代社会的代表”！这决非一时失言的论断表明，《天朝》的思路和贯彻始终的民族自省精神，包括对清帝国官方的愚昧和制度缺陷及文化弊端的揭露都可以在马氏论著中找到端倪。作者没有从语录出发，得出的结论却与马克思的思想呼应。窃以为其中的奥秘在于两人都实事求是地对这件大事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茅海建把他的巨著献给他的导师陈旭麓教授。这是一份十分恰当的厚礼。陈门弟子中前有熊月之写出堪称一流的《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现在茅海建又有如此非凡的成就，看来不是偶然的。陈先

---

① 《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

② 《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页。

生的遗言中就有这样的名句：“民族主义是动物界的群居本能的升华，‘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和‘血浓于水’都是本能而不是理性的表现。”“中国人的‘天朝意识’和‘世界意识’的互为消长，是闭关与开放的两重奏。”<sup>①</sup>茅海建有这样的明师熏陶，十分幸运。陈先生是当代中国最有成就的史家之一，却一再遭受非学术的阻力和压力，他的光彩照人的 653 条《浮想录》也只好留待身后公布。

1996 年 2 月 15 日

---

① 《陈旭麓学术文存》第 1357、1355 页。

## 林则徐·岭南文化·学术尊严

90年代又见文化热：文章多，会议多，名目多（中西文化、中国文化、地区文化、校园文化……乃至饮食文化），会长也多。五彩缤纷，目不暇接。是喜是忧，众说纷纭。但方家杰士大概都会同意，培育正常的文化学术环境，让人们自由评点，放言争议，必有助于激浊扬清，百舸竞进。

笔者不敏，近年涉足文化讨论，亦有一二感慨。野人献曝，略抒所见。窃以为治学尤其是治史必须有根有据，切忌信口开河。大哉文化，亦不妨由两件小事略窥其秘。

### 林则徐纪念馆《前言》风波说明什么

翻开3月28日的《光明日报》，第二版头条以“展出面积缩小，《前言》错讹频出，不该如此整修林则徐纪念馆”的大字标题登出一条该报的专讯。一口气读完，可令我吃惊和苦笑不已。请先看看《前言》如何“错讹频出”。

展厅《前言》约300字，差错至少10处以上。《前言》中数字大写与小写混用，繁体字与简体字混用，……《前言》中的差错以“师敌之长技以制敌”一句为最。这句林则徐名言原文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辞海》对夷字解为外族为外国人。林则徐的名言体现了可贵的开放思想。把“夷”错为“敌”，一字之差，谬之千里。

这个专讯还列举了《前言》的错字、漏字，加上引文中指出的用字不合规范等等，错误确实不少。

不过，被该报指摘“为最”的差错——“师敌之长技以制敌”却有书为证是林则徐的名言。这书是《道光洋艘征抚记》，原文如下：“先是林则徐奏言：‘自六月以来，各国洋船愤贸易为英人所阻，咸言英人若久不归，亦必回国各调兵船来与讲理，正可以敌攻敌，中国造船铸炮，至

多不过三百万，即可师敌之长技以制敌’”。<sup>①</sup> 迄今为止，没有找到林则徐这个奏折；《道光洋艘征抚记》的作者是谁尚有争议，记载亦不尽准确，前人已有订正。尽管如此，《前言》作者引用这句话总算有些根据，已为歌颂民族英雄煞费苦心。

至于“师夷长技以制夷”，那是出自魏源《海国图志》的《叙》和《筹海篇》<sup>②</sup>，这也是确凿无疑的。笔者孤陋寡闻，仅在1990年于广州举行的纪念鸦片战争1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看到有篇论文（论文题和作者姓名均已忘记），说这句话最早出自林则徐笔下，并注明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某卷某叶。会后，即借来这部权威的资料书，不但该卷该叶不见这一名言，其他卷叶亦无影踪。仍放心不下，向长期研究林则徐的陈胜彝教授请教，亦云没有史料证明这句话出自林公。

综上所述可以肯定，《前言》的作者没错（抄写有误是另一回事），编发这个专讯的《光明日报》和《福建日报》记者却出现了用心良好的知识性错误。没有必要苛责某一个人。就个人而言，可能性之一是优秀记者的一时疏忽。如果把它当作特定时期的文化现象去思考，这一失误则包含着一些值得人们重视的信息。

按照中国现行程序，这一尖锐的批评稿出现在报端，

① 见《魏源集》，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77页。

② 见《魏源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6、869页。



至少要过五关。

一是作者觉得有问题，立意写稿。

二是被批评者——纪念馆对记者的解释。记者有疑问，一定会向馆方询问。该馆的馆长或有关人员不但天天对着错字、漏字视而不见，而且对《前言》的主要观点之一不知道有什么根据，无法为本馆的正确方面辩解。

过了以上两关，稿子到了报社，还有三个关口：版面编辑——总编室——值班总编。

在中国，魏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出现频率很高的一句名言，读过中国近代史入门书的大学生通常都耳熟能详。有人认为出自另一名人之口，居然过五关，斩六将，顺风顺水。尤为值得重视的是此事竟发生在海内外有重大影响的中央级大报。任何报刊错误都在所难免，有的且有不得已的苦衷，读者应该理解和谅解。不少报刊也雍容大度，鼓励求疵揭短。笔者对此事的兴趣，则是由它与文化的关系引起的。

作为大众传媒的报刊，其功能之一是把学术成果的信息带给大众。无论挂在纪念馆墙上的《前言》还是记者笔下的专讯，其主要论点按常理都不是馆长或记者自己想出来的，通常都能在一些学者的论文中找到根据。作为学术动态的报导，自然可以罗列不同观点，不作价值判断。而作出明确是非判断的新闻，却体现着某种文化心态。

首先是对不同的学术观点要不要存疑，要不要查证？这当中就有中西文化问题。以理性化为主流的现代西方文

化，事事存疑求证已成了颇为普及的大众思维习惯。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虽然也可找到怀疑精神，但主流却是维护圣人和经典的权威。流风所及，生活在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仍有不少还没有养成寻根问底的理性态度。以这个《前言》风波来说，五关六将中只要有一人认真查询一番就不可能出现；万一出现了，如果有健全的文化氛围——以求真务实为尚，真正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很快也会得到纠正（不幸，一个多月过去了，还未见该报更正）。

进一步探究，这个风波还蕴含着一种圣贤崇拜的盲目文化心态。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或圣贤，但对待英雄的态度却随文化心态而异。在现代西方，圣者也是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圣者却是神。“圣者，通也，道也，声也。道无所不通，明无所不照，闻声知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这是《白虎通义》给圣人所下的定义。简单说来就是无所不知，崇高伟大，无一瑕疵；芸芸众生合当顶礼膜拜。林则徐是民族英雄，也就是圣贤。在一些人看来，对这类人物唯一正确的态度是歌颂，如果在肯定之余也有否定，轻则不合时宜，重则大逆不道。林则徐有没有开放、改革思想，这本来是个事实判断的问题。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两位记者热衷于肯定林则徐的开放思想而不问是否可靠就毫不奇怪了。而经过切实研究而得出的对英雄人物的失误的批评，我们的一些传媒不一定知道；即使知道了，也不一定感兴趣，更不用说如实地传播了。早在60年前，著名史家蒋廷黻已

指摘林则徐“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sup>①</sup>。但这些话很不中听，骂一声“买办文人”便足以把作者连人带学术一笔抹煞，尽管正牌汉奸周作人灵前倒至今香火鼎盛。

### 法国学者如何研究岭南文化

在进一步讨论有关问题以前，不妨再看一看一位法国学者是怎样着手研究岭南文化的。

去年9、10月间，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杜瑞乐（Joel Thoraval）先生约见，要听听我对岭南文化的意见。一个洋人对这样的问题感兴趣，有点奇怪。经过几个小时无拘无束地交换意见，留下了一些深刻的印象。

他着重提出的问题之一是：有没有岭南文化？如果有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表明他是一个受过现代学术研究训练的严肃学者。在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领域，任何研究课题的确立，都应考察问题的真假。1949年以来的教训之一是：我国这些领域的学者在假问题上花费了大量时间乃至毕生精力，因而许多所谓论著不过是一堆印刷垃圾。走出泥淖的唯一途径，是学者要敢于自问，自己研究的是不是经得起反驳和讨论的真问题？按我的理解，岭南文化可以从两个角度界定，一是按地域原则，即岭南地区的文化或各种文化在岭南地区的状况。如以此为

<sup>①</sup>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6页。

主要原则，岭南文化这个概念当然可以确立。人与文化是一体两面，文化素质只有高低之分，与文化绝缘的不是人。按照这个原则也不存在形成的时间问题，从岭南有人类活动开始，就有了岭南地区的文化。二是按形态原则，即中华文化系统中在岭南地区形成的有自己鲜明特点的亚文化形态。从后一说，“岭南文化”这个概念能否成立便大有讨论的余地了。

文化有大传统、小传统。大传统主要体现在典籍上。比较高级的文化形态都有自己的大传统。那么，岭南地区有没有形成有自己特色的大传统？古代岭南骄人的典籍有慧能的《坛经》、陈献章的理学著作，写《抱朴子》的葛洪也曾在岭南生活。问题是这些著作与岭南有什么关系，有哪些岭南特色，在后来的岭南文化发展中他们的思想有没有融入当地，成为地方文化独具的特征？这些都是很难简单肯定的问题。上述著作代表的禅宗、道家和理学在岭南都有长期衰落甚至出现断层的现象。

也许可以把岭南文化的形成期推迟至 19 世纪 90 年代以后，那时康、梁、孙文相继登上历史舞台，上述难题似可迎刃而解。可是，这也有所难言。一是与全国的文化发展重叠，粤味不浓。二是他们的文化取向大体是西体中用，以西为主，吸收中国传统文化资源，除康外，中味颇淡，这与弘扬传统文化的初衷并不吻合。三是为时不长，上下限相距不过 30 年左右（1895—1925），不久便黯然失色。

小传统又如何呢？小传统主要是民俗。除了苗、瑶等少数民族外，岭南地区居民主要属三大语系。闽南语系的潮汕地区居民与福建、台湾的同语系民众的共同点显然多于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广州语系同胞。客家文化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要描绘三大语系居民小传统共同构成的岭南文化特色，大手笔恐怕也要喟叹难，难，难！只写广州语系的状况又不免以偏概全。

杜瑞乐先生着重提出的另一问题是“岭南文化”这个概念是何时、何人首先提出的。这又一次显示了他的学者风范。按国际惯例，一个学术问题的研究必须有学术史的考察。他是按这个规矩办事的，不过，我从来对系统研究岭南文化兴趣不浓，应《现代与传统》编者之邀写过两篇文章<sup>①</sup>，不过是自己主要研究方向的副产品，提出了岭南文化范围的界定，在肯定岭南主流文化的开放性（以 12 事为证）的同时，以确凿史料从 8 个方面着重论证了近代岭南主流文化的封闭性，居然引起一场茶杯中的风暴，给后来的真诚研究者留下足资思考的问题和材料，已经十分开心和满足，对他提出的问题无法提出确解。我能做到的只是向他介绍两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学术资料。

第一件是梁启超写于 1924 年的《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此文有两个基本观点：一是“吾粤自明之中叶，陈白沙、湛甘泉以理学倡，时称新会学派，与姚江并名，厥

<sup>①</sup> 见《现代与传统》第一辑、第四辑。

后寝衰矣”。二是19世纪初，阮元任两广总督，办学海堂，是广东学术文化的转折点，其后出现陈澧、朱次琦两大师，前者“善考证，学风大类皖南及维扬”。后者“言理学及经世之务，学风微近浙东。然其大旨皆归于沟通汉宋，盖阮先生之教也。”<sup>①</sup>

这表明，博学如梁启超在20年代，仍认为粤学或与其他全国性学派（如白沙学与姚江即阳明学）齐名，或是某一全国流派的支流（如清代），没有形成独特的所谓岭南文化。

第二件是冯炳奎著的《中国文化与岭南文化》<sup>②</sup>。这部书收集的主要是着眼大众的演讲稿，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谈到他在本世纪30年代已经在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开设岭南文化课程。二是眼下流行的岭南文化具有开放性等等概括，该书大体都已提到。不过，我个人对他的不少提法不太信服。例如他说，“自陈白沙五百年来淡声华，薄荣利，闾修独行，抗节振世，为岭南一贯学风。所以，近世岭南学者，以讲学抗考据，以经世抗浮文，自成一种风气。”<sup>③</sup>首先是陈白沙以降五百年间，固然同全国各地一样可以找到“淡声华，薄荣利”的人物，同时也不乏热衷仕进之徒。至于说到近世岭南学风，领袖群伦的陈澧就以考据著称，这有大量遗著为证。说到经世致用的学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一，第78-79页。

② 《中国文化与岭南文化》，台湾中兴大学法商学院1962年版。

③ 《中国文化与岭南文化》，第10页。

风，嘉庆、道光年间已逐步在全国兴起，而其主要代表人物却与岭南无关<sup>①</sup>。且正如笔者在三年前所指出，鸦片战争后几十年内，岭南地区的学者在经世致用上有很大的不足，以至《海国图志》这样的纪念碑式的著作不可能出自他们之手<sup>②</sup>。

这部书经不起认真推敲并不奇怪。作者在书中谈到，他是在为国民党政府做侨务工作时，为引导侨胞爱国爱乡而大谈中国文化和岭南文化的。功利的追求与学术的严谨颇难统一。宣传材料与学术论著本来有别，虽然前者乐于打扮成后者。

外国学者那么认真研究笔者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文化，令人汗颜，也引人深思。

### 确立学术的尊严

无论从哪个意义上看，上面说的都是很快就会被遗忘的小事。但见微知著，如果愿意从中汲取一点有益的东西，却不妨从更广阔背景下再申说几句。

这两件小事其实可以归结到一点：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有关工作中如何严格遵循理性精神。现代化的实现是理性化的过程，这是学术界早就广泛接受的观点。尽管有来自后现代主义等的不同声音，但冷静的观察者大都仍

① 参阅拙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海天出版社 1992 年版。

② 《历史大转折中的迟滞》，《现代与传统》第一辑。

在坚持这个主流观点。就中国的现状而言，这更是必须攀登的高峰。这里包含着思维方法的变革问题。对从事自然科学和技术工作的人们说来，以理性精神分析一切，那是不言而喻的。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本应心同理同，实际生活中则一再被扭曲。原因何在？

1979年，笔者有幸在京参加“五四”60周年讨论会。会议印发了张志新烈士的材料，邓力群为此在大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长篇发言。至今仍记得的一句话是：“我们都是吃狼奶长大的！”真是可圈可点的名言。它一语道破了几十年间我国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症结所在。理性精神不能贯串其中，无论是无意中的悖离还是某些人蓄意践踏，都体现了我国这些领域人才培育和成长机制的弊端。

按我的理解，这汨汨流入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心田的“狼奶”主要是极端教条式的以阶级斗争分析一切，统率一切。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极为严重的问题：

首先，出现了拒绝接受一大部分中外优秀文化遗产的巨大失误。“封、资、修”，“糖衣裹着的砒霜”，这是多年来流行的对中外文化学术成果的蔑称。在这种盲目藐视一切的心态指导下，我们的教师编出一部又一部战斗性很强而知识性不足的讲义和教科书，而大学生们又大都满足于在其中打转。于是，在大学文科教师和学生中没有读过中西主要文化典籍的比比皆是；研究和学习自然科学与技术的教师和学生不了解中外文化发展概况，不知古希腊、罗马和先秦唐宋文化为何物更视为理所当然。



其次，在狼奶哺育下，几十年间毕业的文科和社会科学学生普遍安于在与西方文化隔绝的状态下生活。外语水平低下，不少人丧失了直接阅读外国书的能力；文化封闭政策加上资金短缺，即使懂外文也缺少阅读材料；再加上过于强烈的阶级斗争观念，有的人即使读外国书也把注意力集中在寻找应予批判的材料上。于是，弥漫我们祖国的是不愿也无力与外国学术文化对话的奇特氛围。不少人知识面很窄却又以为自己掌握了世界上最革命最科学的理论；甚至在一些人中出现了以斥骂西方文化调门的高低定立场坚定程度的义和团情结。

再次，由于以“批判资产阶级”为尚，许多教师和学生没有受到严格的学术工作训练，也不知道写学术文章或牵涉学术的工作应该遵守哪些最基本的学术规范，更缺乏现代公民应有的尊重不同观点、对话必须平等的起码素养。于是，一些现象在中国泛滥不但不以为怪反而受到鼓励乃至奖励。例如，“天下文章一大抄”，无视前人成果，不分抄袭还是自己的研究成果，不作学术史的考查，尽管前人发表的有关论著不知凡几，仍胆敢宣称自己的书是前无古人，举世无双！又如，不愿老老实实地从学术研究的最基础工作做起，以观颜察色、闻风辨味的机巧代替艰苦的研究，自以为找到目标后，肆意歪曲别人的观点，严厉批判，以表自己确有无可比拟的价值和功劳。再如，以“批判”者或“引导”者自居，把学术与政治、讨论与训斥搅成一团，即使给对方发言的机会，也不过略示“宽

容”，树立“对立面”，根本不知道一进入学术领域，任何人都没有特权，所有讨论都必须自由、平等地进行；也不知道文明人必须自觉遵守一条规则：即使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观点，也坚决维护你发言的权利。

进入 80 年代以后，好些知识分子痛苦地看到，中国不但自然科学与技术落后，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也落在别人后面很远。他们觉醒后回到扎扎实实地进行学术研究的正确轨道上来，献出了大小不等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学术成果。可是，由于历史的惰性和旧体制的改革远未完成，不少人仍然自觉、不自觉和程度不等地在旧轨道上滑行，由此引发了学术文化领域一系列怪现象。直至 90 年代，一些报刊仍不时发表一些令人生厌的“革命大批判”遗风洋溢的文章就是其中之一。

显然，不切断“狼奶”，彻底肃清“左”毒和愚昧，思想文化领域就会怪事不断。说到底，“左”也是愚昧的一种表现形式，以野蛮和无知去践踏文明和知识。

告别愚昧，必须从普及教育开始，让 12 亿中国人真正具有现代公民应有的素质，否则，一有缝隙和机会就会喷出无知的岩浆。

可是，肩负历史重任的教育本身首先应该是现代的。知识固然应该能适应当今世界的需要，精神上更应该用世界（包括中国）文明发展至今天已被公众认可的价值观念去陶冶中国人的灵魂，把中华民族的成员培养成为尊重自己、尊重别人、遵守法纪、自强不息的现代公民，而不是

暴徒与奴才的奇异组合。

总之，要培育和维护知识——理性的尊严。知识只能来自切实的学习和研究。在知识王国容不得半点无知的放肆。今年1月13日，37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在《光明日报》发表《正确评价基础研究成果》的重要声明，尖锐地指出：“当前我国科学界的一种不正之风，就是一旦取得一些成果……首先用夸张的语言向领导报喜，一旦通过领导批准，就迫不及待地通过新闻媒介广泛宣传，取得廉价的新闻价值，以此为谋取名利的手段。这不是严肃的科学态度，也不是一个正派的科学家所应该做的”。“但是科学是严肃的，时间是无情的，这些被吹捧上天的工作现在绝大多数都已成为过眼烟云，昔日的宣传徒然成为人们偶而提及的笑柄而已”。

不过，知识本身有自己的尊严。泡沫和污秽最终只能在制造者自己的身上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记。而坚实的研究成果也一定会在历史画卷中留下应有的光辉。文化的基础是学术。没有学术的正常发展，文化的发展会成为无本之木，许多中国人热切期望的中国文化复兴就会化为泡影。根据我国的特殊情况，很有必要在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宣传、文化、教育部门的干部中进行解释，什么是世界公认的学术规范——学术工作必须遵循的规则，尊重37位院士的呼吁，在学术是非问题上“避免行政干预”，真正落实百家争鸣的方针，不要再在世界文明史上制造令中国人蒙羞的笑柄。这是减少思想文化领域失误的不可缺少的一



课，也是振兴中华文化的第一步。

1996年5月8日

此文发表在1996年10月1日广州出版的《东方文化》1996年第5期（总第16期）上，并由《新华文摘》转载于1997年第1期。还要补充说明几点：①在清代，夷字带有贬义，不但在国内引起夷夏之辨的许多是非，还带来外交纠纷；而敌字倒含有平等的“敌体”之意。这些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常识。曾国藩有个奏折就是这样写的：“然当日（指康熙年间）与俄罗斯议界、通市，实系以敌国之礼待之，与以属藩之礼待高丽者迥不相同。道光、咸丰以来，待英、法、米三国，皆仿康熙待俄国之例，视同敌体。盖圣朝修德柔远，本不欲胥七万里之外洋而悉臣服之也。”<sup>①</sup>②继岳麓书社之后，东方出版社又于今年把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收入“民国学术经典丛书”大量印行。学术的光芒总是难于掩盖，历史又一次按自己的逻辑前进。但应说明的是，书中好些观点笔者是不同意的。

1996年10月21日附记

<sup>①</sup> 《曾国藩全集》奏稿九，第5786页，岳麓书社1991年版。

## 曾国藩·马克思·毛泽东

中国人没有看过或听过《三国演义》的大约不多，但没有听说过哪一个史家会根据它去研究魏蜀吴的历史。假道学有点义愤填膺，说：“男莫看《三国》，女莫看《西厢》。”不过制造和传播这句话的，多半既是男的，又看过《三国》。手边没有《中国文祸史》之类的著作，记不准明、清两朝有没有哪个皇帝或地方大吏禁过此书（似乎岭南人氏丁日昌干过此类蠢事，手头无书，不敢肯定他的禁书令中，有没有列入《三国演义》，图书馆正在冬眠，也没兴趣为此花太多时间，录以备考），但即使禁了，也

挡不住它的流行，连宫中也在演《三国》戏，这是肯定无疑的。此事倒给后人一点启示：就是在最专制的年代，文化学术问题也是众说纷纭，最明智的办法是让各种作品和主张自由争论，自由发展。

90年代中国文坛的盛事之一，是小说《曾国藩》<sup>①</sup>风行全中国（包括港澳台）。它的主要内容是写曾氏如何剿灭太平天国。我想，这部书很可能和《三国演义》一样，成为千百年间广大中国人了解有关历史和人物的重要读本，而那些汗牛充栋的相关学术著作有几部具有十年以上的生命力却是个未知数。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笔下的曾国藩的主要对手——太平天国是腐朽和反动的，这与我国大陆中学和大学的历史课本唱的完全不是一个调。作者的辛劳和才华得到了应有的报酬，没有听说曾遇到什么麻烦。不少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可没有这一份幸运。

笔者对洪秀全评价很低，对太平天国亦颇有微词。<sup>②</sup>这不是我的发明。有太平天国以来，就有不同的议论。仅以近十多年的中国大陆史学界来说，歌颂与批判的两派早就争论得不可开交。翻一翻近年的有关资料，就会一目了然。说得更彻底一些，马克思学派对太平天国的否定，最早和最彻底的来自马克思本人。这场战争的初期，马克思曾满腔热情地赞颂太平天国。他说：“可以大胆预言，中

① 唐浩明著，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1992年。

② 见拙作《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海天出版社1992年版。



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sup>①</sup>可是，随着时间推移，这位大思想家极其悲愤地作出新的论断：“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 in Persona（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sup>②</sup>也就是说，在马老大爷看来，清廷与太平天国不过是腐朽与丑恶的对立，两者并无本质的区别；他原认为是“革命”的太平天国之战，不过是屡见不鲜的改朝换代的新尝试；这种局面是当时中国社会生活停滞，未有新的社会生产力和新的社会力量的必然产物。

马克思的这个论断如果是正确的，立即就消解了谴责曾国藩的最重要的前提。而近年对太平天国持批判态度的学者们的观点，恰恰与马克思 1862 年的结论一脉相承。笔者不赞成以某个人的语录作为判定学术是非的标准。这是与现代学术的品格水火不相容的。但在中国大陆揭示这

---

①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53 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6 页。

② 《中国记事》1862 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5 卷，第 545—548 页。

个历史事实可以澄清一个重大是非；对太平天国评价高低、肯定或否定，绝对不是所谓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两条路线斗争，而是正常的学术研究中经常出现的不同观点的讨论。分歧的各方是平等的，不是什么批判者与批判对象的训政关系。确认现代学术研究的诸如此类正常规则，有助于促进学者们转变学风，多作些切实的研究工作，推动学术研究走上正轨。

评述曾国藩研究不能不谈及一篇著名文章，即范文澜写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此文作于1943年，研究者通常认为它是借古讽今之作，是影射当时对内独裁专制对外与侵略者勾勾搭搭的蒋介石。可是，由于过分急功近利，这篇文章的有些结论在学术上是经不起严格推敲的。例如，以为清廷服务而断定曾是“出卖民族的汉奸”，这可十分牵强和危险。清代至今，国号有三，但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如果鼓励以56个民族之一的某一民族的立场作为评论史事和人物的标准，很可能煽动狭隘的民族情绪，十分不利于中国各民族（中华民族）团结发展的利益。抗日战争时期，所谓汉奸是卖国贼的同义词，如果要肯定曾国藩是卖国贼，那就要使用他在处理同外国关系中损害中国利益的材料，可不能以他为清廷服务作为主要根据。范老是怎样论证的呢？他说：“那拉氏、肃顺二人是当时满洲皇族里最有‘政治头脑’的，他们知道（为）了



挽救满清的统治不能依靠满人而要依靠汉奸。”<sup>①</sup>这个基本前提如果可以确立，包括左宗棠、张之洞、陈宝箴、黄遵宪等等在内的汉族大臣都成了汉奸，晚清史变成一部满汉斗争史！因此，尽管范老德高望重，多年来连那些贬斥曾国藩的史家也没有什么人愿意坚持这个基本前提。至于其他学者有关曾氏的论断是不是不容匡正的绝对真理，那就更不值得讨论了。窃以为在学术领域只有一个真理：凡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学术观点，都应该在自由讨论、反复验证中去确定其价值。

也许有人认为，一般的学术问题可以自由讨论，为“反动的”历史人物翻案则不在此例。笔者也期期以为不可。暂且不说给历史人物戴“反动”、“进步”等政治帽子的习惯已受到质疑，即使要戴，谁个反动，这又是必须认真研究和争鸣的。在作祟多年的极左思潮影响下，很多历史人物被判为反动，不少是冤假错案。为这类人物翻案是清除左毒的必须，也是学术进步的标记。十多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重要进展之一，是曾、左、李、康、梁、胡适等人得到了比较合乎实际的评价。翻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胡适研究丛刊》第一辑，季羨林先生的题词是：“还胡适本来面目”；萧乾先生则写上：“祝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终于走上了唯物主义的路子”。对“实事求是”、“唯物主义”早已响彻云霄的大陆学坛说来，这真

<sup>①</sup> 《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16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是辛辣的反讽。而随着洋务运动研究的深入，著名史家陈旭麓认为：“可贵的是，李鸿章在开步走，是努力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他是洋务运动——近代化第一步的主要代表人物，是19世纪后期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开拓性人物”。他“从封建体里绽开了一个裂口”，“有爱国之处，有民族思想，但不能否认他确有不少误国之处。”<sup>①</sup>陈先生是在1988年第一次李鸿章讨论会上讲这番话的。从讨论会的论文集看，多数学者的基调也差不多。与其说这是翻案，毋宁说多数学者挺起腰杆，在认真的学术研究中推进了自己的认识。同时，从第二次讨论会的论文看，这种实事求是精神在90年代继续得到发扬。就我个人说，此事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快感。步时贤后尘，笔者也就李鸿章是是非非的9个问题一口气写下考虑多年的意见<sup>②</sup>。

同李鸿章研究一样，从80年代起，不少学者对曾国藩的评价也起了根本性的变化。除了前面已谈及的原因外，一个特殊推动力是毛泽东研究的深入。湖南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湖湘文化与毛泽东》（彭大成著）说得最为系统。翌年，研究毛泽东的权威李锐的《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辽宁人民出版社）亦有所建树。笔者则是从

---

① 安徽社科院历史所编：《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第2-3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② 见拙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第9章。



“曾国藩对中国文化的贡献”<sup>①</sup>，而论及毛泽东，成书时未见彭、李大著，由于视角不同，似也有些新意和可观之处。

毛泽东写下的大量文字表明，他曾是曾国藩最热烈的崇拜者。仅《毛泽东早期文稿》中他赞扬曾氏或摘抄其嘉言的就有16处。1917年8月23日他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人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这段话表明，当时的毛泽东认为鸦片战争以后的本国人物中，曾氏居于首位，孙、袁均在其下，而曾的魅力又在“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太平天国处在被否定的地位。直到1920年6月，他仍念念不忘“曾、左吾之先民，黄、蔡邦之模范”。<sup>②</sup>轻重有些改变，崇敬之情仍溢于言表。同时这是代湖南改造促成会草拟的公开信，也与直抒胸臆的个人信件有别。后来，他转而肯定太平天国，但就迄今笔者看过的材料，亦未发现他骂曾国藩；相反，他在1969年的一次谈话中仍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sup>③</sup>

曾、毛两人的关系中更值得重视的是前者对后者在思

① 见拙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第8章第4节。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90页。

③ 《博览群书的毛泽东》第197页，湖南出版社。



想上有哪些影响。人们常说，毛泽东的思想吸收了不少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近年的研究表明，他在青年时代便认真阅读过的《曾文正公全集》是其中重要资源之一。

海内外都很重视毛的军事思想，其中有些就有师承曾氏的明显脉络。毛重视从实际出发，曾也“颇疑古人之书，皆装饰成文，而不可以尽信”。要求“考究实事，多思多算”。曾氏认为“军中制胜究在人而不在器”，而这也是毛一贯坚持的。一部《曾胡治兵语录》十三篇竟有十一篇说的是思想教育、品德和用人之道。更令人惊奇的是曾氏对军民关系的重视。“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人们很可能认为这是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最初版本，其实是曾氏编写的《爱民歌》。从形式到内容两者是一脉相承的。

在战略、战术上，曾、毛也有不少共同点。例如，曾谆谆告诫“最戒浪战”，“算毕而后战，不宜且战而徐算”。“为将者设谋定策，攻则必取，不然毋宁弗攻。守则必固，不然毋宁弗守。”毛则说：“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曾氏主张“以全军破敌为上，不以得土地、城池为意”；毛则把“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为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规定为十大军事原则之一。与此同时，两人都一再指示部属要信守《孙子》集



中兵力“以十攻其一”的教导。

在治军从政中，曾氏把集中众人意见，然后付诸实施定为必须遵守的制度。战前必须召集部属讨论作战方案，集中大家的智慧，这是曾氏的重要主张。他还使之上升为理论：“思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sup>①</sup>“与人为善，取人为善”八个大字成了君相和师儒必须遵循的根本路线。他认为这也是必须遵循的制度和工作方法，其下属要每月汇报一次执行情况。这是非常值得玩味的。如果不嫌唐突的话，笔者斗胆认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这一思想的批判继承和发展，理论上的阐述更完整了，而在实践方面，由于曾氏性格虚静谦和，毛则威武专断，差别却相当明显。

毛的思想来源是多方面的。他主张“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习，曾国藩无疑是他的学习对象之一。毛泽东毕生最大的业绩是政治和军事斗争，曾氏的有关经验不会不引起他的注意。“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内紧外松”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语汇，也是现在仍在执行的方针和政策。而在曾国藩笔下则叫“凡是胁从皆免

<sup>①</sup> 《曾文正公书札》卷九。

死”。他也有一套分化瓦解敌人的政策，也一再叮嘱要“外宽内严”。今天不是昨天，但今天有昨天。现代与传统，确是难解难分。

曾国藩与毛泽东的关系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在后者思想最成熟的年代，他仍然劝人们读曾国藩的书。“在延安，他还向一些干部提议阅读《曾文正公家书》。”<sup>①</sup>在范文澜骂曾氏为汉奸的同一年，八路军《军政杂志》全文出版了《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供共产党的军政干部学习，并且于1945年重版发行。<sup>②</sup>毛当时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没有他的首肯，此事是办不成的。而在江西根据地时期，那些“左倾”教条主义者曾经指摘毛泽东“拿半世纪以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曾、胡、左皆英格言是“不合时代的东西……只有让我们的敌人——蒋介石专有。”<sup>③</sup>同一切历史人物一样，曾国藩的思想既有精华，亦有糟粕。曾氏著作能在延安幸免被粗暴地践踏，是以当时的反左为条件的。但历史总会捉弄人，延安的有些历史经验被湮没，致使80年代至今还曾氏本来面目的努力，依然十分艰辛。

时至今日，研究曾国藩之类的历史人物，大体只有思想史上的意义。他的著作自然有足资汲取的历史智慧；但

① 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128页。

② 《中国兵书集成》第50卷卷首说明，解放军出版社。

③ 汪澍白：《试论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关系》，《求索》1982年6期。



冀图请出曾氏亡灵指点今日经世大计的人，即使有恐怕也极为珍稀，无伤大雅。曾国藩研究的起伏表明学术文化发展必须有二心：一是平常心。应像延安当年对待曾国藩那样，既有人斥之为汉奸，也有人力倡拜读其家书、治兵语录。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平头百姓则闲聊多一谈资，勤读添些线索。二是专心。学苑没有便宜可检。信口开河，哗众取宠，产生的只能是气泡或印刷垃圾，不待薈龟。

1996年2月25日（丙子年人日）

原载《东方文化》1997年第2期



## 两次世纪之交大改革的若干交叉点

俯览百年中国，要更深理解戊戌变法，不应把它看作孤立的事件，而是上一世纪之交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改革肇端于甲午战败，结束于辛亥革命包括清末新政，历时 16 年。从政变到义和团事件两年多的风波阻隔，无非是为摆脱历史重负必须支付的成本。

这场改革同当前已经进行了 20 年的新的世纪之交大改革相比，乍一看来，差异很大，认真琢磨，却异中有同。一个是满州皇室统治的大帝国，一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种种差别，不言自





明，如再饶舌，近乎对读者智力水平的不敬。我们的讨论不妨集中在两者的共同点上。

### 为什么启动都如此艰辛

两场改革的首要特征是启动都非常艰辛，重叠的历史画面，呈现奇特的交叉点。

戊戌变法是清帝国挨了六次痛打后的反应。鸦片战争、英法联军、70年代日军侵台、80年代中法战争、90年代中日甲午战争，5次外来侵略加插历时14年的太平天国之战，瓜分迫在眉睫。青年皇帝不愿做亡国之君，与一些深知学西方是救亡唯一途径的官僚和士人联合，才有百日维新之举。反应如此迟钝，割地赔款，满目疮痍，举世无双。但昏愦顽固之徒仍不过瘾，先是发动政变，一举捏死六位维新志士，接着又主动挑起事端，惹引八国联军进京，赔付巨款，才开始比较认真地把戊戌的未竟事业付诸实施。

时至20世纪下半叶，中国人应该聪明一点了吧？1978年开始的这次改革却仍是不到30年间历经15年的三大灾难后的觉醒。这三大灾难是：在批二胡（胡适、胡风）和反右派中达到高潮的“兴无灭资”，摧毁了学术文化的正常发展；以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告终的“大跃进”；以“全面专政”和“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为标志的“文化大革命”。中国大陆在山呼万岁声中干出一连串“史无前例”让海内外目瞪口呆的大蠢事之际，日本和



“四小龙”则相继悄悄腾飞。中国人大梦方觉，但仍睡眠惺忪，莫名其妙的争论和风波迭起。仅要不要建立市场经济制度这类现代文明常识就在十几年间争得不可开交！

以勤劳、勇敢、智慧自诩的中华民族，在19、20世纪为什么变得如此麻木、迟钝？

海内外流行一种论调：对传统的漠视导致社会转型的迟滞。揆诸实际，情况刚好相反。

人的行为受制于思想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曾经有过先秦、唐、宋等猗欤盛哉的时期，时至晚清，却已大病缠身。这病来自源远流长的传统思维方式。

一是习以为常的圣贤和经典崇拜。“子曰”、“诗云”、“教导”、“指示”成了无可怀疑的真理标准。人们不是依靠自己的头脑去认识世界，而把精力虚掷于学习、领会和捍卫圣贤发现的“真理”。19世纪的麻木，是“严夷夏之辨”的圣谕法力无边。20世纪下半叶的风云则全按语录的声调翻腾。

二是闭目塞聪的民族自大积习。晚清为什么一再拒绝改革？主要的理由是中华文明——礼义教化举世无双。发轫于先秦的盲目民族自大化为广大民众的思维习惯，成了走向改革的艰险路障。时至20世纪，中国人敢于宣布来自国外的理论是法定的“指导思想”，按理说应该有对外来思想文化十分开放的包容心态。可是，积重难返，奇特的民族自大心理有了新的宣泄形式：外来理论经过中国人一捣鼓，便一举登上“顶峰”，中国因而成为“世界革命

中心”。三分之二的人类正等待着中国人去解救，哪有倒过来移樽就教之理！口中以东方式的谦逊说要“学习世界上一切国家的长处”，实则对非经慧眼选定的外来文化深闭固拒。

内在的已成惯性的文化积淀令两个世纪的中国人陷入寸步难移的窘境。外在的症候则都是对现代西方主流文化病态的抗拒和恐惧。这种病态除了形成各种文化兼容并包、自由交流、自由争辩的态势外无法逐步消解。在这两个世纪，迄今只有新文化运动期间出现过这样的局面。人们在高谈超越五四。如果正视历史经验，迫切需要的倒是回归五四。这是极其困难的新的文艺复兴。但这是中华民族文化振兴的必由之路，也是现代化事业的必然归宿。历史不可能重复，新的基础上的回归就是超越；而离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和制度运作的框架去奢谈超越，则必然南辕北辙。

### 富强之路安在

两场大改革的第二个交叉点在富强之路的寻求。百年中国梦的焦点是富强。上一世纪之交的改革，贯串着富强之梦幻灭后的反思。

反思的焦点之一是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1895年8月11日的一道“上谕”，体现着上层统治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企盼自强的洋务运动进行了30年，以官办和优先发展重工业（造船、制械）为取向的发展陷入穷途末路。

有的官员建议将这些企业卖给私商。经过户部（财政部）审议后，统治中枢以皇帝的名义所发“上谕”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制造船械，实为自强要图，中国原有局厂，经营累岁，所费不貲，办理并无大效。亟应从速变计，招商承办，方不致有名无实。南洋各岛及新旧金山等处，中国在彼侨寄者甚众……该商人如果情愿承办，或将旧有局厂令其纳资认充；或于官厂之外，另集股本，择地建厂。一切仿照西例，商总其事，官为保护。若商力稍有不足，亦可借官款维持。”<sup>①</sup>

言简意赅，这里说了几件事关全局的大事。

1. 官办企业，此路不通。此类企业的内在机制令其面向领导而不是面向市场，机构庞大冗员多。于是，年年亏损，年年补贴，成了财政无力填补的重负，而其产品的质和量都满足不了实际需要，市场竞争力很差。正如户部的奏章所说：“糜帑已多，未见明效。”如“福建船厂岁需银六十万，铁甲兵舰仍未能自制。”

2. 出路是“改归商办，弊少利多”<sup>②</sup>，走市场化、私有化的道路，废止了不准私人自由创办企业的政策。

<sup>①</sup> 《光绪朝东华录》北京中华书局 1958 年版总第 3637 页。

<sup>②</sup> 同上。

3. 吸收外资主要是华侨资本到国内购买官办企业或办新企业。

4. “一切仿照西例”，经济应该按照与国际接轨的规则去运行，商人自主经营，政府转变职能，承担“保护”与支持的责任。

这个反思是深刻的。进入 20 世纪的第一个 10 年，为了保证市场的正常运作，还相应地进行了法律与司法制度改革，在这一领域也开始与国际接轨。略去枝节，从宏观的角度看，交出的成绩单亦差强人意：1894 年到 1914 年间，中国的产业资本平均年增长率达到 15.46%。虽在 1914—1920 年间下降至平均年增 5.16%，1920—1936 年间又上升至平均年增 8.83% 了。<sup>①</sup>

可是，这个反思是不彻底的。接踵而至的竟是全盘抗拒西方现代文化的义和团事件。这次大改革终结的导火线亦是把民营铁路收归国有的所谓“干线国有”的错误决策。这个决策犯了三个历史性的错误：

1. 现代经济是法治经济，而它直接触犯了当时施行的多项法律。

此事发生在宣统三年（1911），清政府未经资政院同意，向美、英、法、德借大笔外债，将粤汉、川汉等路收归国有。而兴办这些铁路的公司又是依法批准成立的。正

---

<sup>①</sup>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727 页。



如《四川保路同志会宣言》所说：“《资政院（院章）》第十四条第三款，明载有议决公债之权；有何逼迫而不待其决议？《咨议局章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明载本省权利存废之权；收回铁路，权利孰大，有何原因不与以决议？各商办铁路，明依《商法》、《公司律》奏咨有案，经先朝批准者，有何紧急不待其股东一议？”<sup>①</sup>清政府此举是践踏法治的恶行彰明昭著。而当时士绅维护法治的水平已达如此高度，洵属中国现代思想史中不容忽视的现象。

2. 它无视历史经验，并显示了腐朽官僚透过于人的劣迹。

戊戌及其前后的大改革是以走出官僚经济的牢笼为特征的。把商办铁路收归国有无视这个基本状况，也没有正视他们用作借口的种种指摘，在官办企业中亦比比皆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有的失误且是官僚横加干涉的恶果。四川咨议局在一篇给川督的呈文中就曾对这类责难作出有力的答复：“各商办铁路开局以来，各有成绩可考，未能一概抹杀，其间虽不能绝无糜费侵蚀，是则川人为之臧否，即官办又何尝不然。而延误之咎，尤必不尽在商办。即如宜昌购地，请督办太人一纸告示，经年余而始下，四川倒款之施典章，乃出于川督奏派而非商民公举之人。凡此

<sup>①</sup> 逄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274页。

口实，岂能一归国有，即保其净绝根株。”<sup>①</sup>

### 3. 忽视了世界各国现代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现代化国家都有国有经济，但总的趋势都以私营企业为主，铁路亦不例外。<sup>②</sup>如果对这个趋势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对私营经济就会提供公平的竞争而不会运用国家权力去扼杀。不幸，清帝国的皇族内阁和后来的北洋政府在铁路问题上都逆流而动。对修筑铁路这一类重大基础设施，政府当然不能漠视它，应该规划、招商、保护乃至投资。但最佳选择是交由商人去操作，即使以公共资金为主，也应组织公司，按市场规则运营。更不幸的是袁世凯变本加厉，全面推行“取缔铁路民办”政策。辛亥革命后复苏的民办铁路热潮又一次被压死。<sup>③</sup>已有的私营铁路和铁路公司在1912—1915年间被相继收归国有，6800万私有资金中，至北洋政府垮台付还的还不到一半。相应地1912—1928年间年均新修铁路只有230公里，仅为1895—1911年间的42.3%。<sup>④</sup>不是私营铁路没有生命力，也不是没有办私营铁路的强烈要求，而是错误的政府行为窒息了本应得到扶植的生机。

时至20世纪下半叶，中国人又看到奇特的历史光影

---

①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268页。

② 参阅：江瑞平、邹建华、金凤德著：《国有企业的改革和中国的抉择》，第七章第一节：《日本国铁民营化分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③ 杨勇刚：《中国近代铁路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85—91页。

重合。……

私有，公有；官办，民办；市场，计划；企业，政府；……真是把中国人折腾得筋疲力尽。空前巨大而壮烈的投入，可怜兮兮的产出；不计其数的“学费”，大面积的亏损，捉襟见肘的财政；……富强梦的再次幻灭，迫使中国人又一次反思。

……话语和语境都不同了。可是激烈争辩的实质没变：如何看待私有经济？是接受还是把现代西方主流文化拒诸门外？

……结局是常识理性占了上风：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增强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是非标准。通俗地说：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走出困境的关键在于摆脱扭曲了的观念，让决定政策的人们像平常人那样以平常心从实际出发去思考。

……富强梦寻，维新，改革，……总是有外来者扮演他们要扮演的角色。这是无法驱赶的幽灵，因为世界正在融为一体。他们又是多面怪物，集敌、师、友、对手、海盗、商人、传教士、文明、野蛮……于一身。世界是由利益驱动的，他们以什么脸孔出现在中国人面前，主要取决于中国人本身的状况。成、败、顺利、挫折……都不必苛责他人。强者总是勇于检视自己的弱点。“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sup>①</sup>不仅是修身箴言，更是

① 《老子》：“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① 《老子》第33章。





民族自强的智慧。

### 民族复兴与制度改革

简单地说，两次改革面临相同的症候：在竞争剧烈的时代却丧失自我更新能力或日益衰竭。病根在思维方式和观念。进一步追寻揭示，更深层的原因在制度缺陷。

官智难开，主流社会在思想观念上一再纠缠不休。这是两场大改革面临的共同障碍。

19 世纪出现这种状况，原因极为清楚：历时两千年的思想统一，一千多年的同一上升阶梯——科举，统一的教学内容，灌输着不变的信念。要在这样的思想囚笼中培养长大的士阶层中寻求创新思维，有如凤毛麟角。人不是木头，社会的不平总会催生不平的思想。可是，在政教合一、思想统一的体制下，这些异端或是被禁锢尘封而沉寂于世，或是被卫道士用作谄媚权势的贡品。在“避席畏闻文字狱”的氛围中，平庸是福，卫道立功。于是，本土文化自我更新功能丧失殆尽，适应大改革需要的思想文化，不能不主要依靠来自国外的舶来品。这样一来，孤陋寡闻并深怕利益受损的群体，又找到了一个极具煽动性的好借口：反对“以夷变华”！用现在的流行话语来说则是：捍卫和弘扬传统文化，反对文化殖民！在某些人口中这甚至成了“卖国”和“爱国”的不可调和之争。

时至 20 世纪下半叶，我们面临的同样是文化自我更新能力衰竭的严峻局面。新的观念和新的文化科学技术又

一次不能不主要依赖输入。病根同样在制度缺陷：政府既是审判思想文化是非的法官，又是决定学人荣辱浮沉的权力中心；如果再加上学理信条化，过分追求思想统一；于是，平庸是福，勇于创新的杰士轻者受挤，重则罹祸，以告密和卫道求荣取宠的卑劣小人趾高气扬的景象将会再次出现。改革过程不能不再度伴随着知识与愚昧、常识理性与陈腐信条的激烈争辩。

与此同时，两场大改革均曾频频发生大小不等的政治风波。其根源亦在制度缺陷。上一世纪之交人们看到的是：解散强学会、戊戌政变、义和团、请开国会和反对铁路国有。近20年也风浪迭起。如果建立了一切矛盾都能和平地化解的体制，可以减少多少不幸和损失？

相应地，两场大改革的核心都是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具体制度的改革，经济，政治，政府机构，司法制度，法律，教育与人才选拔，结社，新闻出版……无不涉及。其中最引人深思的是三个问题：

第一，如何对待私有财产制度。

任何社会都有公有财产，它应该依法保护，不能侵吞，这是天经地义。应该坚决提防权势者用非法手段化公为私。

对待私有财产制度则更为复杂。

在一上世纪之交的改革中，面临的是传统的私有制如何向现代私有财产制转换。中国传统实行家族财产制，“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礼记·坊记》）法律

相应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sup>①</sup> 现代市场经济及相应的社会生活要求公民有充分的自由；而没有财产权，自由便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础。于是，在这次改革中，通过修改和制定新的法律，明确承认公民个人的财产所有权。同时，又通过《公司律》、《商人通例》、《破产律》等实体法的制定，确立前所未有的新的财产制度，从而为现代经济奠定了基本框架。从甲午战后至 20 世纪上半叶的经济发展均受其惠。

在新的世纪之交的改革中，矛盾的焦点更加突出地对准私有财产问题。解散人民公社，以“土地承包”等形式重新确认农民的财产私有权，为农民的人格独立和农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城市和工商领域，土生土长和外来的私有经济已成为发展速度最快最具活力的半壁江山。

深化改革无法回避的依然是这一类问题。

人们为资本外流忧心忡忡。据说，1985 年以来暗中外流的资金已达每年吸收外资的 52.3%<sup>②</sup>。道义的责难完全无济于事。贪污受贿的黑钱见不得阳光，必然千方百计外逃。除了分权、政务公开、公民依法参政、传媒公开自由地监督等制度性的变革，斩不断伸向公共资产的黑手。先富起来的中产阶级的资金也在外逃，因为他们生怕风云突变。除了顺应世界潮流，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进

① 《大清律》卷八《户律》。

② 王军：《中国资本流出的总量和结构分析》，《改革》1996 年第 5 期。

宪法，并制定相应的法律坚决付诸实施外，恐怕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慰留这些富裕阶层惶恐不安的心灵。

当前困扰朝野上下的最大问题莫过于国有企业改革。中国人能否独辟蹊径解决这一世界性的难题？只有实践才能作出最后的结论。但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成败的关键在能否明智地解决所有制问题。

第二，如何看待来自西方的现代化制度。

两场大改革乃至百多年的波涵浪滚，中心其实是一个：要不要及如何把西方的现代化制度移植到中国？

反对的意见很多，有的还极为雄辩，但都无法掩盖一个严峻的现实：迄今为止只有西方真正实现了现代化，实现了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富强；他们的制度确实有很多毛病，但其强大的自我更新机制又保证了他们稳定、健康地演变，把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生活水平和自然环境持续地推向新的高度。

大清帝国的灭亡是以制度移植过程的延误——不愿及时召开国会实施立宪制度为标记的。

“改革、发展、稳定”，“与国际接轨”，这是当前最流行的话语。这里蕴含着 19 世纪以降中国人付出无数血泪后的清醒总结。

从 19 世纪的反对“以夷变华”，到 20 世纪的反对“全盘西化”，一些喜欢以民族和国家利益的代表者自居之辈，把同他们意见相左——提倡积极学习西方现代主流文化的人视同损害中华民族利益的蠹贼。历史行程已把所谓

反对以夷变华的荒唐暴露无遗，不必再浪费笔墨。

百年中国除了个别年青学者出于救国热忱（绝非什么“卖国”的“买办”）有过“全盘西化”的激愤言论外，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旋律一直是“取其菁华，弃其糟粕”。对待固有文化亦不见“全盘反传统”思潮泛滥。<sup>①</sup>

再从实践看，中国从未出现过“全盘西化”的现实危险。任何社会生活领域的制度移植都会产生因时、因地制宜的变异，整个国家或民族外国化更不可能，所谓“全盘西化”，是动机复杂的危言耸听。而在实际生活中，一个自由、民主、文明、富强的中国至今仍是奋斗目标，倒是与中国人没有切实学习现代西方主流文化息息相关。

敢于正视现实的民族，应该坦然地承认自己有哪些不足，不把应该集中于如何学习的精力浪费在要不要学习的争辩中。一个伟大民族的自尊心应该显示在善于学习而又善于创造上。这里决定性因素也是制度。

### 第三，现代文化教育制度的建立。

思想支配行动。没有现代文化教育制度的建立，思想不可能冲破牢笼，一个国家善于学习和创造的自我更新机制就无从谈起。

戊戌前后的改革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化教育制度建立的开端。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 建立从小学到大学的体

---

<sup>①</sup> 参阅拙作《五四怨曲试析》（1988）、《胡适与所谓“中国意识的危机”》（1990），均收入《中国现代思想散论》一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版）。



系，以新学取代旧学，废除科举；后来并以公务员制取而代之。2. 建立新式的思想文化传播体系，中国人创立了自己的报纸、刊物、出版社。受到压制时到租界和国外去办。3. 组织各种学术团体和其他社团，自由讨论思想文化学术乃至政治问题，维护各自的社群利益。尽管仅是雏形，已经推动了近代中国第一次群众性的启蒙高潮的形成，为改革莫立了思想基础。特别是从1901年起书院陆续改为学堂，至1905年正式废除了科举制，中国人的学习内容和“出身”阶梯根本改变，不但在知识水平上告别了贫困的昨天，也开创了过去无法比拟的宽广出路，并深刻地推动着人生取向和思维方式的变革。

可是，政府箝制思想的方针未变，《大清报律》竟规定报刊实行发行前一日送审的制度，剥夺了现代公民应有的言论自由权利。直至辛亥革命后特别是1916年段祺瑞下令废止了1914年的《报纸条例》，言论自由才得到较好的保障，以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的学术思想、文化大发展的黄金时期接踵而至。

为什么新文化运动成了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因为它是中国已经建立的现代文化学术和教育制度的产物。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兼容并包。西方现代文化与国粹，世间各种学术和思想文化流派，各种学问和艺术，自由介绍，自由探讨；激烈争辩，以理服人，拒绝暴力干预。新的学科，新的艺术，思想家，学者，作家、艺术家……如繁星在天，异采纷呈。这是思想解放的高峰，也是创造力



高扬的年代，归根到底，这是向现代文化教育制度转型的辉煌里程碑。

此后，维护还是摧毁这个现代文化教育制度成了 20 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内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和三民主义教育，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颠峰的“全面专政”都是对新文化运动和它所体现的现代文化教育制度的全面反扑。

不少人在高谈阔论“继承五四，超越五四”。离开了现代文化教育制度这个核心，根本无法理解五四，所谓继承和超越都很可能步入歧途。

两场大改革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败系于制度改革。这或许是百年中国留给我们不可忘记的经验总结。

1998 年 4 月 5 日



## 近代中国研究：一论独霸到 三派鼎立

---

这 20 年，近代中国研究的最大变化是打破了三大革命高潮（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纲论的一统天下，开创了多元的三大流派鼎立的局面。

### 三大革命高潮为纲论的兴起和 衰落

三大革命高潮为纲的基本思想最初是由胡绳提出的。作为一位诚挚的学者，他曾旗帜鲜明地主张思想和言论自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用在思想上就只是一种愚民政策，因为在利禄的诱惑与皮鞭的惩罚之下，不但谈不到思想自



由，也根本谈不到思想。”“思想自由还包含着发表思想的自由。假如思想可以自由，而偶语则须弃市，书籍尽付秦火，没有把思想说出来写出来的自由，那是假的思想自由。”<sup>①</sup>把他的学术见解意识形态化，用作笞打别的学者的皮鞭，与其初衷背道而驰。

准确地说，三大革命为纲的理论和实践是特定历史时期群体互动逐步形成的意识形态。从50年代起，错误地把群众运动搬到学术文化领域，“兴无灭资”、“批判资产阶级”、“批判唯心主义”等“革命”口号，接连不断地粗暴地践踏学术文化和知识分子。在这一背景下，三大革命高潮为纲论有几个基本特征：1. 标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但往往有意无意地不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固有思想的全貌。例如，他们宣扬马克思对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反对英国侵略的支持，却闭口不谈他对这场战争体现的制度和背景的分析。他们援引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赞扬，但无视他把这一落后的农民战争称为“魔鬼”等等的严厉谴责。2. 宣称自己独得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真谛，动辄斥责与自己不同的学术思想观点为“卖国”、“买办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3. 抹煞包括史学在内的学术独立性，自觉为当下的“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有些人因而一再留下随风转向、自相矛盾的尴尬记录。4. 观念先行，削足适履，任意编排史料。5. 不了解学术自由和思

<sup>①</sup> 《胡绳文集》第72页，重庆出版社。

想自由是现代公民的基本权利。有时也讲“百家争鸣”，却把百家归结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家，自己是如假包换的无产阶级。6. 自觉与权势结合，千方百计运用各种权势从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压制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冀图扼杀有关学者的活动空间。它把近代中国研究驱入了万马齐喑的困境。

于是，这一领域的思想解放突出地表现为一大批原来被迫或自愿认同三大革命为纲的史家，纷纷冲破思想牢笼，与其他史家携手，质疑原有结论，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义和团是戊戌维新的反动。它不分青红皂白屠杀外国人和沾上一点洋气或现代味的中国人，摧残现代文明。这是与文明古国极不相称的最可耻的记录之一，难怪鲁迅直斥之为“拳匪”，<sup>①</sup> 这类野蛮行径由被压迫的中国人干出来，是不是就变成有理了呢？它给外敌入侵提供借口，招致首都被占，支付巨额赔款的奇耻大祸。人们常说，义和团运动彻底粉碎了或有力地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这种说法显然是悖于实际的。沙皇俄国借口‘护路’而派遣大军占领东北……这是割占中国大片领土——瓜分的真正开始。……英国派军进攻西藏，占领拉萨；德国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阳湖沿岸……并派炮舰驶入鄱阳

<sup>①</sup> 《新青年》第6卷第2号。

潮，鸣炮示威……瓜分危机更甚于义和团战争以前。”<sup>①</sup>无论对社会进步还是维护国家尊严，它均无可取之处。把这称为革新或与戊戌维新混为一谈冒充革命，实在匪夷所思。

至于太平天国，史家们争论的焦点已是什么时候开始“封建化”。虽然还有人为之唱革命赞歌，不少史家则认为它不过是旧式农民战争的重演。《资政新篇》既未成为思想主流，更未付诸实施，以此为判断这场战争的主要依据，无疑过于勉强，何况在《军次实录》、《英杰归真》等著作中，他自己的思想也有重大变化。

三失其二，为纲云云，有所难言。

在三大革命为纲的桎梏下，一切与革命沾不上边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都受到贬斥。20年的巨变之一是洋务运动已被看作是现代化的早期尝试；戊戌维新不但是系统改革社会制度的不成功的实践，在它前后的思想文化运动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源头和预演。义和团事件后的10年新政也被系统研究过这一过程的史家断定为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与此同时，曾国藩、李鸿章等在许多史家笔下已不再是脸上抹着白粉的卖国贼，叙述梁启超、胡适等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功勋已不再成为忌讳。

挣脱镣铐后的创造力也表现在一系列旧课题的新探索和新的领域的开拓。前者如《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

<sup>①</sup> 李时岳：《近代史新论》第212—213页，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

研究》冲破饱含民族主义情绪的把清帝国失败归结为误用奸臣、忠臣遭贬的模式，从社会制度对比的高度，把这一课题的研究推到前所未有的新水平。又如中国社会的封建关系的准确内涵究竟是什么？《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一书以土改档案和其他历史资料有力地证明以关中为代表的经济落后地区土地租佃率极低，而基于权势的人身压迫和依附却极其残酷。所谓反封建主要是“反霸”，反对政治特权和其他社会恶势力的压迫。城市史、租界史是前人很少涉及的荒原，一部千页的《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代表着这一领域的新成就。法制、宪政、知识分子、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乃至早期左祸史的研究都写出了引人注目的论著。以左祸史的研究来说，其中一项杰出成就是史家费尽心力终于弄清了错杀上万人的反AB团和富田事变的真相，不但推动了这一重大冤案的平反，也让人们懂得不能把左祸原由简单归结为坏人（如康生）作祟，或某一错误路线的专利。有的受王明路路线排斥的领袖，也干出骇人听闻的大错事，个中缘由，引人深思。

### 三派鼎立后的争议

这些进展打破了三大革命高潮为纲论的一统天下，开始出现多元格局，逐渐形成了三大流派鼎立互动的局面。

首先是认同三大革命高潮为纲的部分专心致志从事学术研究的史家，厌弃以势压人的伎俩，出现了向现代学术



流派转化的迹象。

其次，包括笔者在内的一大批史家，主张以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化的历程为观察和判断一切历史现象的基本线索。这是发展最为迅速的流派，出版了许多引人注目的论著。以此为取向的史家在方法上通常有两大特点：一是以弄清史实为基本出发点，强调言必有据。二是遵守现代学术研究的规范，尊重和珍视学术自由。

再次，作为对棍子党和所谓“以论带史”的霸道学风的反动，一些史家着意让价值判断退隐，主张寻求历史真实，“为学术而学术”。他们多半是受过良好现代史学训练的中青年史家，大都成果累累，卓有成就。

后两家是自发形成的治学趋势，既无纲领，更无组织的领袖，但代表着现代史学在中国的进展。

不过，一些坚持意识形态史学的人士对这一局面很不习惯，他们一再利用手中可以动用的权力资源，一次又一次发动所谓批判和斗争。它与现代社会正常的学术争论的差别是非常显著的：1. 冀图以权力压服对方，等而下之的更干出编造材料打小报告的勾当。2. 不讲史德，肆意歪曲论敌的观点和论据。3. 联想力丰富，动辄把学术分歧提升为政治分歧，总是冀图以“卖国”、“反对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等在中国份量惊人的政治帽子戴在别人头上。4. 不下苦功收集和 research 史料，爱讲空话大话。更差劲的进而把形式逻辑置诸脑后，简直语无伦次。有的甚至连批判的书都没有读过，便能炮制出洋洋洒洒的大

文。

他们的责备通常围绕着以下五个问题：

第一，在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上，没有坚持把战争等同于爱国，和平就是投降；敢于剖析中国政府和士绅的愚昧，揭露制度落后和决策错误造成的严峻后果。在他们看来这些都亵渎了民族大义和爱国主义。

第二，没有把西方在华人士一概视为侵略者，敢于肯定其中一些人干了有益于中国人民的好事。没有把列强侵占的香港和租界说成是毫无可取的罪恶渊藪。

第三，为反动人物翻案。敢于说不但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有其历史性贡献，就是袁世凯的作为也不是一无是处。

第四，给“革命”和“革命人物”抹黑。不但敢于谴责义和团没有什么革命性，还揭露了太平天国的腐败和倒行逆施。就连林则徐、孙文等等的失误也一一出现在笔下。

第五，说到底还是敢于冲破把中国近代史化简为革命史的框框，如实揭示从中世纪到现代社会转型中新陈代谢的复杂和极其曲折的过程，并以此为基点重新审视外部（包括对外战争）和内部的各种历史现象和事件。

其实，这些指责归结起来无非是两条：

一是史学要不要说真话？

一个国家的公民如果不敢正视历史和社会的真实情况，理智就不可能融入这个国家的文化，成为民族魂的不

可缺少的部分。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民族从不害怕民族自省，因为这是推动自身前进的不可缺少的动力。靠虚假构筑起来的盲目自大虽可满足一时的民族虚荣，但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往往被狂妄愚昧的权奸利用，把整个国家推向危险的深渊。古今中外不乏先例，义和团就是活生生的典型。

二是历史文本是独立的学术还是权势者的宣传工具？

在现代社会，学者和知识分子是独立的群体，他们与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社会管理阶层和以企业家为代表的经济管理群体鼎足而三，在互动中维持社会的正常运作。他们应是思想和知识的中心，向后者提供教益，而不应倒过来成为后者的驯服工具。如果他们自愿或被迫缺位、错位，其后果常常是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记忆犹新的图景。

在曾以“董狐笔”傲世的国度要辩论这些问题绝对不是中国人的光荣。

以上状况无非表明在近代中国研究中思想解放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这不是某些史家一时的糊涂和失误，而是半个世纪文化教育的失误的恶果。我们的知识阶层在知识上固然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更可怕的是他们缺少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牢固信念，根本不知道这是国家创新能力和民族文化更新的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不必怀疑他们缺乏爱国热忱，但其运思方向客观上与国家和社会进步的利益背道而驰。

不过，“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不少史家已经觉醒，特别是一批具有现代观念和现代史学基础的青年史学家正在迅速成长。他们中不少人已显示了独立人格和学术创新的魅力。一元世界已是昨日残梦，多元格局已无法扑灭，学派崛起的图景也已日益清晰。

### 不应忘怀的理论思考和企盼

20年的风风雨雨，既留下以《天朝的崩溃》等书为代表的应该写入中国现代史学史的硕果，也留下不应忘却的教训。窃以为至少有三条是不应忘怀的：

第一，即使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一切，统率一切。

与阶级斗争关系最密切的政治、军事领域，也有大量的与阶级斗争无关的现象。政党、军队和其他革命机关内部，与一切有人类的地方一样，必然有认识和意见分歧，把这些分歧说成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为权力滥用大开绿灯，造成多少人间惨剧！为什么苏区和根据地一再出现“肃反扩大化”？把它归结为某个人的品德和路线，显然过于肤浅，更重要的原因看来有二：一是对阶级斗争的认识极端化；二是在部分地区掌握了政权，却没有建立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三权分立的民主政制，以革命的名义建立了不受限制的全能政府，相应的恶果接踵而至。

在社会生活中，有不少领域与阶级斗争关系不大甚至



无关。告别中世纪，要求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整个社会的管理系统全面现代化。这个过程通过各个领域持续的发展、改造实现。当旧势力成了发展与改造无法逾越的障碍之际，会导致剧烈的冲突乃至革命，但障碍炸毁以后，依然需要发展与改造去推进社会生活的现代化。

简单地说，发展与改造是常态，冲突与革命是变态，后者为前者服务。确认这个理论基点是实事求是地研究近代中国的重要基石。长期以来，不少史事与人物因为没有沾上革命味而遭贬斥，而从社会生活现代化的视角去审视，其贡献却无疑应该镌刻在近代中国的史册上。追寻现代经济、现代教育和现代学术文化乃至现代政治、法治在中国的发展，这样的史迹不胜枚举。随便举个例：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诅咒晚清帝国的腐朽，但却无法抹煞一个基本事实，20世纪中国现代法律和司法制度的基本框架是由清帝国在最后10年的新政中奠立的。

结论只能是：阶级斗争理论可以解释部分历史现象，但不可能分析一切。所谓三大革命高潮为纲不过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具体运用，它之所以陷入困境，为越来越多的史家摒弃，重要原因之一是把阶级斗争理论绝对化和极端化。

第二，到哪里去寻找现代政权合法性的资源？

三大革命高潮为纲这一说法隐含着两个前提：为历史上的革命辩护就是为通过长期革命战争建立的现政权的合法性辩护。于是，否定三大革命也就是否定了现政权的合

法性。

这是个荒唐和令人发噱的逻辑。他们似乎没有察觉：只要所谓“三大革命”之中的一个逃脱了失败的命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随之失去存在的根据，何来什么“合法性”！任何现代政权的合法性都只能在自身的作为中寻找。其中有两个主要途径：一是建立民主制度，让公民通过定期的选举表达对现政权的态度。二是通过自身的作为去赢得公民对现政权的的支持。把中国共产党人与义和团等不分青红皂白杀人放火之徒相提并论，实在不伦不类！

第三、必须恢复正常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讨论制度。

什么是正常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讨论的制度？这就是已写入我国宪法的“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造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的制度。

从50年代开始的所谓“学术批判”，至文化革命时期的“全面专政”达到颠峰，实行的是文化专制主义。非常不幸，三大革命高潮为纲论成了这一专制主义的工具之一。

李慎之先生说得好：“……极左路线是中国真正的国耻，要是真的忘了，那可真是中国的隐忧。”<sup>①</sup>取消学术自由，伤害知识分子，实质是摧毁整个国家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机制。而文化专制制度的孪生物：学霸、告密者、风

<sup>①</sup> 朱高正著《纳约自编》序。

派在知识阶层涌现，则标志着整个民族的精神堕落和道德崩溃。

不敢正视丑恶，学术自由的基础不可能牢靠。学术研究就是推陈出新，学术只能在自由讨论中推进。对学术歧见的回应有两种方式：一是骂倒、骂臭，禁止传播；这是中国人司空见惯的古方正丹。另一种是按现代学术讨论的准则，以“拿证据来”的理性，以比对方更充分的事实（史料）和有说服力的分析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如果选择后者，近代中国研究必将获益匪浅。笔者馨香祷祝，拭目以待。

原载《香港信息日报》1998年5月10日

## 改善学术文化发展的社会环境

——答《开放时代》记者曾德雄

---

### 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

曾：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这是谈得有点令人生厌的问题。不过，细想一下，有些问题仍然若明若暗。所以，仍想请您谈谈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到底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袁：现代化的成败在一般情况下，不取决于文化。经济制度、经济政策和政治状况才是决定性的。不过，把文化混同于政治，使之意识形态化，变成抗拒经济和政治变革的堡垒，它就有可能成为现代化

的主要障碍。在19世纪下半叶的清帝国就曾出现这样的局面。最近几十年也出现过文化与政治、经济关系很不正常的状况，延误了现代化的进程。这是大家熟知的。

曾：讨论似乎已经超越这个阶段。以日本及东亚“四小龙”为例，论证儒家思想是现代化资源的做法颇为流行。一些著名学者长期以来更一再论证中国传统文化不但不缺现代意义，而且还可补西方文化之偏。

袁：讨论日本及“四小龙”不能忘记两个基本事实：一是日本历史的转折点是两次大规模的“西化”，即明治维新的“脱亚入欧”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占领下强迫民主化。“四小龙”则都长期经历过殖民地统治阶段。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框架基本上是西方式的，各自的特点不占主导地位。

二是正因为日本保留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的负面因素太多，才一再发动侵略战争。从上一世纪70年代侵略中国的台湾开始，甲午战争、“九一八”开始的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中国及东亚各国吃尽苦头。

以这些国家和地区为根据，过分夸大东方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作用是难于令人信服的。

至于一些学者及现代新儒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我在理解和同情之余，有几点意见：

第一，任何一个文化系统的内容都是庞杂的。他们从传统中找出“现代性”，其实是戴着西式眼镜在古老的东方文化仓库中取其所需。合适的留下，不合适的摒除。本

来任何对文化的解读都不可避免融入读者的主观因素，他们则显得更加突出。

第二，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为西方文化纠偏扶危的说法，这是本世纪初以降在好些国家一再出现的东方文化救世论的延伸。西方社会危机存在一天，这种社会思潮也会时隐时现。不过，这是一种探索，只有时间才能判定其价值的高低。

第三，他们的主张与其说是对思想史的阐释，毋宁说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建立自家理论的资源。同一切理论见解一样，它被接受的程度和影响的大小都有待时间去裁定。

第四，现代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任何文化都要或迟或早与社会现代化过程融合。韦伯强调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作用，那是从发生学的角度剖析原发性资本主义。而对后发展国家和地区而言，以市场经济、自由、民主、法治为基本特征的现代社会制度也已成了顺之则昌逆之则困的洪流。差别仅在于或迎或拒以及迎拒的方式对这个历史性的转变过程留下自己的印记。各种古老的文化都在这一过程中蜕变。腐朽成分僵化为历史文物，供后人凭吊；生机仍存的成分则融入新的社会生活中潜滋暗长、争妍斗艳。中国传统文化、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印度文化……都必然走上这条不归之路。只有从这个历史高度去观察，才能恰当地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否则，对内我们不能恰当地评价先秦至明清文化的成就与不足，不能正确

理解20世纪包括新文化运动在内的连绵起伏的启蒙。对外则无法正确评价正在转化中的其他古老文化。随着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指日可待地成龙成虎，太谈儒家资本主义的时贤，应该预留一些篇幅给伊斯兰资本主义、佛教资本主义。在肯定中国传统文化蜕变后可以与现代社会制度结合的同时，不应走向另一极端，仿佛霸道文化的特殊基因是包医百病的仙丹。

曾：负的另一面是正。您还没有说到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正面价值。

袁：评论任何问题都忌笼统。中国传统文化是由各个部分多种成分组成的。文化无非是人处理同自然或人际关系经验的积累和升华。人类随着文化的发展而提高。换句话说，文化的功用在于提高人的生活素质。不妨以此为出发点，观察一下中国传统文化。

优秀的文学艺术是永恒的。唐诗、宋词、中国画……已经且将继续陶冶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其他民族中也有可能找到日渐增多的知音。

优秀的科学技术也是永恒的。虽然我们已告别了活字印刷等技术，但这些发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及它所体现的勇于探索和创造的科学精神也是永恒的。而历久弥新的中医中药也许能发展成为影响越来越大的现代医学流派。

文化还有一个风俗层面。文化人类学称之为小传统。这是一个民族生活样式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个领域的不少事物（当然不是全部）体现着人们的善良情谊，有助

于净化心灵，减轻现代化过程必然大为扩张的金钱关系的负面作用。

如此等等，不一一列举。我想，上面说的大约不会有太大的争议。但一进入更深的层面，涉及思维方式、价值系统等问题，情况就颇为复杂了。

以思维方式来说，誉之者认为它的优点如注重整体和辩证发展等等，是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发展的丰富资源；撇开那些混水摸鱼的百“子”千“师”不谈，东西方都有不少严肃的学者孜孜不倦地在探讨。毁之者则认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逻辑不严密，抽象的深度不足，意识形态与学术不分……是现代科学文化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障碍。

谈到价值系统，更是众说纷纭。20世纪中国文化史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对传统价值系统的清算。在一代代启蒙学者看来，不批判传统文化对人的价值的贬抑，自由、平等的现代人际关系无从建立，人的尊严难于确认。而在另一些学者特别是新儒家及其他东方文化主义者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不但包含着现代西方文化的种种优秀价值观念，还包含着可以医治现代病的种种良方。

我想，对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人说来，传统文化仅是可供使用的资源之一。人不能割断传统，但任何传统都不足以满足现代人的需要。儒释道三家每一家都有不同的流派。任何对传统的诠释，其实都是诠释者自己的理论或体系（如果称得上是理论或体系的话）。我们不是生活在先秦或宋明，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从整



体上说是不应固守的，局部则应各取所需。因此，问题应该归结为什么是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

在我看来，文化为人存在，而不是人为文化存在。看到一些国家原教旨主义者用残酷手段甚至不惜血流成河去维护某些据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总是感到愚不可及。但对中国人来说，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从19世纪60年代争论要不要师夷长技到70年代不惜重金购回吴淞铁路予以拆毁，乃至后来义和团摧毁西方文化的蠢行，真令人心酸。但事情没有完结。最近看艾晓明博士写“文革”的纪实小说《血统》。中国知识分子如果都能读一读这本书，可能很有好处。当时的信件、检查、日记加上刻画入微的心态，真可称为“文革”珍贵文献集。更为珍贵的是她揭示荒诞所凭藉的思想。“今天的中国人拥有一个共同的血统——文革出身”，“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结束文革的时间”。这是值得人们三思的箴言。如果停留在责备某一个或几个人的水平上，那就太肤浅了。近10亿人奉献上10年时光，真诚地捍卫某种思想文化的纯洁；惊回首，却是一场噩梦。这种文化心态源于哪些基因？扪心自问，自己是不是真的已告别“文革”？要摆脱历史重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按今天的实际情况，忽视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作用不是主要危险。急迫的任务倒在于如何树立对文化的正确态度。

### 文化现代化的标志

曾：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预设了一个前提：文化必须现代化。值得探讨的是如何界定文化的现代化。要正确对待文化，似乎应该先弄清这个问题。

袁：对。什么是文化的现代化？这确实是必须首先弄清的问题。如果在这个问题上缺乏共识，所谓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讨论便失去依据。文化既是精神又是制度。在 20 世纪 90 年代来探讨这个问题，主要标志是有没有以下三大项：

第一，有一个达到当代水平的文化积累、发展和传播系统。它又包含着四个子系统：学校、图书馆、研究机构、大众传媒。

第二，有一个与国际接轨的信息传输系统。现在是全球化时代，是信息时代。闭目塞聪，对任何国家和个人都意味着愚昧，可能招来本来可以避免的落后和危险。不但要有达到当代水平的电子信息系统等物质设备，还要有相应的开放心态。林则徐时代就提出要睁开眼睛看世界，痛心的是至今仍没有完全做到。

第三，有一个容许诸子百家自由争鸣的文化环境，真正实现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这是从精神上走出中世纪的最重要条件。

有了这三项才有可能逐步提高中华各族人民的素质，使之成为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现代价值观念、适应现

代社会生活的群体。如果离开这三项去谈什么文化现代化，不过是南辕北辙。

曾：这是从社会环境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但这个说法是否忽视了文化理论或文化内容本身的问题呢？

袁：上述三项其实已包含了你所关心的问题。

文化理论和文化内容是要发展的。但只有在这三大项为基本框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例如，能不能说现代新儒家（或其他思想家）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了现代化呢？如此说可以成立，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张东荪等建立了自己理论体系的 20—30 年代中国文化便已实现了现代化，我们今天的讨论就是多余的了。

某一种理论和文化内容的建立是思想家的事，应该为思想家、理论家、哲学家创立和宣扬自己的理论提供广阔的空间。但现代文化是在多元并立、自由交流、自由传播、自然更替、自由选择、各取所需的状态下向前发展的。法律只禁止危害社会的所谓文化。因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与其把过多精力集中于讨论某种公式或理论，毋宁花大气力去改善文化发展的社会条件。

### 为大师的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

曾：广州提出建立国际大都会的奋斗目标后，不断有人提出建立国际大都会的内容之一是应该有学术文化大师。您的看法怎样？

袁：这个建议不无道理。但要注意，这个问题的实质仍是要建立良好的文化生态。

广东比较有钱。用大价钱请几个大师来也许能点缀一时，但能缩短与文化现代化的差距吗？

苏晨先生在《羊城晚报》发表文章，尖锐地指出：大师是不能靠领导“封”和“捧”出来的。这实际是对当前畸形的学术评价系统的批评。这方面怪事很多，用心收集一下，有心人不难写出一部十分精彩的《儒林内史》。这类笑话当然无助于现代文化的发展。

真正企盼大师出现，就要敢于冷静地审视广州地区的文化土壤。

以物质条件来说，到几个主要图书馆去看看，经费窘迫，管理落后，图书残缺，说得坦率一些只有四个字：催人泪下。这样的条件不要说培养大师，要让中上水平以上的研究生和大学教师“吃饱”都不容易。

再从软环境看，真正的学术研究就是推陈出新。出类拔萃的人才或有所创造的学者必然不甘于匍匐于别人脚下，必然不断突破固有的框框。真正的大师更要大大超越前人。广东在经济上很开放，学术文化上怎样呢？经济理论上略有新见的卓炯、张期，都曾经饱受批判，要是真正的大师出世，那又将会怎么样呢？也许有人会说：这是过去的事了。如果真正成为过去，那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现代文化的正常发展需要学术的自由与宽容。

一切热爱中国文化、有志推动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人士

都应该为改善学术文化的软硬环境尽心尽力。知识分子本身则更应在艰苦的环境下毫不气馁，努力奋斗。特别是要继承优良传统，真正以民族的脊梁为楷模，为了社会发展和人民的利益，坚决维护自己学术探索的权利。

鲁迅是真正的大师，他对广州可没有留下多少好印象。陈寅恪也是真正的大师，他在广州写下的却是：“剩有文章供笑骂，那能诗赋动江关。”“越鸟南枝无限感，唾壶敲碎独悲歌。”在走向 21 世纪之际，应该结束这类可悲状态，赢得广大爱国的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心。

原载《开放时代》1995 年第 3 期

## 建立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心态 ——敬复李慎之先生

---

### 当代中国的文化问题

#### ——李慎之先生来信

伟时教授：

收到《现代与传统》第4辑，捧诵两篇大文，对于《西化·现代化·政治家·知识分子》尤为钦佩。

现代化不是西方化。这已成为第三世界的咒语，甚至也是一部分西方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咒语。你却仗义执言，力辩其偏颇，非具有绝大胆识者，谁能作此语。这是我要向你表示钦佩的原因。

我最近把在海口会议上的发言整理了下，写成《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一文，即将在八月份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和《东方》杂志上发表，呈上请指教。

我在文中把陈序经和胡适提出过的“全盘西化”的口号改为“全球化”，自信其原则无背于尊意，提法或更妥善，不知是否有当。

你说“全盘西化”从未在中国实行过，我同意。但是也想指出，从1949年到1979年，中国实际上作过“全盘西化”的绝大努力。即使全盘西化不可能，它也做到了人力所能做到的极限。“文化大革命”中强调两个“决裂”，更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没有做到过也许是今后也做不到的。因此我的朋友美国教授唐德刚说，中国虽然没有做到“全盘西化”，却做到了“半盘西化”。说起来近于开玩笑，细想倒也合乎事实。最大的证明，就是：中国当代青年，包括口口声声在叫“弘扬传统文化”的，已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了。

我还针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而提出：“以全球化为体，以中国特色为用”。我赞成你说的“古往今来文化从来是多元的”话。以上下五千年的眼光看，民族是分立的，语言是不同的，文化怎么可能是一样的呢？但是从今而后的文化却确实有一种相互影响而逐渐融和的趋势。我把自有人类起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止的历史看成是一律多元化的历史；而把以后的历史看成是多元一体化的历史。我对目前世界上流行的多元文化主义看成是一种民族主义情绪化的表现，虽然它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历史的进程却肯定是向一体化前进。

中国目前在文化上的问题有二：1.可以说是完全丧

失了固有的传统，因而有使民族成为一盘散沙、社会秩序越来越混乱的危险。2. 参加文化多元主义以至东方主义的大合唱，对全人类的（也就是全球的）主流文化（市场经济、民主、法制）故意唱反调，因而有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危险。你在文章中讲了许多过去的事，我却怕这些过去的事会在现在和将来重演。专此顺颂

研祺

李慎之

1994. 8. 16

慎之先生：

拙作《西化·现代化·政治家·知识分子》的基本观点郁积多年，有感而发，一吐为快。谬承鼓励，视作鞭策。大札及所赐鸿文《全球化与中国文化》识深见远，发人深省。再三捧读，思绪万千。仅就其中若干问题略陈浅见。不当之处，勿吝教正。

### 150 年文化危机的根源

先生最令在下心折的卓见之一是以世界已进入全球化时代作为观察中国文化问题的基本前提。

鸦片战争至今的 150 年间，文化问题成为中国士绅及现代知识分子一再争议的热点。从一定意义上说，只要中国文化没有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它就处于某种危机状态，文化运动与文化热的波澜便不可能消失。这种危机无



非是现有文化不能适应社会进步需要的表现。必须讨论的问题仅在于：形成这连绵不断的文化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中国社会固有的矛盾，加上外力的冲击，无疑是 19～20 世纪一切中国问题产生的总根源。如果再进一步考察为什么这些矛盾不能比较顺利地解决，焦点必然集中到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状况上。曾经使中华民族雄视东方的中国文化，在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以后，却因其负面因素——封闭性而使我们的祖国步履蹒跚，备尝羞辱。

19～20 世纪的中国史，有两条贯穿始终互相纠缠的线索：一是捍卫国家主权，反对外来侵略；二是吸收外来先进文化，促进社会转型。要是说前者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记录，并以 1945 年的抗日战争胜利和 1949 年后的业绩洗刷了耻辱的话，后者的迂回曲折却证明自我封闭一直是中国文化自我更新的主要障碍。本来前者是政治，后者是文化，虽然有时会有交叉，但只要有通观全局的见识，理解全球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两者是应该和可以严加区分的。不幸，前者一再掩盖后者，政教合一、文化与意识形态不分的传统被延伸到对待外来文化上。于是，自我封闭等同于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特性；历史就在这里延误。说到底，这个令中国人民吃尽苦头的延误来自对全球化时代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抗拒。

付出难以数计的代价以后，从 1992 年起，中国人终于可以在经济活动中名正言顺“按国际惯例”办事，而不

招至压力和麻烦。可是，尽管“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保持稳定”已成为基本国策，但如提倡在文化领域也“扩大开放”，“按国际惯例”办事，并付诸行动，愚总是心存疑虑，生怕提倡者会自找麻烦。先生主张“以全球化为体，以中国特色为用”，体现着彻底开放的精神，如能成为多数人的共识，似可了结许多争议。

这里有些理论和认识上的是非需要澄清。

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是：人类有没有可能形成共同的时代精神？更具体点说，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世界各国的经济逐步进入了一体化阶段，这时有没有形成共同的时代精神？我想，福国利民的“体”，是不能离开时代精神而自存的。

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按照各自理论的内在逻辑，答案都应该是肯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有共同的发展规律；处在同一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其上层建筑的基本特征也是相同的。自由主义者则确认文艺复兴时代以来所确立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观念及理性精神等等具有普世的价值。顺理成章的结论是：这些共同的时代精神必然成为各国现代文化的共同基础。先生把市场经济、民主与法治、现代的道德秩序三者看作是现代化的基本要求<sup>①</sup>，即任何不甘沉沦的国家必须接受的时代要

<sup>①</sup> 李慎之：《全球化时代中国人的使命》，《东方》1994年第5期第15页。

求。历史已一再证明，现代各国的兴亡盛衰都与对这些时代要求的迎拒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就是一个突出的典型。

### 根深柢固的狭隘民族主义

回顾近 150 年的中国史，像中国这样的有古老文化传统的国家要接受时代精神的洗礼，确立与全球化时代相适应的观念是异常艰难的。障碍来自狭隘民族主义，主要是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旁观者清，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艾恺教授对此有十分精辟的论述。<sup>①</sup> 如果不打破在文化上自我封闭的种种似是而非的借口，中国人仍有可能又一次在全球化时代遭受不应有的挫折。

众所周知，19 世纪清帝国抗拒体现时代精神的先进文化的主要口号是“严华夷之辨”。这已只能给当今的中国人留下含泪的苦笑。20 世纪中国出现的是两种至今仍颇带迷惑性的理论，一曰中国本位文化；另一曰东方文化救世论。

中国本位文化的主张虽然是 1935 年才由 10 位教授正式提出，但其渊源甚久。在 19 世纪这叫“中体西用”。在当时的条件下，它是打进中国固有文化体系中的一根楔子，为外来先进文化——西学争得一席之地，有功不可没

---

<sup>①</sup> 参阅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的一面。<sup>①</sup>可是，时至20世纪，当现代知识分子已取代了昔日的士人，学术自由已成为他们的基本信念；国界已难以阻挡外来文化自由流通之际，各种变形的中体西用论的倡导者，旨在筑起新的思想堤坝。

他们坚持的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思维模式：人是为特定的纪纲或文化传统而生的。时至20世纪，人们没有回答，为什么文化不应该为人的需要而存在和更新？难道只有固守原有纪纲或传统的人才叫中国人吗？

在世界日益一体化之际，中国本位文化论提倡者中有些人却有表露民族主义情绪之嫌。他们不是冷静地研究和发扬本民族固有文化的精粹，使之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并为丰富人类文化作出贡献；而是带有极大的情绪宣泄的成分。如果这些仅是部分知识分子的主张，亦不失为学术诸流派中的一种，应该欢迎和支持他们深入探索，与其他各家各派齐生并育。不幸，1927年以后，它已明显地与政权力量结合，成为抵御时代精神浸润中国的盾牌。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一直以中国传统思想为基础的文化民族主义统制全国人民思想，反对外来先进文化。签署《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的10位教授客观上起着与国民党统制人民思想、抵御时代精神的错误政策呼应的作用。先生非常清楚，为摆脱这种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的思想统制

---

<sup>①</sup> 陈旭麓：《论“中体西用”》（1982年5月），《近代史思辨录》第42—6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我们曾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1949年后的“全盘苏化”不过是“全盘西化”的变形。先生与唐德刚教授对此的揭示无疑是正确的。但苏联文化继承了沙俄的东方专制主义，有些反“西化”人士暗恋的是“苏化”，两者的差异不能忽视。值得研究的是马列主义成为中国的法定的指导思想后，为何变成了严格封闭的思想堡垒。马老先生的基本观点之一是：由于形成世界市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sup>①</sup>。他建立的是开放的思想体系。这是与现代文化的发展趋势吻合的。当年不少志士仁人和正直的知识分子为了学术自由及内外文化交流，同当局的文化专制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不幸，1949年后，又在几十年间把其他外来学术文化拒诸门外，视为“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思想，称之为“精神污染”之源，甚至宣布要在上层建筑领域实行“全面专政”，导致知识分子噤若寒蝉，文化落后，人民生活困苦，丧失了实现现代化的大好时机。

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不止一端，其中重要的一点也是文化民族主义。曾经广泛流行的社会心理：中国人已经成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为世界上最正确、最科学的科学的代表，我们的责任就是捍卫和在全世界宣传、推广这种科学。这种傲视人类的心态其实就是祖传的天朝大国心理的 20 世纪修订版。

本位文化思想的高峰是“东方文化救世”论。任何民族都以自己的独特文化丰富了人类文化。同时，任何民族文化都有可能上升为世界文化的主流或主流的一部分。但后一可能性要转化为现实必须具备众多的条件，同时要经受历史的检验。本世纪连绵不断的东方文化救世论（最新的说法是：“21 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之所以应该受到质疑，重要的一点是所有这些论断都缺少严谨的论证。当中国正处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程之际，最紧迫的任务是吸取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减少前进中的失误。此时此境这一于事无补的思潮居然大受赞赏，看来只能从民族自大心理的孽根未断去的方面得到合理的解释。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狭隘民族主义往往与来自国外的后现代化思潮结合，而使它略具最新流行思潮的外形。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往往同时面对发展过程的两大课题：走出中世纪，实现现代化；医治现代病走向后现代。从孙文到毛泽东，20 世纪的不少中国思想家都冀图“毕其功于一役”，以空想社会主义模式同时解决两大课题，一举而领先世界。毛泽东且为此以惊人的气派进行了前无古人、后乏来者的经济、社会组织 and 政治领域的三大试验：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革命。这不堪回首的记录早应令中国人彻底惊醒：我们必须脚踏实地首先集中力量解

决现代化问题。尽管现代化是来自西方的概念，只要有益于中国和中国人民，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老老实实在学习和付诸实践呢？是不是由于伴随现代化而出现的种种问题我们就应该停留在中世纪？同时，后现代的问题也只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才能创造合理解决所必需的条件。对为数众多的中国贫苦农民和其他劳苦大众说来，迫切要解决的是基本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摆脱文化低下的愚昧状态，维护最基本的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民主、自由及其他基本权利。如果没有经济和教育的大发展，没有整个社会生活的现代化，从环境问题的解决到人的自由度的提高岂不都是空中楼阁吗？

正当的民族自尊和民族权益是应该坚决维护的，对一个长期受压迫的国家和民族来说更是如此。但历史和现实一再昭示：在这一类国家中也最容易产生一种弱者的自我保护的麻醉心态，人们怯于当前的严酷竞争，乐于从昔日的辉煌中寻找心理平衡和编织未来的幻梦。阿 Q 主义和某些原教旨主义，就是狭隘民族情绪的重要表现；也是前现代化的非市场经济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必然产物。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的知识分子应该有勇气力排众议，让自己的同胞真正睁开眼睛看世界。如果对狭隘民族情绪的危害性缺乏足够的认识，甚至堕入其中而不觉，乃至把严肃剖析本国弱点或介绍别国先进文化的人物诬为“崇洋媚外”，甚至戴上“洋奴”、“买办”等政治性大帽子，只能助长我国根深柢固的文化封闭心态，从而阻滞中国文化的自我更

新过程。

先生认为中国目前在文化上的问题之一是：“参加文化多元主义以至东方主义的大合唱，对全人类的（也就是全球的）主流文化（市场经济、民主、法制）故意唱反调，因而有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危险。”这是虑深识远的卓见和非常适时的警世木铎。

总而言之，不要在我们的祖国最需要吸收各国先进文化之际设置不必要的障碍。值得庆幸的是知识分子中持这种清醒态度的人越来越多了。我非常赞赏以提倡儒学著称的杜维明教授最近所说的一段话：“为了让儒学走向世界，我们绝不能抱残守缺，而且必须主动自觉地吸取现代文明的精华如自由，平等，科学，民主，人权及法治，以作为对儒家传统进行批判继承与创造诠释的资源。我们愈能彻底扬弃三纲之类的权威主义，等级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就愈能弘扬‘为己之学’，‘大丈夫风骨’和‘从道不从君’的儒门家法。”<sup>①</sup>在今日中国，要不要弘扬传统文化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如何弘扬却大有文章。以弘扬为名，行封闭之实，必然步入死胡同。力求洞悉古今中外，冷静地比较各方的成败得失，以切实的忠告和建议，影响正在自然进行的文化融合过程，或可对促进社会进步、繁荣经济文化有所裨益。杜教授和先生近年一再提出

---

<sup>①</sup> 杜维明：《流向全球社群的儒家传统》，美国《世界周刊》1994年11月6日。



的不可忘记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或游戏规则的忠告，不愧为切中时弊的警世良言。

不少中国人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望：令经过现代化洗礼的中国文化成为世界主流文化或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必须经过世界未来发展中的自由竞争与自然选择，方知这个愿望能否实现。好些学者为此孜孜不倦进行学术探索，理应得到应有的同情、理解和尊重。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实践问题。成功与否的关键是中国人特别是占大多数的大陆中国人能不能创建一个各个领域都高于西方的中国生活方式，并为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所倾倒。这个打上中国标记的生活方式，应该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和提高速度、文化学术的繁荣、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社会的和谐、自然环境的良性循环等方面，无不被世人公认远胜于西方及其他国家。经过多次幻灭的国人不难了解，100年内将有17亿至20亿以上人口重负的中国有无此等殊荣，实应大大存疑。更远的将来则要看子孙后代如何努力，更非我辈所能预测。“临渊羡鱼，毋宁退而结网”。有志于此者应该集中精力于当前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化大业。

### 文化重建之路

先生指出中国目前文化面临的另一问题是“完全丧失了固有的传统，而有使民族成为一盘散沙，社会越来越混乱的危险”。这是严肃地提出了文化与道德重建的问题。

出于对当今空前迅猛的中国现代化进程避免半途而废的善良愿望，许多学者都在严肃地思考这一问题。我想，这是当前出现文化热的重要背景之一。

尽管多年来我们对文化的基本设施（学校、图书馆、大众传媒……）和文化遗产者——知识分子的给予是极为吝惜的，在发表宣言、提出主张、发明一个又一个似曾相识的范式上却十分奢侈。愚意以为，正确的理论模式固然重要，当务之急是总结历史经验，寻找足以令中国现代文化平实地发展的长治久安的道路。

150年间为中国现代化寻求恰当的文化模式，历代哲人提出的主张很多；但从思维方式看，归纳起来不外三种：一是中体西用论。从冯桂芬、张之洞到杜亚泉和当代新儒家的思想，大体上都属于这一类。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从中国传统思想中寻找必须坚持的大本大原，同时又程度不同地鼓吹采纳西学。二是西体中用论。如果不是按片言只语，而是从其思想实质看，上一世纪60—70年代先后主张学习西方必须抓住本原的王韬、郭嵩焘可算这一理论的鼻祖。<sup>①</sup>1895年至本世纪初的严复思想亦属这一类型。本世纪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有二：一是胡适及其他自由主义者。1935年明确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熊梦飞

---

<sup>①</sup> 参阅拙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第六章，海天出版社1992年版。



教授对这一理论颇有建树。<sup>①</sup>另一则是毛泽东。他主张“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尽管同胡适等人政治取向迥异，但都以西方思想为本原。80年代李泽厚鼓吹“西体中用”，无非是步前人后尘而添加了自己的诠释。三是兼容并包、择善而从的理论。新文化运动中的蔡元培的言行，是这一主张的典型。最近，美国华人学者周策纵教授主张以“中外为体，中外为用”，强调“不附加狭隘的框框，可容许各个人或集体作不同的选择和决定。作为中外文化取向的原则，这也许是比较少流弊的一个”。<sup>②</sup>或许是这一主张最明确的表达。先生提出：“以全球化的普遍规律为体，以中国特色为‘用’”。<sup>③</sup>在我看来，也是属于这一类的。我想，这一类主张的可取之处较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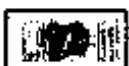
首先，这类主张彻底抛弃了阻碍各国文化交流的框框，体现了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复兴的正确道路。历史上，没有那一个国家是因为吸收各国先进文化而灭亡的。相反，封闭或半封闭的国家则必然经济落后，人民困苦。多少年来，不少人总是以向别国学习就将丧失民族特性恐

---

① 熊梦飞：《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闲天》（1935年6月），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13-532页。

② 周策纵：《“中外为体，中外为用”——中国文化现代化刍议》，《中国文化》第9期第7页。三联书店1994年2月版。

③ 李慎之：《全球化时代中国人的使命》，《东方》1994年第5期第18页。



吓自己，“以夷变夏”简直罪不容诛，“崇洋媚外”的“洋奴”、“买办思想”乃至“卖国贼”等帽子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形成了一个混淆文化学术与政治的恶劣传统，使文化学术受尽摧残。可是，同是回应西方的冲击，日本明治维新因开放而兴，中国的洋务运动却因封闭而败。人们津津乐道日本和四小龙的“儒家资本主义”，视之为东方文化再度辉煌的典型。但我们不能忽视他们成功的首要因素是善与人同。所谓“同”就是先生说的“普遍规律”，或现在流行语汇中频频出现的“与国际接轨”。美英法德等国没有因为实行大体相同的制度而使自己的国家特色消失，他们各自的文化异彩纷呈。东方的后发展国家和地区也没有因与西方“接轨”而令自己的鼻子隆起。不但“接轨”过程因传统不同而各有特点，“接轨”后因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改善、文化素质提高而进入文化发达的行列，各自的优秀传统文化也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发扬。我想，这就是先生说的“一体多元化”的意思，这是振兴民族文化的必由之路。150年的历史已反复证明，晚清以降，那些以国家、人民利益的代表自居而抗拒时代精神之辈，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都误国殃民，延误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现代文化在总体上必然是时代精神与民族特点相结合的。从满汉权贵到国民军阀无不以“国情特殊”，抗拒时代潮流而成为历史罪人。今天没有任何理由让人又以文化不同、国情特殊为借口，再度延误现代化的进程。

其次，这类主张更符合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公共权



力（主要是政府）的行为可以促进或延误文化建设。看看夜以继日连绵不断的公私“便宴”的豪华与大小图书馆凄凉境况的强烈反差，应知此言非虚。（1993年有1/8的公共图书馆，没有买过一本新书，40%则购书不足100本；在进口大幅度增长，造成一百多亿美元赤字的情况下，图书进口却减少了1/3！）可是，文化自身却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主要的一点是：受社会发展进程的制约，在民众依据自己利益和爱好的选择中优胜劣汰。其中既有主流与非主流的更迭，也有各自特点的自然兴亡和盛衰。这个领域除了制度层面的变革有时有所例外，主要是在自然流行中实现自己的延续和推陈出新过程的。没有人下令禁止穿长袍马褂、凤冠霞帔，但流行的却是西装革履、T恤牛仔褲。任何公式都难以主宰文化潮流。同时，由于大小不同群体的传统、利益和爱好的差异，除了时代精神能在反复碰撞中穿透一切外，在世界范围中固然出现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在各个国家中也必然出现文化多元竞存的状态。如果以行政或宗教的权力强求一律，得到的只能是文化停滞和社会矛盾的激化。因此，不拘一格，以“中外为体，中外为用”，让各家各派自由探索、自由交流、自由争辩，才是最适于现代文化生长的环境。包括哪些主张真正体现了时代精神，最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所有文化学术的是非、真伪、轩輊，都必须在这样的学术文化多元并立，和而不同，自由探索、交流和争辩的环境中去检验与找到自己的位置。只有形成了这样的文化生态，才会有适应全球



化时代需要的文化繁荣，也才能一劳永逸地了结已延续百年的体用之争。

也许有人马上会问：这不是主张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鼓吹自由化吗？我对有这类疑虑的朋友的回答有三：

1. 强制能不能令人相信马列？年纪大的朋友大约还记得，50年代曾流行过一本书，是苏联的重要领导人加里宁写的《论共产主义教育》，他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执掌政权后究竟怎样宣传马克思主义才能令人信服？苏联一直没有解决好这样的问题，加上其他原因，终于冰消瓦解。他们的惯用手法就是学术文化的是非定于一尊，随之而来的是大批判、大镇压。令中国知识分子谈虎色变的历次运动不过是西伯利亚寒风的余威，那些棍子专业户无非是北极熊的徒子徒孙。这条错误道路千万不能再走了。

2. 怎样证明与保持思想理论的正确？“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句句是真理”，都是大奸巨恶实行法西斯专政的理论武器。怎样鉴别理论的是非真伪？可操作的理论能不能在招致巨大损失的实践之前识别其谬误，而不可操作的理论又如何判断其是非？最重要的一条是要有充分自由的讨论。正确的主张只有在自由争辩中才能说服别人，扩大自己的影响，而那些鱼目混珠的假货也可及早败露。相反，不准自由交流和讨论，不但令理论本身僵化，也给别有用心之徒以可乘之机。同时，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推陈出新，否则就会为不断前进的社会生活所淘汰。而没有压

力和挑战，不吸收永无止境的人类文化新成就，就没有前进的动力。万喙息响，大众遭殃的图景记忆犹新，奇怪的是有些人居然千方百计冀图在学术文化领域恢复和巩固大小不等的唯命是从的王国。在冠冕堂皇的旗号下，真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3. 如何正确对待多元的思想文化？我国当前的现实是：经济利益是多元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也是多元的。要想回复到思想统一、万众一声的境况已经不可能。近两年，从北京、上海至东北和广州，有多家官办刊物发表的文章都确认这个学术思想的现实。经常走在时代思潮前列的文学艺术早已主义纷陈，目不暇接。就以素以阵势严整著称的哲学来说，近年也旗号繁多，多家争鸣已经取代一家独尊的局面。孤陋寡闻如在下，亦可屈指点出若干名家。仅近年有论著为证者，马克思主义阵营内有高清海的实践唯物主义，乌杰的系统辩证法。在非马克思主义方面，刘小枫在他流传甚广的著作《走向十字架上的真》公开申明：“我从美学、心理学、哲学转向神学，首先是出于个人的信念，随之是学术的意向。”他的“我信”是：“十字架上的真仍然是照射着此世的强光。”<sup>①</sup> 张志扬则以《门——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写下自己对存在主义的追求。主张以儒学

<sup>①</sup> 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1994 年版前言第 3 页。

为中国文化重建的基础的人更有人在。翻开深得知识分子喜爱的《读书》杂志 1993 年第 4 期，有位作者便以《复兴儒学》为题写下这么一段话：“读了费孝通先生的《孔林片思》，我深感当前复兴儒学的必要。”早以提倡儒学著称的蒋庆教授 1992 年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海内外公认的一流学术杂志《中国文化》上撰文断言：“中国近百年来在文化建设上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政治文化重建的问题，……公羊学大一统思想是解决当代中国政治秩序合法化问题的非常深刻的政治智慧，这种政治智慧在促进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重建上将会起巨大的积极作用。”<sup>①</sup>上海学人罗义俊亦以提倡儒学为职志。当有人问李泽厚：“如果把您称为新儒家，您愿意吗？”他的答复是：“愿意。但不是现在港台那种新儒家。”<sup>②</sup>作家张承志则立誓“做一哲合忍耶的笔”，将之献给他“终于找到的人道主义”。<sup>③</sup>哲合忍耶是中国回民的 40 个不同教派团体之一。

他们的许多观点在下均不赞同。但上述情况证明，不管人们是否喜欢，多元文化的格局已在中国大陆形成。马克思主义者面对这样的现实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如果按照棍子党余孽的思路，大约是主张再一次“横扫千军”，

---

① 蒋庆：《儒家大一统的政治智慧与中国政治文化的重建》，《中国文化》第 6 期，第 165-166 页，三联书店 1992 年 9 月，北京。

② 《李泽厚答问》，《原道》第 1 辑第 3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

③ 张承志：《心灵史》代前言第 7、10 页，花城出版社 1991 年。





重建“全面专政”。可是，这种与现代文明为敌的蛮横，还会有多少人赞成呢？毛泽东生前尚且容许熊十力、马一浮讲自己的儒学，为什么今天提倡儒学或其他学派倒成了弥天大罪呢？同时，基督教、伊斯兰教在我国都有以千万计的信徒，儒学的支持者恐怕也为数不少，又有什么力量能压服他们不探讨自己的理论和信念呢？著名作家刘心武说得好：“关于在我们这个国家所出现的多元艺术现象，至今仍有人采取着鸵鸟般的态度，他们说：‘还是不要提多元，还是提多样的好！……对于不尿你那提法一壶的人，你可怎么办呢？禁绝？把他灭了？法律依据是什么？做得到吗？而且最关键的是：这样做对发展我们民族的文化艺术有什么好处？恐怕只有坏处！”<sup>①</sup>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何尝不是如此！

在文化领域当然可以和应该运用行政权力强制实行一些措施。例如，大多数国家都有限制黄色和黑色（暴力、恐怖）文化的法令，德国还有禁止法西斯宣传的法令……如此等等，都是必要的。

可是，对于一切正当的文化学术来说，唯一正确的做法是让诸子百家自由探索，自由论难，不予干预。真正相信自己的理论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这样的环境中以理服人，树立自己在学术、理论和文化上的优势。这就

---

<sup>①</sup> 刘心武：《你只能面对》，《读书》1993年12期第6页，三联书店，北京。



是毛泽东曾经确认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尽管他后来践踏了自己的正确主张。

要培育一个适应全球化时代需要的文化生态，让多元并立，和而不同。但与自然生态不同，文化生态是人们自行建立的。因此，归根到底要让越来越多的人具有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心态，了解时代精神不可抗拒，各种文化各有所长，应该和平相处，自由交流；懂得学术无国界，学术自由是现代文明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现代文明进步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之一，不要再做摧残文化及其载体——知识分子的野蛮人。

在我们的祖国，文化教育和学术领域的左毒还没有彻底清理。宣扬现代文明的基本知识居然仍是不可缺少的工作，说来真叫人脸红。有渎清听，敬请原谅。

后学

袁伟时敬上

1994年12月5日

## 学术的尊严与学者的自尊 ——“百家争鸣”40年祭

---

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至今已整整40年，不但历史记录不堪回首，学术研究和讨论的现状也与各方的期望相差很远，百家争鸣的学术文化繁荣活跃的景象仍未出现，已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应该如何改变现状，这是值得人们认真思考的问题。在笔者看来，为了人文与社会科学繁荣和正常发展，有几个思想认识是应该弄清楚的。

### 承认和尊重学术的独立地位

学术活动既要继承和传播文明的已有成就，更要探索未知世界。学术成果可以为政府或政党所采纳

和利用，但学术本身毕竟与政治活动有别。这本来是不言而喻的常识，但在当代中国，由于沿袭至今的仍是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学术管理体制，反复解释这个道理就很有必要了。

学术的独立地位是由它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有的本来就是远离政治的。金文、甲骨文的考释、古代文献的整理、莎士比亚研究……诸如此类硬要扯上哪一阶级的政治，不过是牵强附会的笑话。即使是那些与政治或政策的制定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学科，学术研究作为探索未知的活动，其独立性质也不容侵犯，否则就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最雄辩的事例是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粗暴批判。由于政治权力的介入，人口理论的客观研究被迫中断，从而使人口政策的制订失去客观依据，没有及时控制人口的增长，我国不能不承受多生几亿人的沉重负担。目前仍以10年增加1亿以上的速度递增，非到下个世纪中，无法实现零增长；而要适度降至合理水平，更是下个世纪末的事了。由此招致的对社会发展的阻滞，不堪人口重负的环境破坏等等，真是触目惊心。

一个健全的社会，政府政策的制订必须有学术的自由探索为先导，施政的结果也应有人们从多个视角进行的分析、总结、评估。如果能因而形成不同的理论、观点或对策，更是利国利民的好事。聪明的政治家和官员可以从中汲取智慧，避免重大失误或重蹈覆辙。可不能反其道而行

之，以现行政策为学术探讨不能逾越的界限，鼠目寸光把学术视作现行政治或政策的工具。后一认识混淆了学术和宣传。政党和政府都要作大量的宣传工作，争取公民认同其政策和行政措施。宣传工作必须以既定的原则、方针、政策为依归，必须严格遵守各自的领导规定的纪律，不允许自由发挥。而由于社会功能不同，学术研究的自由则是其正常生存的必要条件，受到一切文明国家坚决保护。

### 尊重不同学派，正确处理学派关系

百家争鸣必须以各家各派的存在为前提，但历尽劫难的中国学界却讳言学派。其实，与政治党派不同，学术流派不一定有固定的组织，但有重大成就的学者，其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必有人追随和发展，在学术领域形成大小不等的影响，并有可能发展成为大小不同的流派。而人的认识不可能完全一致，学术又总要推陈出新，不同流派的争鸣是不可避免的。

说那一个国家或地区没有学派，等于嘲笑那里学术凋零，只能说明或是那个国家学术研究非常落后，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成果；或是那里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学者们在高压下噤若寒蝉。

中国有没有不同学派？当然有。以近代中国的研究来说，从鸦片战争至新文化运动几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都有不同学术观点的重大分歧。在这些分歧背后则蕴含着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取向。以解释这段历史的理论框架

来说，已经公开提出的有三大革命高潮（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纲派，亦有从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为基本线索的流派，如此等等。研究方法上则有以论带史派和以史料为基础的流派……。

由于我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水平不高，不同流派的发展亦处在较低的层次上，还没出现在世界学术界领一代风骚的大学者、大流派。都说要振兴中华文化，窃以为万众企盼的这个振兴的标志就是出现这样的大学者、大流派。譬如，出了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等人，世界各地华人普遍感到与有荣焉。有一天，在中国本土有人获得了诺贝尔学术奖，我们的有关科学大约就真正达到或接近了世界先进水平。同样，只有我们出现了罗素、萨特、胡塞尔、哈耶克、罗尔斯之类的影响世界学术进程的大学者、大思想家，出现了新时代的孔孟老庄，我们才可以无愧地对世界说，中国文化已经重现辉煌。

40年的经验证明，不尊重不媚俗谄上的学者和学术流派，不为学术文化的自由发展提供合适的社会环境，是阻碍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最大障碍。

中国学界本来基础薄弱，创见不多，可怕的是有人拿着固定的尺码去量度一切，凡不若合符节的就视为异端，甚至戴上各式政治帽子。于是，慎言避祸成为第一信条，知识分子的创造锋芒销磨殆尽，震古烁今的大学者、大学派又怎能脱颖而出？！

其实，这些以涤荡学术生机为己任的人物的言行才是

对马克思主义的亵渎。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以强力迫使别人尊崇自己的理论；他们是以对事物全面、系统、深刻的研究赢得人们信服的。恩格斯早就指出，原则不是研究问题的出发点。这些人往往既没有系统读马列，没有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更没有对所评论的问题进行切实的研究，仅能以与学术格格不入的专横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如果这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代表，两个深深的脚印至今仍留在大英博物馆阅览室中的马老大爷地下有知必然再一次斩钉截铁地说：“我只知道一点，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40年的惨痛教训表明，对学术发展最不利的是来自行政力量的不恰当干预。提出百家争鸣方针的初衷本来是“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因此，“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sup>①</sup>不幸，这个正确主张却一再受到践踏。

历史的记录固然不堪回首，时至今日仍有人认为学术研究的自由是资产阶级的，不知道这是我国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

至今仍有人企图用行政权力去判定某一学术观点或学术论著是有害的“毒草”，然后花很大力气去组织所谓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8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



“学术批判”。他们不敢正视 40 多年的绝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所谓“学术批判”不外是“以无知批有知”，以愚昧和野蛮去摧残学术文化。他们不知道一进入学术领域，任何人的观点都只能自由地在平等地位上进行讨论，让广大读者、实践和时间去判断其是非。学术领域不应有“专政”或“训政”。正常的学术领域只承认一种交往方式：自由讨论。

与其他国家（如德国）的学术批判（那是需要另外诠释的概念）不同，苏联与中国的所谓“学术批判”有两大恶果。一是败坏学术，歼灭了学术文化的发展的生机，致使中国的学术文化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令本国的现代化事业失去学术文化发展的强有力的支撑，一些所谓重大成果不过是一些假冒伪劣的货色，招来国家和民族的羞辱。二是败坏了学者和学术文化领域的道德。“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造就了一大批不愿潜心学术，而善于先意承旨，断章取义，打小报告，打棍子以猎取名利的大小“学术”明星。

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所以能在我国长期存在，一个重要原因是 40 多年间我国高等教育的失误。大学生是党政官员和学术新血的预备军。他们所受的教育强烈影响着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可是，他们接受的是阶级斗争为纲的信念，耳闻目睹的是“学术批判”（“革命大批判”的别名），习惯于在学术论著中寻找政治或思想问题，却对国内外有关学科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所知甚少，对国际间公



认的学术讨论和学术研究的基本准则也不甚了了。于是，当他们掌握了文化学术的大小领导权力的时候，顺理成章地把反常当作正常，制造和演出一出又一出的历史悲剧。管理制度上的缺陷不能得到及时的改革，也是与这个认识基础有密切关系的。

### 确立学者的自尊

社会环境无疑是学术盛衰的决定因素。但同样身处逆境，有人沉沦，亦有人奋起，用张载的话来说是：“贫贱忧戚，庸玉女（汝）于成也。”<sup>①</sup> 近半个世纪的最大损伤之一是相当多的学者失去了自信和自尊。如果不治愈这个内伤，所谓学术的争鸣与繁荣不过是镜花水月。

学术是继承，更是发展，其真谛在推陈出新，标新立异。失去自信与尊严的所谓学术，不过是经典与权威脚边的跪拜。“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sup>②</sup> 此类恒河沙数的“论著”，在学术编年史上如果能留下什么印记的话，那就是思想停步，学术受难。历史的经验已经一再证明，学术上缺乏足够的自信而又冀图以学名世之士必然另找捷径，其下焉者往往攀高枝，结党援，播是非，以套取现实的名利。

学术的尊严来自对本身价值清醒的认识。

---

① 张载：《西铭》。

② 陈寅恪：《文章》。

学术研究是对未知世界寂寞的探索。任何学科的每一进展，都是思想文化前进或重或轻的足音，除了后来者以诚实的劳动和智慧取得的新进展外，任何力量都无法抹煞或取代它的存在。人生价值从中得到实现，这就是学者的尊严所在。

人文与社会科学中有的关乎现实世界的利益。这就牵涉到两个问题：

一是在权势与学术观点发生矛盾之际，要不要按照权力的意志修改学术？学术有尊严，它只能率直地告诉世人，它自身的结论是什么。如果可以按照权势的意志去修改，学术自身便堕落为奴仆的谰词。学者有祖国。建设一个富强、自由、民主、文明、统一的现代化国家是中国人的根本利益所在。学者为现代化事业服务的途径是诚实地研究和传播学术。40多年来，我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有过令人痛心的失误。除了上面已经提及的人口失控外，诸如反右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否定市场经济、不重视教育等等，无一不与没有听取正直学者的直率忠告有关。“毋曲学阿世”，汉代学者的这句箴言，至今仍熠熠生辉。

另一是当外力在学术领域掀起风浪之际，潜心学术之士应该持什么态度？本是学术观点分歧，突然成了政治斗争；本是学术探索，被人扣上“政治错误”乃至“反动”的帽子……无风三尺浪，雨天两脚泥。面对这些屡见不鲜的现象，学人何以自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

是学者的本色。随声附和，识者不为。争鸣仅是有研究的同行的交流。如果喧嚣向你袭来，适当给予答复和揭露，坚决维护学术研究的权利，有时是必要的；但更多的时候毋宁记住鲁迅的一句名言：“最高的轻蔑是无言。”真正的学者没有必要浪费太多时间去擦清粗野的痰污。

“科教兴国”。学界内外都期望学术的兴旺发达，早日出现大师辈出、百家鼎立的春天。回顾 40 年的历史经验，一是学者要把目光紧紧盯住书本和有关的实际，虚静守一，专心致志；二是朝野关注祖国命运的人们共同努力，尊重学术的尊严，让百家争鸣扭曲为阶级斗争的噩梦彻底消逝，不要随意惊动学苑的安宁，并为学术活动的正常进行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让有志学术之士无后顾之忧。不过，后者能否实现有许多捉摸不定的因素，不是书生的善良愿望所能左右的。学术的尊严归根到底要由学者自己去维护。在同样的客观环境下，人们可以作出多种不同的选择。做人的尊严是治学尊严的前提。因此，在中国真正要维护学术的尊严必先在学者中力倡传统的美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并让人格和睿智的尊严不断注入自己的笔端，在学术创新中实现人生价值。

原载《开放时代》1996 年第 4 期

## 人文精神在中国：从根救起

---

《读书》杂志编辑部以其卓越的胆识，在该刊今年3~5期用大篇幅连续刊出《人文精神寻思录》。十位上海学者的敏锐、深邃的议论，读后如聆黄钟大吕，绕梁三日。人文精神是现代文化的重要动力和灵魂。60年前十教授不太高明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曾激起轩然大波；今天十位青年才俊满怀历史责任感的寻思，更应群山呼应。为先驱呐喊，义不容辞，浅陋之处，敬候指正。

### 人文精神的界定

在评论人文精神在中国的命运

之前，必先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何谓人文精神？二是它的兴衰由那些因素决定？

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人文类型的，它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其基本理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内圣外王之学，注重探讨理想人格与理想世界，即对君子圣贤与大同世界的追求，体现着终极关怀的人文精神。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能不注意到，同一切文化一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也非常复杂。以后儒所讲内圣外王之学来说，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道德修养和治国安民之术，加上它长期附丽于中世纪社会制度，内容颇为驳杂，非经剥离、筛选乃至重建，很难显现其内在的人文精神；而这一加工改制过程的参照系，通常又来自外来的现代文化。因此，在笔者看来不必匆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之间画上等号。在肯定中国传统文化有人文精神资源的同时，应该更多关注现实，不必以它作为今天寻思的焦点。

那么，究竟什么是人文精神呢？学术界有不同解说，但也有不少共同点。综合起来，有几个要点是不能忽视的：1. 重视终极追求，执著探求超越现实的理想世界和理想人格。2. 高扬人的价值，否定神和神学对人的束缚。3. 追求人自身的完善和理想的实现，在肯定人欲的合理反对禁欲主义的同时，亦反对人性在物欲中汨没。4. 要求个性解放，建立人际间的自由、平等关系，实现自身的价值，反对宗法等级关系及与其相应的意识形态束缚。5.

坚持理性，反对迷信、盲从和认识领域的强制服从。虽然有的内容古已有之，但完整的人文精神是从文艺复兴时代逐步发展起来的。这些内容互有联系不应随便割裂。例如，只讲终极关怀，就有可能流为宗教玄谈，而失去了改善现实世界人文环境的追求；反之，则可能坠入理想沦丧的境地。人文精神是人类文明累积的成果，它比人道主义的内涵更为丰富。在现代社会，人文精神的培育应该是人们经常关注的重大课题；应是通常说的人的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把它视为“资产阶级的”而不屑一顾是不足为训的轻率和无知。

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年代，人文精神有盛有衰，这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呢？首先要明确，盛衰的主要标志不在于是否出现几个深具人文精神的思想家，而要观察在一定时空下的人群状况。黑夜有巨星，即使在最黑暗的年代，也可能有勇士在抗争中迸发耀眼的光芒。而就一个国家的群体状况而言，这主要取决于四个因素：1. 政治上实行的是民主还是专制制度以及民主化的程度。2. 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活动的自由度。以上两点是决定人的地位的基本框架。群体的人文精神指标是应该由人的解放程度去标定的。3. 教育状况。这是提升一国人民人文素质的主要途径。4. 文化传统和人文学者及文化人的状态。谈论人文精神而不全面考察上述因素，就会失诸片面。

### 觉醒和复苏的基础

近年来，关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学者不断惊呼：市场经济的大潮淹没了人文精神。这个深沉的呼声提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市场经济与人文精神的关系。我们的讨论也应该从这里开始。

市场经济无疑对人文精神有强烈的消蚀。理想的追求为现实的利害计较所取代；感官的满足成了文化的最高指令；庸俗文化淹没高雅文化；金钱的权威冲决道德堤坝；日益扩大的财富差距亵渎着社会公平；以新技术为基础的话语霸权箝制着人们的思想自由……诸如此类的世界性的市场经济固有的弊端已足令人忧心忡忡。而中国独有的下海狂潮——“知识分子大逃亡”，更不能不令忧时之士摇头叹息，为文化前景悲痛欲绝。

不过，上述负面作用仅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方面，更值得重视的是市场经济对人文精神确立的正面作用。如果考虑到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特殊环境，其利弊得失则更为清晰。

中国的特殊国情是长期实行全面的计划体制。在这个体制内，个人从属于“单位”，即使经过10多年改革后的今天，个人选择的自由也极为有限。学生要转系或变换一个适合自己的专业，已就业的知识分子想离开原来“单位”，走上更适合自己的岗位，费九牛二虎之力，仍不一定能如愿以偿。择业自由的丧失往往导致心灵的自我禁

徊；加上祸从天降的事例屡见不鲜，避祸心理在广泛蔓延；即使在灾祸威胁减轻后，个人才智的伸张受到不应有的压制的现象仍司空见惯。身处此情此境，人的价值的实现迷惘缥缈，人文精神的隐没成了不可抗拒的趋势。“下海”热是在这个特定情境下出现的。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千方百计冲出学苑的首要因素是对现有体制不合理束缚的反抗。经济收入不足以维持适度的尊严，有时倒成了第二位的原因。而人文精神的丧失，也是现有体制的产物，不能倒果为因归罪于他们宁可跳入商海却不固守书房。

不仅如此，深入一步去考察，中国知识分子置身于这个市场经济的大潮，还有极其深远的作用。

第一，这个行动本身就是自由空间的开拓，人的因素的解放。

尽管由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还远未健全，权钱交易破坏法制的行为仍层出不穷，但知识分子也在市场中找到了可以自由伸展自己手脚的空间。由于市场和法是经济活动的最高主宰，中国知识分子终于有了打开束缚自己手脚的超经济桎梏的钥匙。检视一下中国大地成千上万成功的企业家，人们不难发现，他们大都是过去默默无闻甚至身处底层，被领导看不顺眼乃至视为异端的人物。如果不是市场竞争提供的成功机会，他们只能郁郁不乐，在长期慢性的压抑中耗尽自己的生命。不妨回眸看看 50 年代 55 万“误划右派”，他们中有多少才华横溢的优秀人物！假若当日也有经商的自由，说不定已经造就出一大批驰骋



海内外的企业家！早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已经认识到：“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摇动。而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sup>①</sup> 80年前的这段话真是发人深省。从“中国特点”的视角去审视，知识分子的“下海”，真有点像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离家出走那样，往往具有浓烈的个性解放气息。说得极端一些，这简直是人文精神的恢复和发扬！

第二，这是改革的强大推动力，改善了原有体制下的知识分子境况。

人们为下海潮导致好教师、好学者流失而痛心，甚至虑及由此导致民族素质的下降。其实，决心告别书房的赶海者在教师、学者、文化人中所占比重一直不大，90%以上的有关人员仍然在原有体制乃至原属单位中生活。不过，这少数“逃亡者”却为改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80年代末，广东发生了震动全省上下的一场风浪：大量的中小学教师蔑视人事制度、户口制度，不告而别。仅百多万人口的东莞市在不到一年间就有一千多教师自动流失，在商海中自由遨游。这件事的直接效应却是教师待遇得到明显改善。不但赶海人为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创造了条件，知识的价值也有所提升，虽然还远未达到应有的水准。同时，这类自行出走事件10多年来层出不穷，它

---

①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二卷第四号。

所造成的威胁和压力是长期的和广泛的；它对改革的推动作用也必然是长远的。

突出的事例是人才流动政策终于出台；被正式认可的人才招聘活动（近年已正式定名为人才市场）也方兴未艾；大学毕业生大都可自行择业，计划分配制度大体上已名存实亡。这些制度性的变革标志着知识分子自由活动空间的扩大。在中国大陆的编年史中，这是人的解放历程的非同小可的进展。它对张扬人文精神的实际效应绝非几篇愤世嫉俗的文章所可比拟。

第三，提高了企业家阶层的素质，为人文精神的振兴开始铺设坚实的基石。

百多年来，人文精神在中国一直若断若续，经不起风浪的摧折。它很大程度上是救亡热忱加外来文化所激发的光华。历史好像有意捉弄人，从戊戌前后的第一次启蒙运动，中经新文化运动，直至80年代开始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热潮，提出和讨论的问题竟惊人地相似。世纪之初，流亡在日本的梁启超以启蒙大师的胸怀，笔底风起云涌，大声疾呼：勿为古人、世俗、境遇和情欲之奴隶，“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穷！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狂澜滔滔，一柱屹立，醉乡梦梦，灵台昭然”！<sup>①</sup>不幸，国经三朝，中国人在思想上面临的重大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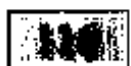
---

<sup>①</sup> 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饮冰室全集》，专集之四第47-48页。

题，依然是任公当年提出的如何“自除心中之奴隶”！差别仅在言语略有改变，时新的说法叫“思想解放”。

撇开个别人的特立独行不说，从全社会的状况去观察，思想文化脆弱的重要根源在经济基础的不坚。从本世纪初开始至抗日战争爆发，知识分子的收入较丰，他们有能力自己掏钱办刊物，自办书店（出版社）出书；鲁迅、胡适、梁启超、巴金这些不同流派的文化巨人都有这样的记录。可是，全国性的市场网络仍欠发达，地区性的经济封闭状态没有打破；民间工商业者势单力薄，经济力量控制不了军事力量，自由思想在军刀威胁下挣扎，人文精神往往沦为文化沙龙中的谈助。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们一律归属各单位管理，思想统一，理想一致，经济平均，对人的价值及未来理想的探索，动辄得咎，普遍视为畏途。

没有经济基础的重建，人文精神的重建便是沙滩上的楼房。80年代开始发展的市场经济，不愧为改变中国面貌的基本力量。它在三个方面直接影响着文化的走向：一是都市大众文化空前繁荣。二是知识分子中重新孳生出一批不受雇于任何“单位”的自由人。尽管也有制造文化垃圾之徒混迹其间，但其主流或是在市场竞争中锐意创新，或是在自己的产品中倾注着真诚和深沉的追求。一些受海内外有识之士广泛关注的佳作已从他们手中诞生，而其深远影响目前还难以估量。三是以资金回报文化。已有一批在商海惊涛中脱胎换骨的大型国有企业（如宝钢）拿出数以百万计的资金支持高雅文化。更引人注目的是近年在大



陆本土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家以大小不等的资金资助文化事业的事例也已屡见不鲜。再加上热爱祖国的港澳和其他华人企业家的慷慨支持；包括人文学科在内的文化事业资金来源多元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现实。显然，时至今日，人文精神的滋长已经开始与新的经济基础结合，虽然这个基础还很薄弱，而这个状况很可能是历史性转折的起点。

我们不能离开上述背景去评论知识分子的下海现象。在现代社会，知识分子、企业家、政治家的角色转换本来就是社会运行中的常见现象。教授从政、办公司；倦游归来，又重执教鞭；如此等等，根本不是新闻。在中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作为现代化事业主要推动力量之一的企业家阶层无论素质还是数量都与客观需要极不适应。他们主要来源于大小官员（包括基层干部）和体力劳动者，很大部分文化水平不高。他们之中不少有志者不断磨砺和提高自己，不能以学历高低判断他们的实际水平。除了这个途径，鼓励、支持知识分子加盟，应是造就一代适应高科技时代优秀企业家的事半功倍的重要道路，十分有益于提升企业家阶层的素质。而从社会全局去观察，离开强大的企业家阶层，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人文精神云云，多半会沦为知识分子怨天尤人的激愤或不切实际的空想。如果更深入一步去考虑，世界经济已一体化的今天，默察中国的现实，能否源源不断地造就人数众多、素质优良的现代企业家（包括金融家）阶层，已经成了关系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此举关系民族盛衰，即使

小有牺牲亦是社会进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任何社会现象都必须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观察。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投身于市场经济对人文精神的培育，积极意义远大于负面效应，这是由中国正处于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他们中会出现一大批有远见卓识的“儒商”。终有一天，他们会创建出可与福特基金会、哈佛大学媲美的基金会与大学。这些弄潮儿给人文学科研究和人文精神培育的回报必然是丰厚的。

上海的学人说得好：“人文精神只能是在与时代的对话甚至齟齬中产生的。”<sup>①</sup>当前人文精神低沉的重要表现是没有找到恰当的话语主题。只有深刻观察现实才能有真正的超越。要是说70年代末至80年代由于封闭已久，人们可以用洋理论加上俯拾皆是的荒唐而大发议论的话，时至90年代，这样的机会日益减少。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带动下，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化。斑驳纷纭的现实，急剧转化的社会，为新的思想家、理论家的涌现准备了沃土。可是，中国不少知识分子似乎没有珍惜这个机遇。新的时代已经不可能再现通晓一切、指点一切的启蒙大师，而好些人似乎还没有在故土中找到自己的切入点。每一领域都有必要和可能诞生充满人文精神的深邃之作，而荒芜景象却屡见不鲜。以经济领域而论，孤陋寡闻如我辈至今无缘读到《国富论》式的中国自己的震撼人心的经

---

① 《人文精神寻思录》之一，《读书》1994年第3期第6页，北京。

济哲学著作。一些人文学者宁可追随洋人高谈后现代化时代的种种难题（适度的注意自然是必要的），却对正在面对的现代化过程的有关课题缺少寻根究底的足够兴趣和勇气。显然，如果不下决心系统研究各自面对的领域，系统全面地分析市场经济体制下各领域的变革，人文精神就只能依旧若隐若现地在半空中飘荡。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人文精神的复苏准备了物质基础，缺少的是人文学者扎扎实实的基础研究。

### 教育失误与话语系统

痛责人文精神失落的学者看来对一个问题重视不够：当代中国几代人没有受到足够的人文精神的熏陶。这是多年来教育工作重大失误的恶果。

首先，50年代学习苏联，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学院系调整，实行人文与科技教育分家的错误政策，在着重发展的科技类院校中一律取消人文和社会科学院系。于是人文院系急剧减少，六亿人口的大国居然出现了只办一个哲学系的咄咄怪事。不但人文学科严重削弱，而且令学科技的大学生在人生观形成的最重要时刻失去了接受人文教育的机会。在这个错误思想的指导下，甚至高中学生也实行了文理分科。这个歧视人文教育的错误登峰造极，便出现了“理工科大学还要办”那句众所周知的名言。

其次，与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相背离，一再批判通才教育，把人文课程从大学生的公共必修课中清除出去。其

实，通才教育的实质是公民素质和人文精神的培植，是为专门的学术与科技工作奠定牢固的基础。我们执掌教育大权的人却离奇地把它看作资产阶级的偏见而坚决加以摒除。80年代人们察觉这个失误后，一些科技大学开始恢复人文及社会科学院系，但仍以社会科学系科为主。一些大学在公共课程中增设人文课程，但通常也仅是选修课而已。

1949年至1989年，中国高等学校培养了676.8万毕业生。他们现在大都已成为各个领域的骨干。可是，除了善于自觉补充自己的不足者外，学校教育的失误带来的素质缺陷，不能不影响他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目前，从各级领导教育的官员到大中小学校长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授、教员，不知人文精神为何物，不了解人文精神低下的公民难以经受21世纪剧烈竞争的现象并不罕见。这是我们在观察中国人文精神状况时不能不正视的现实。

再看看中学教育的状况，情况就更加清楚了。中国有机会接受大学教育的青年毕竟只是少数幸运儿。中学乃至小学教育的状况对公民的素质影响更大。以90年代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目前正在使用的高中课本为例，《世界历史》曾简单诠释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知识分子“建立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世界观。那就是要求以人为中心而不以神

为中心来考察一切，强调发展个性，反对神权”。<sup>①</sup> 但该书涉及人文精神之处大都语焉不详。中学课本可以直接接触有关人文精神原典的应是《语文》。现有全国通用的高中《语文》课本共六册，选入课文 169 篇（首），其中文言文 50 篇。《老子》没有入选。《庄子》选了《庖丁解牛》这个简短寓言。《论语》则分别从《季氏》、《微子》篇选入“将伐颛臾”和“荷蓀丈人”两则故事。《孟子》入选的则是《告子上》和《梁惠王下》中的两小段：“鱼我所欲也”和“庄暴见孟子”。要通过这些少得可怜的材料去了解孔孟老庄，无疑十分困难。课文中选入的外国作品只有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等 9 篇，以此作为西方文化的窗口无疑是太小、太窄了。笔者无意苛责编者，他们自有其苦衷，而且要求中学阶段就能帮助学生了解东西文化的基本精神，在任何国家恐怕都是颇为困难的。问题是中国青少年的信息渠道很窄，大大限制了他们的视野。

人文精神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它是政治民主化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必不可少的思想基础。正如毛泽东在 50 年前所说：“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sup>②</sup> 这句可圈可点的名言，真值得人们

① 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世界历史》（第一册），1991 年版第 138 页，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② 毛泽东：《致秦邦宪》（1994 年 8 月 31 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39 页。



反复深思。不容讳言，现代人文精神主要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晚清以降不少当权者双眼只盯着西方的科学技术而忽略了其内在精神，这是我们的祖国现代化进程一再受阻的重要根源。不幸，1949年以后，我们的教育也走上了忽视人文的错误道路，加上一再把人文精神的张扬视作“精神污染”，知识界谈人色变。随之而来的恶果是我们不得不以人文精神薄弱的群体为文化建设的基础。

目前人文学者中存在着话语系统的困惑，或理论框架选择的困难。在解决这一问题时不能不考虑上述状况。着眼点应该是提高群体的素质，提升他们的人文精神。只要有利于达到这一目的，任何话语系统都是有益的。在我国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实际上已形成多元并立的局面，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只能以理解和宽容的态度去对待这种正常的学术现象。“法法是心，尘尘是道”。诗人、文学家、教师、编辑、记者、理论家、有思想的正直学者……都可以在各自的岗位上以人文精神濡染这个世界献上一份心力。当前宣扬人文精神的主要障碍来自有关人士缺乏在自己的岗位主动、坚韧地尽力的自觉。这里很难出现什么轰动效应，却是为提高民族素质不可缺少的根基工程。当务之急是面向大众。在沙龙中怨天尤人，很可能导致自我封闭。

### 为何无力抗击庸俗

上海学人悲叹“精神侏儒化和动物化”，<sup>①</sup>确实是当今人文精神低迷的写真。

物欲吞没崇高，眼前的欢娱取代终极关怀，这是古今中外经济繁荣期十分凸显的景象。在中国，经过长期不恰当的压抑后，物欲的急速膨胀，更令人们目瞪口呆。文化本来具有对人的动物性引导和消解的作用。高雅文化使人升华，其间往往体现着深厚的人文精神。庸俗文化则往往肆意刺激感官，让动物的劣根性充分释放，引导人们返祖。高雅文化不能与精英文化等同，大众或市井文化中也有高雅的精品。一曲《二泉映月》无疑是浪迹江湖的阿炳心灵崇高一面的倾诉。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刷下，庸俗文化泛滥难以避免，问题仅在于高雅文化能否在抗争中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成为吸引人们特别是广大青年的中心。两者的消长关乎民族素质的升降。

为什么庸俗淹没高雅？除了上文已经讨论过的原因外，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缺陷，也是其中重要一环。笔者无意概括这个领域的全貌。可以描述的是几种常见现象：

一是固步自封。不少人没有更新知识的迫切愿望，既不费心考察学术新进展，也对层出不穷的新问题缺乏应有的好奇心和兴趣。他们在半醒半睡的状态中失去了与时代

---

① 《人文精神寻思录》之一，《读书》1994年第3期，第6页。

对话的机会，却勇于按照自己的规范去指点和评判一切。连自己也不一定心服的答案是如此苍白，其对抗庸俗、引导大众的伟志自然不能不化为镜花水月。

二是以朴学自娱。他们中有的是志在名山事业的忠诚学者，孜孜不倦地治学育人或履行其他职责，真称得上“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其中不少杰出者的成果贯串着深厚的人文精神更加弥足珍贵。有的则囿于自得其乐，形同出世，且甘于补苴罅漏，失去开创新局面的锐气。尽管有这种那种不足，这个群体存在的本身就是对庸俗文化的对抗，可惜他们人数太少，也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大众传媒亦对他们不感兴趣，令人徒兴杯水车薪之叹。

二是先觉者的孤独。以弘扬正气为己任的先觉者勇于抨击丑恶，抗击浊流。可是，不识时务的话语免不了一再碰壁。挫折之余，即使不趋于消沉，亦不免时感势孤力单。更令人惋惜的是有的由于对现实缺乏足够的了解，找不到合适的结合点，或是满足于在小圈子中指斥荒唐，或是在冥想中走向极端。

诸如此类的现象都与未经认真改革的旧体制与相应的文化氛围息息相关。如果可以躺在原有体制上高枕无忧，甚至稳踞高位，更新知识和研究新问题的动力和压力便无由产生，而当这种惰性相习成风之后，文化氛围必然好同恶异，尤其不喜欢人文精神与现实结合中必然迸发的批判和否定的光芒。于是，不但先觉者深感孤独，甚至以朴学自娱者也谨小慎微，缺少开拓者应有的豪情。如是状态下

的知识分子既无力以高雅文化的雄奇俊秀压倒委琐卑下的文化浊流，也无力完成不断张扬人文精神提高民族素质的重任。

这个局面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这个局面的改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出路在于正视现实，从根救起。

不断发展的市场经济、合理全面的教育、以民主和法治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管理体系、健康的文化氛围，这些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不可缺少的基础，也是现代人文精神赖以昌盛的基石。我们必须全面关注这些因素的成长。不要把人文精神的培植化为不吃人间烟火的清谈。

对人及其世界的终极关怀，应该立足于建立一个各民族和谐共处，各种文化多元并立，公害消退，文明日进的地球村。而富强的现代化、民主化的中国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个理想世界的建立和人文精神的培育，首先要落实在把中国人的素质提高到与现代社会适应的水平上。从19、20世纪之交开始，严复、梁启超等启蒙大师就尖锐地提出了人的素质和国民性问题。又是世纪之交，历史有权要我们交出答案。

没有理想的人是可悲的。鼠目寸光固然自甘堕落为低等动物，目光止于国界也已远远不够。在世界已连成一片的今天，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祖先的“天下为公”、“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的伟大胸怀。

先哲早就有言：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全面发展的

条件。不应该把我们的青少年培育成为只有工具理性的半机器人。他们有权利受到足够的人文精神教育，而即使在现行教育体制下，这也是可以做到的，条件是校长和其他教育领导者必须对现代教育有足够的了解。

当代中国在人的问题上的最大误区莫过于把恭顺和服从当作美德。遵守法纪是现代人的基本素质之一，也是现代社会正常运转必备条件。可是，历史和现实的大量事实已一再证明如果没有重视自身价值，敢于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人，法纪就可能被有权有势者肆意践踏或用以压制、愚弄恭顺的下民。法律是全体公民必须遵守的，纪律则只适用于特定的人群，而其执行和监督均须以权利与义务统一的公民意识和独立人格为基础。必须让全社会警觉，实现依法治国，离不开人文精神的贯注和公民素质的提升。千万不要为“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等美妙约许而自我陶醉。我们的国家仍未走出困境。无论是文化素质还是人格素质，我国国民的整体水平都与现代化及未来激烈竞争的要求相差很远。劣败的威胁尚未解除！温顺的绵羊不应是我国人民理想人格的标记。人文精神的灌输要与培植一代既遵纪守法，又勇于维护自己权益的有独立人格、勇于创造的新的一代相结合，才不会再一次成为海市蜃楼。

20世纪中国历史的悲哀在于人文精神的培植一再以“运动”的形式出现。戊戌启蒙、新文化运动、新启蒙运动、思想解放运动……伴随着激烈冲突的这些历史记录，

无非表明我们的社会还缺少正常的运行机制和文化氛围。应该让越来越多的人懂得，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社会的智慧和良知，他们承担着剖析过去、探索未来的任务。他们与传播与灌输既定信念的宣传干部扮演的是不同的角色。任何学术与理论活动如果离开了对现状的批判性思考，根本不可能往前跨进一步。马克思说得好：“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sup>①</sup> 人文精神与现实结合必然迸发批判和否定的火花，在正常的情况下，它既不会成为群众运动，也不会导致激烈的震荡。而社会也只有在这不断的否定和批判中才会不断净化自己并找到继续前进的路径。人文与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与技术一样需要探索。真正珍惜发展机遇、尊重知识的人必然会为营造正常的文化氛围尽心尽力。而为了营造这个文化氛围，人文与社会科学学者首先应该显示自己作为时代智慧与良知的理论勇气、高尚品格与睿智。

原载《现代与传统》第五辑，1994年10月

---

<sup>①</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8页，北京。

## 文化与伦理 ——答《人民日报》记者

---

###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问：每逢国难当头，中华民族往往表现出令世人惊叹的凝聚力。七七事变后，留学生和华侨纷纷回国效力，您认为这种凝聚力来源于什么样的文化伦理传统？

答：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凝聚力。基于文化认同的家国之恋是非常复杂的感情，也是爱国主义、民族凝聚力赖以滋长的基础。以1931—1945年的中日战争来说，日本大和民族的凝聚力就比中华民族强大得多。当时的中华民族粗略

地说一分为四：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民众；国民党及其追随者和他们所控制的民众；汪精卫卖国集团；伪满洲国卖国集团。细分则更加复杂了。而在日本，以国家神道、武士道和其他传统文化为思想支柱的天皇制政府控制下，反抗的呼声一直非常微弱。

但中国文化有维护正义的优秀传统。“朝闻道，夕死可矣。”“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种浩然正气培育了以刚正不阿“从道不从君”为尚，以“曲学阿世”、阿谀奉承为耻的道德观念。这个优秀传统培育出一代又一代的杰出人物。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海内外一大批中华女儿不惜赴汤蹈火反抗日本侵略，不是单纯的民族感情，更重要的是有维护正义的浩然正气。正因如此，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反侵略的同时，对蒋介石政府的腐败与专制也持强烈的批评态度。这是以理性精神为基础的现代爱国主义。这是比那些盲目凝聚、死不认错的日本人高出一筹的。

中国有 56 个民族。中华各民族的凝聚，不能停留在培育爱国主义感情的水平上，更不能发展狭隘的民族主义。以清廉的民主政治和法治使全国在制度上紧密结合起来；让市场经济及相应的交通和信息网络冲破地区和民族的封闭性；让青少年受到良好的现代教育；再加上培育以理性和正义感为核心的爱国情怀；这才是中华民族加强凝聚力的长治久安之道。缺少理性精神的民族凝聚是非常危险的。



### 雅俗文化之争

问：战争驱使知识分子大规模走向民间，孕育出像《黄河大合唱》和《白毛女》这样亦中亦西、雅俗共赏的作品。这些对当前的雅俗文化之争有何启示？

答：文艺作品是作者的价值观念、文化素养、艺术技巧、对世界观察的深浅和情感状态的体现。艺术家素质的全面提高以及无法遏止的创造激情是一切卓越作品赖以产生的基础。以《黄河大合唱》的诞生来说，决定性的因素是冼星海在国内外所受的艺术熏陶，包括在巴黎这个艺术之都所受的严格训练；他对祖国的挚爱及对其文化的深刻理解；民族危难所激发的悲壮心潮。“走向民间”在一定条件下对文化艺术的发展十分有益，但不能片面夸大它的作用。闭塞山村的农民顶多看到50里内的风云，他们蕴藏的艺术资源是文学艺术家应该汲取的创作源泉之一，但不是全部。

雅俗的界线有时颇难划分。《西厢记》（包括其改编本）从诞生之日到现在都是大众文艺，又是文人雅士为之沉醉的千古绝唱之一。唐浩明的小说《曾国藩》势将成为与《三国演义》媲美的历久不衰的大众读物，尽管有一派研究太平天国的史家很难接受他的观点，但人们无法否定它是有深厚的文化蕴含的大雅之作。《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是雅？是俗？

应该鄙视和批评庸俗、媚俗。但看看整天泡在民间的

作者所写令初中语文教师为之气结的流行歌曲的歌词，就会了解“走向民间”不一定是化解俗流的独步丹方。总结历史经验，真正想发展中国文化，要靠两条：一是真正把财力重点倾注到发展教育、图书馆等文化基础工程上来，让民众离愚昧远一点，才能水涨船高。二是要有更加宽容的文化环境。一方面要让“心比天高”的知识分子可以自由伸展手脚，不致动辄得咎。心灵自由，才会有真正的创造。另一方面要让雅俗各适其适。大多数是俗众，对他们喜爱的即使是庸俗的文化，也应持宽容的态度，这与依法禁黄并不矛盾。

### 中国文化和知识分子的生存韧性

问：抗战时期沿海高校大举内迁，一些知识分子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依然取得了不少重要的学术成果，如闻一多的《诗经》研究、华罗庚的数论研究，并培养出包括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在内的一批优秀人才。中国文化和中国知识分子似乎具有一种不同寻常的生存韧性和环境适应能力，您以为原因何在？

答：“笃信好学，守死善道。”<sup>①</sup> 这是中国历代士阶层的重要信念，也是现代知识分子学术上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学术上的成功有赖于三个重要因素：1. 严格的高水平的教育；2. 与世界学术发展的主流有密切联系，可以

---

<sup>①</sup> 《论语·泰伯》。

在学术发展的前沿自由搏击；3. 个人的天赋和受文化传统影响的治学态度。以杨振宁来说，他是三个因素巧合的幸运儿。

前两个因素实质是文化教育的制度和方针问题。对学术文化的发展和知识分子群体的素质来说，这是最重要的。杨振宁就读的西南联大是当时全国水平最高的大学，主持校务的梅贻琦校长善于应付国民党的干扰，秉承现代大学通行的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原则，坚持“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材”。他不但在这样的大学中受到严格教育，而且有幸在归国不久的吴大猷、王竹溪两位水平很高的教授指引下进入了他为之献出毕生精力的两个重要的学术生长点：对称原理和统计力学；在很困难的情况下，没有割断与世界学术发展的联系。杨振宁和西南联大在当时都是凤毛麟角。杨振宁成长给我们的启示不在中国文化和中国知识分子有什么特异功能，而是要推动我们的大学在办学思想、基础设施、教师选用等方面尽快达到现代高等教育应有的水平。

记得身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吴大猷几年前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如果杨振宁留在台湾，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成就。无独有偶，当有人问利根川进教授（1988年诺贝尔奖得主），为什么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人，其学术成果大都是在国外做出的时候，他的回答很尖锐，大意是：学术上的大突破，必须有“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气概，这

与等级观念很强的东方文化是不相容的。在东方文化颂响彻云霄的今天，听听这些大学者的切身体会，不无好处。

### 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

问：在我们的印象中，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30年代前期，文坛弥漫着一种乐观的、超越现实的浪漫主义情调，如徐志摩的诗和沈从文的小说；而从30年代中后期开始，“文章入伍，文章下乡”蔚为潮流，现实主义文学大行其道，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问世的。您认为这种转向对当代文学产生了哪些深刻影响？

答：现代文坛一直是多元的。新文化运动期间，既有鲁迅的《伤逝》，也有郭沫若“我已成疯狂的海洋”的狂热浪漫。新文化运动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及其他流派也异彩纷呈。从1927年的《灭亡》到1931年的《家》，巴金的杰作就为现实主义增添了光彩。

生活环境、教育背景和人生态度的差别，导致文化艺术上千差万别的流派出现。加上读者精神世界的差异，在双向交流中自然形成各有偶像、各有知音的局面。

30—40年代文学艺术发展的情况表明，那一流派成为时尚无伤大雅，可怕的是生活和思想的衰减乃至枯竭。这正是《讲话》强调的“源泉”问题。中国第一代新文学著名作家的代表作几乎都出现在抗日战争前。茅盾：《子夜》（1936），老舍：《骆驼祥子》（1936），曹禺：《雷雨》

(1934)、《日出》(1935), 郁达夫:《沉沦》(1921)、《春风沉醉的晚上》(1923); 艾芜:《南行记》(1931-1936), ……没有北平胡同里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 没有南国边疆的漂泊, 就没有作为作家的老舍、艾芜的魅力。抗日战争爆发后, 除巴金等少数人外, 这些名家或是作品不多, 或是新作逊于旧作。除了生活不安定, 可能因为他们已经成名, 陷入名人必有的各种活动和会议中去了。而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中, 新的思想、新的生活, 使一批文学新人异军突起, 出现了一批为当时的政治任务服务的名篇。

离开不断的自由思考、体验、观察、分析和探索, 就没有文化艺术的发展。人脑不是电脑, 不能使用统一的软件。早就有人指出, 1949年后, 我们一大批著名作家正当年富力强, 却有名无作了。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教训。

### 气节与文章

问: 周作人写得一手好文章, 却在北平沦陷后失足附逆, 落下千古骂名。为什么中国人这么看重气节? 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观念中, 为什么道德比文章更重要?

答: 除去愚忠这样的污垢, 气节的实质是正义。这是古今中外人类共同追求的美德。在中国, “义, 人之正路也。”<sup>①</sup> 舍生取义, 代代相传, 深入人心。周作人在捍卫国家独立、反对野蛮侵略这个人类和民族的大义面前苟且

---

<sup>①</sup> 《孟子·离娄》。

偷生，附敌求荣，千古骂名，无法洗刷。

同在沦陷时期的北平，一批著名的知识分子却唱出一曲高昂的民族正气歌。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教会办的燕京大学立即被日本侵略者强行接收和关闭，邓之诚、陆志韦、张东荪、侯仁之等教授及行政人员16人随即以抗日嫌疑犯的罪名被捕。他们都不是革命者，有的还反对过马克思主义，但在狱中半年受尽折磨，没有一人屈膝投降，卖友求荣。特别是张东荪在1942年“二月十八日之夕，自经不死，头破血流，数日不食”，大义凛然。抗战时期，附逆的知识分子不多，他们是一批政治赌徒。1949年以后，对待知识分子一再出现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不承认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是爱国的，有正义感的。有的人甚至把爱国等同于革命，不革命就是不爱国。有的还以这样的观点去解释中国近代史，令人啼笑皆非。

道德很重要。但中国有泛道德主义的传统，近几十年则加上道德政治化，以此为整人工具，知识分子饱受摧残。稍不注意，就会让伪君子洋洋得意，直道而行者遭殃。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出现道德淡化的趋势。应该让人人必须遵守的公共道德法制化，更高的道德理想则各人自由选择。知识分子的生命在自己的专业和学术，不能人人都“以修身为本”。

1995年7月14日

## “文化中国”若干问题 ——与杜维明教授对话

---

杜：我觉得，和欧美、日本乃至印度对比来说，“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比较薄弱，价值的领域比较稀少。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能够使得比较薄弱的精神资源丰富，比较稀少的价值领域增多？从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处理传统的批判和继承、西方文化的引进和排拒，这两方面都有严重的失误。因为他们把四个互相相关的课题：传统文化的承继和扬弃、西方文化的引进和排拒，本来是四个问题，好像是个具有四个向度的体一样，而且四个向度又各有内在的联系。假如把这个体的问题压缩成面

的问题，讲“中体西用”或后来李泽厚提出的“西体中用”，都只有两个向度；如果再把两个向度的面压缩成线的问题，譬如充分西化和全盘西化的路线，是促使中国现代化的唯一道路；甚至集合成点，把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的问题变成面的问题、变成线的问题、变成点的问题，把复杂的文化现象归约为简单的政治选择。从长远来看，从整个民族的发展来看，会出现很大问题。现在西方，特别在美国谈两个课题，一个是制度问题，另一个是文化问题。文化课题表面上看起来不能用量来测准，不一定和经济利益或社会功能直接有关，甚至也不一定符合为社会服务的基本原则，更未必为现实政治作出积极贡献。但是，有没有文化积淀，如果有，那么另一种资本（或说社会资本）的积累就比较厚，对将来社会的稳定前进和现代化过程、市场经济的运作、民主政治的稳固，都可以发挥积极作用。我觉得是一种强烈的物质主义、现实主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所带来的导引的现代化的途径，工具理性挂帅。除了这个方式，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使得“文化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乃至全球关切中国文化的，但和中国既无血统又无婚姻关系的外籍人士）价值领域增多，也许我们心态要有所改变。“五四”以来，西潮的风浪好像很高，但实际上向西方开放、了解西方船坚炮利、了解它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深刻的文化价值，做得太不够。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实在太片面了，我们用中文写的跟西方文化



有关系的资料，全部加起来，跟英文的资料比太悬殊了！另外还有法文、德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各种语言。所以我说如果西化意味着了解西方，那么，我们现在还只是刚刚开始走上这一漫长的道路。另外以前的西化派总认为要了解西方，就必须反传统，现在是了解西方，要向传统开发，发掘传统资源，这一开发传统资源的心态反而能够和接引西方配合。如果对传统的攻击是粗暴的，又想完全从现实功利考虑，深刻的价值就不能继承下来，同样在面对西方的时候，就很可能是肤浅的。如果对传统文化有比较深入的全面理解，对西方也会采取一种长期性的、不以简单功利的方式来理解。至少在文化方面，我认识到这是一个极其严峻的课题，需要重新考虑，使“古今中西”之争的问题处理得好一些。

袁：你提到的很多观点我都同意。其实，我们的文化讨论也好，理论建设也好，都没有注意到这样的问题：即现在讨论的很多观点和主张，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致上已解决。比如说，全盘西化的主张，在19世纪基本上就已经解决了。两广总督阮元写的《畴人传》，就提到对西方的科学技术要“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这个提法，实际上经过许多争论，到90年代蔡尔康等又重申要“撷其精华，弃其糟粕”。康、梁、张之洞都不赞成“全盘西化”，张之洞说的“新学为用”，不仅包括“西艺”、还包括“西史”和“西政”。总的看来，从19、20世纪之交开始，不能简单地全盘抛弃或接受中西文化，要

走中西文化融合的道路；已经成为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

杜：这个我了解。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到底是以什么标准判定其精华或糟粕？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发展公式，人类文明的发展从早期的宗教时代进入形而上的哲学时代再进入科学时代，当时大概有一种感觉就是要“弃其封建糟粕，取其民主科学精华”，没有考虑到这个选择是片面的、不公允的，是以整个中国文化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暴露出来的缺点作为取舍标准，缺点中最严重的就是在西方的民主，加上法律、宪法、选举制度等方面。以这个标准作为评判整个中国文化得失的唯一标准，这样即形成了“糟粕何其多，精华何其少”的判断，而且判定是糟粕（在当时是现实考虑，还有实际环境），未必是糟粕；当时认为是精华的，未必是精华。西方启蒙运动的大师大德，把中国作一个参照系，一个先进的典范，所以对西方特别是受基督教神权影响的西方政治，认为是一个大的进步，当然他们总是以批判的问题为中心。但是当时对中国的评价，特别是伏尔泰、莱布尼茨和整个百科全书学派，对中国的评价非常高。这个评价到康德、特别是黑格尔时有了改变。黑格尔把人类文明的发展批判规定建立以后，我想还有一些跟哲学没有关系的新的的发展，就是西方成为世界发展的主导，并逐渐形成一个欧洲中心论。马克思提出来的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把亚细亚排除在不可逾越的发展因素之外。从这个阶段看

起来，文明的曙光也许在东方，但日落一定在西方，这种构想又把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忽略了，道家、道教、儒教，特别是属于人文精神价值，也就是宗教内涵丰富的儒家，都被认为是糟粕。

袁：我基本同意这样一个看法。我刚才为什么说理论方面已经解决？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文明时间那么短，理解不深，确定取舍标准难免有偏见。我们太热衷于一些理论模式的讨论，而对一些现实基本问题重视不够。假如我们眼光放宽些看五四前后的中国文化，会不会有另外一种结论？当时北洋军阀管理这样一个国家，文化上基本上是采取放任的办法。你讲的只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看法，其实当时同时还有佛学复兴，（杜：对，特别是从日本回来的唯识宗）禅宗、基督教也是大发展，当时真正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杜：有这样一种现象。1927—1949年这段时间不能说什么百家争鸣。日本侵华造成很大的灾难，但确实有文化的多样性，而且很多学术上的辩论超出了我们想象的水平 and 范围。当时的主旨就是现代化与西化的问题：是中国文化本位还是唯西方马首是瞻，应该以农业为主还是以工业为主，应该走社会主义路线还是资本主义。在20年代、30年代，已经把现代化和西化分开。

袁：整个30年代、4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哲学家、思想家，他们的思想至今影响很大。只要整个社会运作的机制是健全的话，刚才讲的那些问题其实是可以自行

纠正的。只要让它自然发展，它会慢慢成熟起来。问题是，我们讨论文化问题时，对这样一个文化发展的运作机制、基本条件却没有认真讨论过，只是热衷于指摘当时的这种理论、那种主张错了。哪种理论错了没关系，通过互相讨论，在一个比较健全的文化氛围下它可以慢慢互相补充、互相纠正。

杜：在学术文化讨论的范围里，立场的对错远远没有层次的高低更重要。如果是层次高，错，它还可以引发很多新的思想，可看出正确发展的路子，引出很多丰富的内容。

袁：我们的学者要回到现实。对于整个“文化中国”的状况，现在重要的是，如何让文化生长有个健全的社会环境，这才是大问题。

杜：人们常常把文化讨论当作一个零和游戏，常常只是集中在对错和路线的斗争，而不是让各种不同观点自由发挥，为了建构那土壤尽情努力。土壤的建构是使得各种不同观点，甚至错误观点达到比较高的水平，并不是路线正确与否。这个土壤要建构，最怕是压缩性。一种全面指导、控制的方式，从上压到下，表面上秩序井然，大家讨论问题比较一致，可是牺牲了它深厚的土壤、丰富的资源和各种不同的价值。在这样情况下，经过一段时间，不仅不能维持它的秩序，反而变成一种压迫，对的也是肤浅的对，错的也是肤浅的错，根本没办法有新的智慧、新的价值的创造，这是我所担忧的。

袁：这个问题就说到根本上来了。对于整个中华民族，令人痛心的是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很低。中国大陆的教育，一是普及的问题，一是体制问题。教育管理人员包括一些党政官员，他们对文化最需要的是什么往往不太了解。比如广东过去讲教育发展水平，特别是高等教育水平低于全国平均线，大学生的人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它就着急了，提出“建设教育强省”的口号。这非常好。可是，人们却不太注意研究什么是现代教育？现代大学有哪些基本特征？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知识分子必须具备哪些基本素质？弄得不好，有可能又一次招致不应有的损失。

杜：有一种说法很现实，高等教育就是为社会服务。但怎么去服务社会？有一个文化传承问题。文化的智慧传承，每一代都要经过那一代人主动自觉地创造，不能捡便宜。这种文化继承的工作假如在大学里不突出，为了现实去教育，那就很危险。大学教育是让人的各种潜力充分发挥出来的道场。这也就是突出对人的本质和自由的充分体现，人的内在价值的充分体现。这种工作，假如是在狭隘的功利主义下，是不能达到目的的。此外，大学应该成为文化反思和文化（也包括社会政治）批判的中心，它可以把社会目前所出现的毛病，乃至它所走的方向、态势、资源分配不平均各种课题，从宏观的、长期的考虑进行批判，让它在没有发生严重的问题之前进行调解。所以，大学教育的目标既是为了社会服务，又是为了文化传承，为

了人的自由和内在价值的充分体现，为了建构某种批判精神。

袁：现在中国大陆一些人片面强调未来世界是科技竞争，对刚才你所讲的人的内在价值、人的人文方面的素质培养重视不够。不少知识分子不了解世界文化发展的现状，缺少地球村居民应有的宽阔视野。说得尖锐一点是眼光短浅，没有自己的头脑和自己的思想。有些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学生和教师知识结构陈旧，说来说去都是一些旧话、空话。甚至这些领域的有些大学教授已不知道真正的学术研究是什么，不知道大学的使命是什么。这个问题非常大。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这是过去40多年来甚至更长时间包括国民党时代所谓党化教育、三民主义教育结下的恶果。要解释清楚宣传和教育的差别。现在中国大陆常常将宣传、为某种政策或为了某种当前政治需要的东西，跟长远的文化的传承、创造混同。不能全面理解大学的社会功能，特别是作为思想库和文化更新中心的功能。

杜：在“文化中国”，一方面觉得历史包袱很沉重，另外一方面又觉得没有东西，好像素质不够，有些很深刻的资源没有发掘。一方面认为太多太浓，一方面觉得没有。

袁：传统资源贫乏问题，该怎样补救？从祖宗原有遗产中找出好的东西，这是一个途径。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对很多历史现象，能不能以超越的眼光观察、分析，从而创造出新的东西。实际上现在的社会生活，远比

我们想象的丰富得多。比如大家都讲中国传统文化重群体、讲五伦。现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发展快的地区，特别是乡镇企业发展快的地区，是不是有可能走出一条新的群体生活方式的道路？40多年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不能只看它负面的东西。它有积极的东西，它的积极的东西跟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是吻合的。好像有些搞得好的乡镇企业，它是一种股份制经济，所有乡镇居民股份集体经济，这种经济运作下的人际关系怎么样？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杜：现在中国大陆在经济上乡镇企业占30%，慢慢地非国有企业已占50%。中国有一种发展的特殊模式。西方的学者说过，现代性中有三个不可分割的因素：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个人主义。市场经济跟宏观调控、特别是由政府来领导的宏观调控并不一定有冲突；民主政治和党的领导甚至有很多社会中间的关系网络，通过考试制度来选举官吏，精英主义，民主政治和党的领导在很多地方都不一定冲突。东亚社会没有突出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作为推动现代化的必要因素或体现现代性的不可分割的一面，在东亚并没有出现。这些都值得重新考虑。

袁：就中国来讲，个人权利的保障，个人创造性、主动性的发挥仍然是一个重大问题，是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任何国家的发展都有它的特点，问题是东方的特点究竟是什么？有些特点在现代化初期特别突出，而且是需要。因为它所处的条件跟原发的资本

主义不同，需要很特别的社会条件。这个社会条件就要保持比较安定的环境，有些国家和地区用政治专制这样一个形式来保障社会的稳定。但是，这不能从理论上加以肯定，理论上应该想得更全面一些。应该承认，社会稳定是发展的必须条件，但要探索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怎么逐步扩大民主和保障个人自由。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的文化因素会起作用，有可能探索出一种合理的社会管理制度。透过表面现象看，政治实际是个社会管理制度。我们能不能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管理制度？这就是一个民族的智慧问题。

杜：恐怕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可能导致一些事先未能预期的后果。从大气候来说，影响一个民族的命运的客观条件错综复杂，当局者迷，很难一窥全貌。另外，一味突出文化的特殊性会相对削减了现代化中的普遍因素，反对西方自由化常不自觉地便为某种保守主义权威提供依据。说为了防止西方自由化，为了稳定发展经济，必须排拒与自由化联系起来的一切欧风美雨。这种看法表面上很有说服力，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其实，如果不充分调动民主社会所具有的各种不同的资源，便很难达到一种独立自主的发展模式。只是孤立地去发展本土资源，很可能走上狭隘的民族主义，结果不仅不能引进外来的资源，连本土的优良传统也难继承。这是一个悖论。实际情况主要从两个角度来考虑，要考虑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每一个现代性都必然有传统性，所以不是讲具有中国特色的就是现代



化，应该讲美国具有美国特征，英国具有英国特征，单提要有中国特色，是一种防御性的心态。“五四”以来整个民族心态都有防御的一面。其实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传统文化的比重甚轻，中间的积淀大概以西方因素为主。但西方因素虽多，并没有经过反思。很多积习在我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中会起极大的作用。

袁：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就你刚才讲的悖论问题应该将文化的东西之分淡化，没必要过分地强调这个是东方文化，那个是西方文化。你提出我们会不会丧失中华民族的特点，变成没有特点的现代化，我感到这个不是问题，我们有没有一个更好的现代化，这才是重要的。

杜：我想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五四以来的知识精英，都对中国的现代化绘有一个蓝图，经过那么长期的发展，我们现在再出现一个蓝图，跟那个时候的看法有相当大的区别。那时认为很现代的，现在并不认为现代，那时认为很落伍的，现在并不认为很落伍。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其中应有很大的差距。因为五四以来的要求是富强，目前，看来富强这个社会达尔文时代的价值值得进一步考虑。就是要付出什么代价才能获得富强，为了什么要富强？还有意义世界的问题，人生意义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我认为可以提升我们反思的能力，因为这些课题会帮助我们这个社会更充分地去体现自由，自由的理念在深沉的自我反思中落实。只有如此，我们作这种反思的工作才有价值。在五四时，即使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也很少

进一步考虑为什么要富强，那时要是中国能打倒列强，能够团结起来、能够统一、能够富强，就已达到目的。为什么要这样？我觉得我们现在必须考虑这类课题。

袁：无论我们的蓝图的设计也好，对目标的追求也好，是不是都有一个自然的由浅到深、由低到高的过程？就好像明治时期的日本现代化，它有一个很肤浅的模仿西方的图案，那时确实是有全盘西化的倾向，所谓“脱亚入欧”，但现在我们还是认为，日本仍然是一个民族文化保留很多的国家。

从日本情况来看也好，从中国情况来看也好，我想文化要健康发展，恐怕关键还是要有开放的心态。（杜：这个没问题。）最初从中国传去日本的书对它起了作用，这是个表面现象；其实一打开国门的时候，中国方式就落后。日本起步时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但很快，“攘夷”转化为“求知识于世界”。以后不计较、不特别担心民族特点丢掉了，这种情况下反而发展比较好，民族特点不是丢掉了。鸦片战争以后，我们有《海国图志》，这比日本早，但真真正正起步比他们晚。这里面是什么问题？文化保守态度，这个是最大问题。它一再成为中国前进的障碍。在清朝是这样，到1949年以后，换成了一个新的语言来讲：我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封闭起来，自我陶醉，不愿意学习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所以走上文化发展的健康道路，最好不要强调文化的民族特殊性，让东方文化、西方文化在我们的国家里面自由交流，自然融合，这

是一个关键问题。其实这已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中无法阻挡的趋势。

杜：我想这两个关系，但不一定相同，一个是开放的心态，一个是全球性的市场。有深刻的哲学思考为基础的文化，本身就有一种弹性和动力，它不是防御，也不是攻击，它是通过了解、自我了解所获得的开放性。因为文化与文化的交流，不是零和游戏，不必采取你争我压的方式，越交流双方的资源就越多。如果以发扬传统精致文化为基础和西方深刻的价值进行沟通，我们应向两方面开放，要向当代西方但不是狭隘意义上的工具理性和只突出富强价值的西方，而是当代西方之所以成为西方的精神源头充分开放。要了解基督教、犹太教、回教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所起的积极作用，了解古希腊的哲学智慧，了解中世纪的发展对西方的影响。

袁：应该把中国放在世界范围内去考察，西方产业革命的阶段恰恰是在那个时候我们落后了。我想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的就是那种世界性的眼光、世界性的视野，这个危害最大。

杜：现在如果说中华民族觉醒，有一个情况就是希望觉醒的中华民族每一分子都是一种文化价值，多多少少、全面或片面、层次高低，都是文化价值，都要发挥一些所谓追求人生价值意义，而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动物或政治动物。因为真正的大企业家，利不是他考虑的优先，他考虑他在社会上面扮演一个什么样的整合的角色。



袁：我同意这个观点。现在中华民族开始觉醒，这个觉醒过程应该是经济迅速发展、人的自由度扩大、政治民主化和文化提高这几方面的结合。我想，各地华人能不能扬眉吐气，都是跟这几方面分不开的。

杜：有一个我不太同意的说法就是把它机械地说成几个截然分割的阶段。比如说，大家先吃饱饭后再考虑分配公平，分配公平考虑完以后再考虑其他。这种阶段化的说法既有观念上的问题也有具体实践的问题。我们了解一个社会不能不触及文化，这里所指的文化不是中国文化或中山大学的文化，而是说属于政治经济社会中的一个层次而又贯穿各领域的软体结构。这个文化，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意义的问题不能说等吃饱饭再谈，我们为什么要吃饭？你吃饱饭作什么？如何吃饭？在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时，文化就出现了。中国彻底的经济改革挂帅，政治改革暂缓。但没有相当程度的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相配套，经济改革绝对搞不起来。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是同步的，两者之间有非常复杂的关系。黑猫白猫只要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不是不要任何西方的思潮进来，也不是凡西方进来的新思维都是精神污染。其实中国的改革开放已导致观念上的更新。有没有言论自由呢？我想，有相当广泛的言论自由，大家都可以参加辩论，可以争论，可以批评，为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文化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经济、社会都进行了改革。

袁：刚才讲的一个综合的改革过程，现在我们讨论的

是，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又要前进一步的问题。你刚才讲的非常重要。但不可能有统一的声音。什么人发言呢？

杜：对。我刚才的意思，不是要统一发言的口径、统一思想。我的意思是说所有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要争取到发言权，为什么呢？在国际意见市场，各种不同的意见都有痛切陈辞的机缘。假如一个觉醒的民族，在国际意见市场不能把它的声音发挥出来，意思是说，它的资源太薄弱，它只是靠人家、在人家的陈套里面发展它自己的看法。

袁：人不是为文化活着的，而是文化是为人存在的。就是怎么样使中国人在一个更加健全的社会制度下生活，生活质量不断提高。这是一个重要目的，包括政治生活的改善、文化素养的提高、自由度的提高。在这个时候恰恰需要的是黑猫白猫精神，不要那么计较，要有世界眼光，好的都要，而且不怕肤浅。因为人总要有个成熟过程，一个国家也是有成熟过程。

文化是人的标志。就是说你承认人的存在，必然就有文化存在，没有文化就不是人，这是完全没问题的。我认为人应该有意义和有理想的追求，问题是这个意义的追求这个价值怎么从薄弱逐步深厚起来，这里面的积累过程很长。就现在中国的情况看，发展过程应走上健康之路，让这个文化积累，让这个意义世界越来越深厚。文化现代化的标志在哪里？简单地说，有一个健全的达到当代先进水平的文化积累、传播、创新的机制，包括学校、研究所、

图书馆、传媒系统和其他的各种文化机构。这个系统之外，还有一个跟世界接轨的、互相能顺利沟通的信息系统，再加上一个开放的心态，让人可以在这个文化环境里面自由思考问题、自由创造。我想文化现代化的基本标志应该是这几方面。只要有这几方面，它就会自动地往前发展，就会不断地有大批思想家出来。一般的老百姓也不会停留在经济动物的水平上，他会有文化的追求。所谓文化的追求即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的追求。所以我不认为我的观点是那种多元的开放的实用主义。

杜：你讲的那些是必要的机制使得文化进入现代化的水平。这个我非常赞同。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出现，就是在“文化中国”的知识分子（我把知识分子当作各种不同的职业，是一种社会角色），他们有各种不同的职业，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为“文化中国”提供更丰富、价值领域更多的精神资源。这些人在什么地方出来？除了学术界以外，至少在企业、媒体、宗教（特别是民间宗教），还有其他不同领域。有个新观点值得考虑，就是我们怎么和企业界的知识分子进行对话。他们的经验比我们多，我们（特别是在学术界服务的文化工作者）的缺陷常是他们的优点，他们的缺陷又常是我们的优点。我们的理想性如果是我们的长处，他们的现实性则是他们的长处。在媒体服务的知识分子，没有很多时间跟我们讨论深刻的文化课题，但是在传播时，通过媒体的诠释，通过媒体的包装，可以发挥非常大的影响力。有专门讨论传播学者如马可路

恩以前讲过，传播的信息就是媒介，媒介就是信息。通过什么语言工具来传达信息，结果传播媒介本身就是信息。我最近到巴黎去开会，会议为“中国文化与海外华人”，这个会议由霍英东先生资助。现在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就是很多文化资源、讨论文化问题，不管是经济改革、稳定政治或两岸政治和解问题、创造文化的问题，从企业到媒体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1995年8月7日，波士顿

## 历史与理论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历史与理论”。想到这个题目，一方面是拜读了胡国亨先生大作《独共南山守中国》后，有一些感想、一些体会；另一方面，是因为在最近一段时期内，有一个问题被广泛讨论，即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我想就这一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想法。

首先，我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我虽然在哲学系工作，但主要治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哲学史。有人开玩笑说我是哲学家，我说不是，绝对不是。原因主要有两



方面：一是当代中国虽然有很多哲学教授，但要找到真正的哲学家是比较困难的。真正称得上哲学家的人，应该有自己的一个创造性的理论体系或对原有理论体系的推陈出新有过重大贡献，在当代中国，还没有出现新的孔孟老庄或如萨特罗素这一类在世界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家。从我个人来讲，哲学素养水平不高，更谈不上有重大理论贡献。但是，对于史学，我作过一些研究，当然我的工作面也是很窄的，主要是中国历史，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着重是思想史、哲学史，所以我思考问题主要是从历史角度出发。还有一个背景，我是50年代复旦大学毕业的研究生，现代化是我长期考虑的问题而且我更多地从历史的角度考虑这一问题。基于这样的背景，我今天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我是如何评价胡先生的《独共南山守中国》一书的；

第二个问题是，我对现代化和中西文化的认识；

第三个问题是，对个人主义如何认识。

### 《独共南山守中国》的意义在哪里

胡先生的大作，我认为是一本有价值、有意义的书。

①这本书体现了胡先生对人类发展和中国发展的忧虑。这种忧患意识是非常崇高的，很值得我们学习。从这个角度来讲，作为这本书的作者，胡先生理应受到我们的尊敬。

②这本书在学风上也有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大陆

的学术界两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不少论著往往霸气很大，空话很多。很多东西不经过论证就下结论，说我这个结论是必然的，科学的，无可怀疑的。学术研究，应该认认真真地从学术史的背景上，从世界学术背景上去考察自己提出的问题，我同意哪一点，不同意哪一点，我自己的看法是怎样的，都要求作得非常严肃。在这方面，胡先生这本书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同时，胡先生有一个宽容的心态，资助大家批评他的书，这在大陆学术界是很少见的一种学风。胡先生受过现代学术熏陶，也有一个现代学者的胸怀，这一点值得我们尊敬。③从中国学术现状考虑，最大一个问题是面对文化发展多元化的现实不肯承认，而且一些人还要想方设法以非学术的方式和手段加以禁止，我觉得这很危险。中国学术界的主流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是政府提倡，作为我们的指导方针的。但在主流下面，其实一贯以来，都是多元并存的。除了马克思主义，至少有儒家学术，在毛泽东时代就允许熊十力、马一浮研究和宣扬儒学。另外，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学的传统也没有断。特别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又衍生出来的两派：新道家和新儒家，其影响有日趋扩大之势。对提倡多元化，提倡儒学，有人公开批判，说这是以儒学替代马克思主义，有人在《哲学研究》上发表文章，骂得很厉害，这无非说明我们缺少一个宽容的环境，缺少一个平等争论的习惯。这样做的人往往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其实这种态度对马克思主义很不利，很容易僵化。一个学者无论自己持什么观

点，对那些以认真研究为基础的学术论著和各种学术观点都应尊重，严肃地评价和思考。胡先生的书自成一说，有利于形成多元并立、百家争鸣的局面。从这个角度看，这本书也很有价值。

### 现代化是一个迷梦吗

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是现代化和中西文化。胡先生提出一个问题，认为现代化是一个迷梦，不一定带来人的幸福。这个问题很尖锐，它实际上意味着，中国要不要现代化？这也是我近年来关注的焦点。我想，现代化确如胡先生所讲有很多流弊，他所讲的东西并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有事实根据的。但从历史角度看，我们还要作一个反向思维，就是不现代化又会怎样？我觉得胡先生在这一方面考虑得不够。以近代中国来讲，拒绝现代化确实只能有一个亡国的前途。近代中国被侵略的历史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在甲午战争后更加严重。甲午前，西方侵略以经济为主，要求中国打开大门。甲午后，瓜分中国成了现实危险。面对这种状况，不现代化怎么办？唯一的结局是连中国这个名词都没有了，中国就会分割成列强的殖民地，大量历史材料已证明了这一点。在这样的情况下，出路在哪里？我想唯一的出路就在于学习西方，把中国推向现代化的道路。回过头来看，胡先生所担心的现代化后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其核心是环境破坏。其实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之前，完全在中国文化指导下，环境的破坏也很厉

害。黄河流域本来森林茂密，周朝的森林覆盖率仍在50%以上。我们的先人要“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可是，由于人口重负，战乱频仍和天灾、人祸，多年来的环境质量说起来只能令人痛心。“天人合一”没有带来什么“人与自然和谐”、“社会和谐”的神奇效应。从世界范围看，生态环境破坏最厉害的是第三世界国家。我们在“文革”中，骂日本，骂美国，说你们那个发展造成环境破坏多严重，但实际上经过多年努力人家环境治理得相当不错，而我们的破坏却日益厉害。问题在哪里？我想环境破坏只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依赖新的科学技术重新得以恢复和改善。如果回过头来走另外一条路，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救治地球环境靠科学思想和科学技术，还是靠中国或东方的某种神秘的思想？答案应该还是比较清楚的。

这里面，再进一步追寻，就是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胡先生书中谈到西方理性传统过度发展，造成环境破坏，这不能讲完全没有根据。但在中国或其他不现代化的国家，现在所缺乏的恰恰是理性精神。现代化与理性化是难以分割的一体两面。在个人迷信一再造成巨大灾难，唯命是从成风，个人远未走出神权阴影的国度，强调理性过度发展显然为时过早。

整个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现代化的文化障碍在哪里？是学西方学过了头，丢掉了传统文化，还是学得不够？中国是不是有不顾传统“全盘西化”的危险？我曾经写过一些文章回答这个问题。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全盘西

化始终没有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主流，19 世纪中国为什么一败再败，就是因为没有认真学习西方。这里有一个方法论问题，即怎样判断中国文化的主流。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基本上还是传统型的，在社会上发挥作用最大的是官方的思想文化，社会并没有西化。慈禧太后执政 40 多年是不是全盘西化？这是不值得花时间讨论的问题。接下来的袁世凯也不是全盘西化。北洋军阀时代是 20 世纪中国最活跃的“百家争鸣”时期。但那些军阀和文武大员通常都口口声声要弘扬传统文化，对孔孟执礼甚恭。到了 1927 年之后，中国回归到统制文化阶段，叫做三民主义文化；教育叫党化教育，又叫三民主义教育。根据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的理论，三民主义是中国一切学术研究的是非标准。胡适当时发表了一些自由主义的言论，结果酿成了一桩大公案，要禁止他著作发行，搞了一个全国性的大规模批判。国民党统治时期，学校必须天天讲“四维八德”，这是孙中山提倡蒋介石继承和发展的。在思想文化层面，他们实行的是中世纪的专制主义，与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现代西方文化风马牛不相及。到了 1949 年以后，把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搬了过来，但是变形了，扭曲了。这变形扭曲来自哪里？来自我们传统里面的专制主义。

再从文化精英层来看，从 19 世纪末开始，他们大都是以提倡中西融合为取向的。从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一直到新文化运动，全盘西化并没有成为主流。只有胡适等少数人偶尔说说提倡全盘西化的话，但全面考察胡适的

思想，这也不是主要的。还有一个陈序经，二十几岁时，发表过提倡全盘西化的文章，但在文化精英层中当即遭到强烈的反对。到他 40 来岁时，作了岭南大学的校长，成为十分尊重知识分子和中国文化、因而受到知识分子衷心爱戴的优秀教育家，又是卓有建树的史学家。所以说，全盘西化在思想文化领域影响不大，包括蔡元培等领袖群伦的人物，都是主张中西融合的。

与此同时，精英层里面提倡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直连续不断。从清末的国粹派，20 年代的学衡派开始，到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哲学进入了鼎盛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哲学家，这些哲学家，创造了他们自己的体系，大都采取中西融合的路向。冯友兰、贺麟、熊十力都是这样的。西化最明显的两个人，一个是金岳霖，金岳霖的哲学思想很西化，但他把自己的本体论叫做《原道》，也希望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另一个是张东荪，也是西化倾向非常明显的哲学家，但仔细看一看他的哲学著作，中西融合的倾向也十分明显。所以精英层里面的主流，我认为并不是全盘西化，至于民间这个层面则更不是全盘西化。

中国现代化如此艰难，说到底是因为对西方的东西汲取不够。胡先生谈到中国经济、谈到现代企业制度。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其实就是要从西方制度中吸收适合于中国的东西，或者应该按国际惯例办事，还是向人家学。

有没有可能走中国的文化结合西方的制度即中体西用这条路。这个思路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不是新东西，在

历史上已经讲得很多了。张之洞已经把“西政、西艺、西史”并列为中国必须学到手的“新学”<sup>①</sup>。他认为中国三纲不能动，但要采用西方的经济制度、法制和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可是，制度创新和观念变革又是一对孪生兄弟。随着现代性质的法律体系和经济制度在清末逐步建立，个人权利、平等、自由、契约等观念随之在民众首先在城市居民中逐渐形成。再经过民初政治变革的震荡，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三纲的颓势已无可挽回。与时兴的对新文化运动的责难相反，到了“五四”，中国文化大繁荣。如果没有“五四”，就没有中国现代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回顾任何一门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史，都无法推翻这一点。现代意义的历史学、经济学、文学艺术等等都是在这时期建立起来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自春秋后一个真正的高潮，它把中国的学术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在道德层面，新的观念和规范的形成和普及也有很大的进展。中国传统道德能不能像胡先生所期望的和西方的制度结合起来，跟西方的优点结合起来？我认为这是很困难的，道德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迁。在现代社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体根据各自的利益选择的过程。为什么只有传统的或民族的才是合理的呢？这是必然受到质疑的命题。不过，由于选择的多元性，传统道德完全可以成为一部分人安身立命的寄托。

---

<sup>①</sup> 张之洞：《劝学篇》。

### 如何看待个人主义

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是个人主义的问题。西方学者通常认为现代社会制度有三个基石。一是市场经济，二是法治和民主，三是个人主义。这三个基石我们化了很大代价后接受了两个，即市场经济和法治与民主，但只是原则上接受了，真正使之成为我国社会生活不可移易的基础，仍然十分艰巨。拿市场经济来讲，90年代才成为正式认可的政策，但作为经济制度至今还很不完善，且有反对的声音。法治和民主更不用说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对个人主义怎么看。胡先生有很多否定意见。为了借鉴，有本书很值得关心中西文化和现代思想文化和道德发展的人士一读：北京三联书店新出的《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钱满素博士写的。爱默生是美国19世纪的一个思想家，他提倡个人主义，对儒家也作了研究，作了选择，对儒家有所肯定也有所否定。钱博士的书对个人主义的正面和负面效应，以及遏制负面作用的机制都有详尽的分析。从学术史考查，正如胡先生所说，个人主义与自私自利是两回事（今天我们讨论的不是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独特用语的个人主义）。问题在于这个个人主义去掉之后，能不能建立起市场经济，能不能建立起民主与法治，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必须指出，西方学者对个人主义的诠释并不统一，有同有异。这里不可能详细讨论。我关注的是大体为各家共同认可的基本内



容，而把弊病明显的极端个人主义排除在外。

中国是一个提倡集体主义的国家。我认为提倡集体主义在理论上并不排斥汲取个人主义的合理内容。这样讲不是我的发明。毛泽东在1944年便明确指出：“我们也不主张一个足以沮丧个人创造性的集体主义”。<sup>①</sup>“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sup>②</sup>大家假如研究过毛泽东的文献，还会发现，在1958年前后，毛泽东十分重视把人从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从伦理学方面作了大量的论述。现在困扰中国的问题是什么呢？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已经站了起来，但广大中国人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是不是得到充分的发挥？这里面就有一个个人的解放问题。

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都承认一条，没有人的解放，就没有现代化。中国需要个性或个人的解放。我认为谈到个人的解放，有四个基本内容是不可缺少的，一是个人的自尊，二是个人的自主即自由，三是个人的自立即自我奋斗，四是个人与公共权力之间必须有合理界限，个人应该有足够的不受侵犯的私人空间。假如没有个人的自主，没有自由决策的权力，市场经济是发展不起来的。有一个大的误解认为讲个性或个人的解放就是不要集体。实际上，个性解放不过是要求在个人与政府之间要有合理的

---

① 《与哈里森·福尔曼的谈话》，《中外记者笔下的毛泽东》，沈阳出版社1993年版，第236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9页。

空间分配，要有个人的空间，要有个人的隐私，但我们过去讲的个人隐私面太窄了，应该是个人的私人空间。另外，还需要有一个公共空间，政府不应包揽一切；否则，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便无从谈起。如果政府权力过大，甚至侵犯了私人空间，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必然会带来一系列非常严重的问题，影响市场经济、民主和法治。在这样的状况下，胡先生所设想的以中国的思想结合西方的制度就会落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很容易受到国家权力的侵犯，目前中国的现实是前者自我保护的能力太弱了，而不是相反。合理划分“群己权界”（严复语）是尚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理论要彻底，应兼顾各种情况，切忌陷入片面而无法自圆其说。不妨再回顾一下历史。当年希特勒大声疾呼：“一个民族의思想和意志的自由，要比个人思想和意志的自由有价值得多。”纳粹分子鼓吹：“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sup>①</sup> 蒋介石则口口声声：“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由于他们践踏民主、自由和个人权利，而当时德国和中国的广大民众也缺少维护个人自由和民主制度的充分自觉，没有显示制止执政者倒行逆施的足够力量，结果给各自国家和人民带来的都是莫大的灾难。纳粹的侵略屠杀更写下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这提醒我们讲集体时不能抹煞个人。不应忘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

---

<sup>①</sup> 朱庭光：《法西斯体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

展的条件。”<sup>①</sup> 任何关乎社会发展的重要理论观点的确立，必须充分考虑历史经验。这是值得胡先生和我们共同深思的。

原载《科学·社会·文化》1997年第1期

---

<sup>①</sup> 《共产党宣言》。

## 借鉴香港，建设特区文化

没有必要的文化条件，任何城市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国际大都会。香港由荒岛变为世界第四大金融中心、第八大制成品出口地，其重要基础是文化。从文化的视角去审视，从开埠至今它有许多值得人们珍视的特点和经验教训。要全面探讨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力不从心的，这里说的仅是对某些问题的粗浅体会。同时，香港文化有许多众所周知的不足之处和黑暗面，限于篇幅，本文不拟涉及，笔者在这里关注的是如何吸取这个国际大都会文化方面的长处：

### 值得珍视的香港教育的几个特点

经济发展的快慢和成败，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的素质。除了部分人才可以外聘，当地的教育制度及其水平则是决定上述状况的最重要因素。经过多年改进，香港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终身教育体系。在“再造几个香港”中，绝对不能忽视他们发展教育的经验。这并不意味着“照搬”，那是不可能的。同全国一样，特区教育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例如，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学校的制度，必须开设马列主义政治课，这都是按上级规定不能违反的。但除了这些政治因素外，可以借鉴他人的领域很宽。香港教育的下述几个特点，就非常值得珍视。

1. 建立完备和高水平的教育体系，源源不断地提供高素质的人力资源。

香港普及了中学教育，建立了专业和特殊教育体系、在职人士的继续教育体系。特别令人叹服的是，这个六百多万人的城市建立了如此庞大的大学教育网。目前仅全日制有学位授予权的大学就有6间（教育学院除外），在校学生约6万；此外每年还有2万多学生到外国留学。1995年，政府资助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生达3000人。如此坚实的人才基础是香港成功的奥秘之一。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公办学校在香港教育中占绝对优势。他们的教师收入居于全世界最优厚的国家和地区之列。相比之下，深圳仅有一间有学位授予权的全日制大

学，其研究生教育仍处于萌芽阶段，据说教师们还要花不少精力于“创收”。差距恐怕不但源于经济发展的水平，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如何，似乎也是值得检讨一番的。

2. 与世界先进国家接轨的教育思想。世界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也各有特点，但异中有同。所谓接轨不是照搬，而是择善而从，其核心在于具有充分开放的世界眼光和胸怀。在香港，大学校长和教师是向全世界公开招聘的，聘用期限也按国际惯例办理。除了听取本地专家的意见外，每隔若干年还聘请国际顾问团认真研究本地教育如何改进。如1981年就曾邀英、澳、美、联邦德国的4位专家组成国际顾问团全面检讨香港教育制度，对香港教育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撇开目前按有关规定很难实现的项目（如请外国人当校长）外，更加开放的特区也许能师其意，仿效实行。

3. 基本成功的双语教育。香港一直实行中英文并举的双语教育。尽管其中文教育有待改进之处不少（其中之一是没有处理好统一书面语与广州方言的关系），但一般中学毕业生都有较高的应用英语的能力。考虑到英语已成为主要的国际交往用语，有志成为国际大都会的特区应该重视他们的经验，把英语教学放在突出位置上。有朝一日，如果不懂华语的外国人在深圳街头也能和在香港一样不会遇到语言障碍，对特区和全国都将是影响深远的贡献。

### 文化沙漠与文化枢纽二重奏的启示

过去，特别是 50—70 年代，一些知识分子常常批评香港是文化沙漠。近年来，这种声音日渐稀少。

什么是“文化沙漠”？不是全无文化。人是与文化共生的，连广义的文化都没有的不能称之为文化。但文化有高低之分，如果一个地区只有媚俗的满足感官需要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也有高雅的），把那种荒凉状态称之为文化沙漠不无道理，香港是不是真正的“文化沙漠”，人们会有不同的见解。但有些地方却是不能忽视的：

1. 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和社会愿意拿出钱来支持高雅的文化艺术的发展，如芭蕾、交响乐、话剧和某些著作的出版，博物馆和文化中心的兴建，等等。

2. 凭藉其东西文化交汇的地理位置和现代新闻和出版制度，发展成为思想家的摇篮和先进思想文化的据点。以 19 世纪来说，这里先后孕育出洪仁玕、王韬、孙文、康有为、何启、胡礼垣等著名思想家；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份系统鼓吹改革的报纸《循环日报》，也是 1874 年在这里诞生的。

3. 以高水平的经济和金融研究机构及财经报刊支持其庞大的经济活动。这是这个重要经济中心的神经系统。

人们早已注意到，香港的大众文化随着中国大门的打开而迅速风靡全国，市场的魔力使之自发地蔓延四方。可是，这些大众文化恰恰是“沙漠”景观的一个组成部分。

要走出沙漠，构筑文化枢纽，却离不开政府和民间的决策者要有过人的见识和深邃的眼光。百多年间，香港和上海是中国了解世界和东西文化交流的两个最重要的窗口。今天的特区也承担着“窗口”的历史重任。这个“窗口”是不是仅限经济人进入的领域？是不是除了满足经济人感官本能需要的大众文化外，还必须根据自己的特点致力于高雅文化的建设，使我们的特区有朝一日也成为文化沟通的重镇？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 建设高雅的城市形象

香港是世界上最拥挤的城市之一，老市区的一些街区固然刻板得令人生厌，就是近年新发展起来的卫星城镇，也没有什么个性。除去这些败笔，它也有一些引人注目的光点：

1. 严格教育和管理形成良好的公德和清洁的街道。
2. 精心策划，建造足以成为城市标志的大型公共建筑。在尖沙咀这样的黄金地段建造宏伟精美的文化中心，应该说是香港城市建设的一大杰作。不但标志着香港的富有，而且突显它也拥有深厚的文化蕴含。

人们有理由问：深圳会有自己的尖沙咀吗？这是城市设计者和领导者的思想文化水平的考试。

1996年1月25日



## 开放国度的封闭群体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人们都说美国是极为开放的国家，但我却在这里看过一个十分封闭的群体。

纽约州西部，在美加边境的著名的伊里湖畔，当车子拐进一条普通公路上，一块与众不同的交通标志牌，令人陡增几分神秘感。黄底长方的牌子，墨框内上部画着一驾黑色的马车，下面是“35”两个黑色大字。不但鲜黄深黑的强烈反差引人注目，而且每小时35英里的速率限制也与美国各地大都是55—65英里的状况迥异。不久，一位汉子驾着有上盖的马车便迎面跑来。这是我看到第一个雅美什人

(Amish)。与我国北方以运物为主的大车不同，他驾的马车挺像古代的战车，是只能用以代步的。

据说，雅美什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有数以万计的信徒在美国好几个州的农村地区集中居住。他们是德意志移民的后裔。其基本特征是返朴归真，极力抵抗现代文明。美国是装在汽车轮子上的国家，两亿多人拥有一亿多辆汽车；可是，他们坚决不用汽车。没有电就没有 20 世纪的文明，但在雅美什人看来，电是不能接受的异物，电灯、电话、电视……一切家用电器，统统不准进入他们的生活领域。

美国友人兴致勃勃地陪同我们访问了公路旁的两户人家。两家都只有妇女留在家。他们住的是同美国普通人家一样的木房子。房子很宽敞，但与一般美国家庭不同，地上没有地毯，也没有任何摆设。放着在广州已多年未见的火水灯，连样式也一模一样，这不奇怪，煤油一名洋油，近代中国广泛使用是由外国传来的。令我十分惊奇的是客厅天花板上，居然垂下一条颇长的粘蝇纸，腊黄的纸上沾满了黑色的苍蝇。50—70 年代，我不时会在我国的偏僻乡村看到这个景象，想不到会在 90 年代的美国重睹这一令人颇不自在的图景。此外，车子在这个地区奔驰，常常可以看到刚洗过的衣物在阳光下晒，这在美国其他地区也极为罕见，因为他们通常都是用干衣机烘干；而在中国，这又恰好是司空见惯的。

他们过的是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承女主人告知，男的耕地、盖房子；女的在家做手工艺品。我们看到的两

家，一家用木织机织垫子；另一家车缝床罩、台布等出售。这些手工艺品价格不菲。一张双人大床罩，售价 350—400 美元；一米见方的台布或壁挂也要 85 美元。不过，在这里，确实令人感到古风犹存。路旁的小桌子上摆满一份份的草莓、水果、蜂蜜等新鲜农产品，没人看管；想要的话，到几十乃至百米开外的房子里交钱后，自行取走。屋旁是水井。在这静穆的田园中，贪欲大约已随微风吹去；没有大公司中无所不在的电子监视，也没有保安人员警觉的眼睛，却没人会想到多取一小筐桃李。真是“礼失求诸野”，想不到先圣昔贤梦寐以求的君子国居然重现在铜臭熏天的大洋彼岸！

我想，这些雅美什人追求的是文化的纯洁。不过，在这飞速发展的多元世界中，封闭世界的文化洁净通常是与文明进步背道而驰的。承主人告知：他们受完 8 年义务教育后，没有人继续上学，更没有听说有人上大学。美国政府尊重他们的意愿，在专供他们上学的学校中也是没有电话、电灯、电视……美国的中学都设有汽车驾驶课，16 岁以上经考试合格便可领到驾驶执照。在他们的学校里自然没有这门课程。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已经发现，文明程度低下的人群，通常繁殖密度比文明程度高的要大得多。这些亚美什人也没有跳出马老大爷的手掌。一个面色苍白的年轻姑娘抱着一个几个月的婴儿。我问她：“是你的儿子吗？”在女孩平均 16 岁已有第一次性经验的美国，提出这个问题算不上莽撞。答案却出乎意料：“不！是我弟

弟。”接着她告诉我：她有7兄弟姐妹。我吃惊之处在于儿女众多同我国农村如出一辙。

从理智上说，他们这种生活方式是好是坏，外人不必置喙。只要不损害他人，他们自己感到舒适的就是好的。不过，愚拙如我，归来后不但未能顿悟返朴归真的美妙，反而可怜可悯之感一再涌现心头。

为什么各种汽车经常在身边驰过的地区，会出现这么一个封闭的群体呢？如果不能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对人们心灵的禁锢是惊人的。我相信，这些雅美什人的文化信念是无比真诚的，鄙夷尘世的变迁，以不识不知为尚。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它的价值在于能为有关群体的生存、发展和提高服务。越是开放，越是能吸收他人一切优长为我所用，对一个群体越为有利。可是，文化是心理积淀，变化极为缓慢，在失去压力的情况下尤其明显。雅美什人的安逸，其实蕴含着一个前提，即有强大的美国主体社会为之庇护。加上天赐美国优裕的自然条件，维持简朴的生活颇为容易。这是他们可以慢条斯理，率由旧章的奥秘。如果他们单独建国，恐怕早已为强邻吞噬。近来，每当看到敝国某些国渣被吹捧为国粹，鼓吹开放的救国先驱无端遭诬，总奇怪地联想起雅美什人。我想，他们大约没有我们这里特有的某种类型的“文化专家”，否则，他们准可以身价百倍，成为22世纪人类文化的范式！（21世纪已考定属于中国传统的文化！）

原载《岭南文化时报》1994年8月28日

## 你无法不面对顾准

---

萨伊德还在炒得沸沸扬扬，顾准却向我们走来，尽管有点姗姗来迟。谢谢贵州人民出版社，在作者逝世 20 年后，中国大陆终于有了收集他主要遗作的《顾准文集》。谢谢诚挚的友人用快递寄来这部用血泪和睿智凝成的书，让我在 1995 年的第一个月便有幸在思想与学术的崇山峻岭中跋涉。

顾准（1915 年 7 月至 1974 年 12 月）这个名字对 90 年代的大学生乃至不少知识分子说来恐怕是陌生的。简单说来，30 年代的顾准是自学成才的会计学专家，一直在著名的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工

作，并在之江、沪江等几所大学任兼职教授，同时投身于抗日救国事业。1940年进入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各地负责财经等方面的工作。1949年后任上海市财政局长和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等职。1952年“三反”运动中受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处分。1953年后调至北京中央建筑工程部工作。1956年开始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1957年和1965年两度划为右派，“文革”后均已平反。

故事如果到此为止，那不过是55万个右派悲惨经历中的一个小故事。除了1965年再戴右派帽子极为罕见外，对司空见惯的中国人说来大约不会有多少新鲜感。顾准的奇特之处在于身处顺逆两境都要寻根究底，不停地探索。1952年，他身居高位，竟“目无组织，自以为是”，否定上级规定的“民主评议”的征税方法，建立依率稽征、依法交税的制度，冀图以现代税收制度取代革命的群众路线，从而从37岁的黄金年华开始在政治上坠入备受煎熬的炼狱。在灾难连绵的岁月里，忍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他仍在追寻历史和现实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答案，中心是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过程为何如此缓慢，为此而考查了中西历史和现状。希腊、罗马、中世纪欧洲、亚细亚生产方式、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到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孔子、老子、韩非、黑格尔、培根等思想家也一一重新受到审视。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观念都在他笔下受到挑战。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写下《希腊城邦制

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两部著作。后者是写给他的弟弟和挚友的信——18篇学术笔记和评论，本不打算发表，处处直抒胸臆，每一篇都令你不得不掩卷沉思。

按照中国传统，“处士不议”是太平盛世的标志之一。20世纪下半叶，几亿中国人已习惯于“统一思想”，却偏偏有一些人事事都要问个为什么。“我思故我在。”这或许是解答人与其他动物差别所在的最深刻的答案。19、20世纪的中国历尽千难万劫，理应出现震古烁今的思想家。迄今无缘见到，那是中国人对人类的负债。但决不能说中国人交的是白卷，顾准的著作就是填补空白中留下的重要记录之一。

要是说萨伊德关注的焦点是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顾准全部思虑的中心却是东方专制主义。处境的不同决定着人们的思考方向。曾经“赞美革命风暴”的顾准，而对的却是“娜拉走后怎样”即取得政权后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苏联、东欧、中国乃至亚非拉广大的新兴国家都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其实，许多人都思考这个问题。顾准的深邃之处，在于他视野特别宽广，对古今中西的文化、社会结构、政制、思维方式等领域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坚持内因是决定因素的观点，从中国文化和社会内部寻找问题的根源，真正如先哲所云“于不疑处有疑”，道前人所未道，直指症结所在，令读者不能不跟着他思索。在30多万字的论述中，笔者最感兴趣的是他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专制主义制约下的中国文化的论断。

以“革命”的名义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全面专政”，中国古代文化一再成为政治角力场的工具，这是顾准面对的严峻的现实。在“评法批儒”的狂潮中，顾准以出奇的冷静剖析着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渊源于巫和史，早就有诸子起于王官的说法。顾准赞成前人关于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的论断，尖锐地提出：“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sup>①</sup>在他看来，这是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特点。他申明，这是就总体上说的，“庄周、惠施，有‘至大无内，至小无外’之辩；公孙龙说过‘白马非马’；总之，战国时代有过百家争鸣，可惜为时太短。即使就是那个战国时代，学术界的祭酒荀况就大声疾呼这样的辩论无裨于治，是奸人的奸辩，应予禁绝，只准谈礼”。<sup>②</sup>

这不是他一时激愤之言，而是冷静地对比了希腊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差别后得出的结论。中国的五行阴阳与古代希腊人对宇宙的观察类似，但中国发展成为政治服务的相生相克，而他们却提出了原子假设及关于宇宙和自然的不少颇为深刻的问题。两方都有过数学神秘主义，但希腊搞出一整套几何学，而中国却没有。唯政治权威是从的古代中国人“没有逻辑学”<sup>③</sup>，而好自由辩论的希腊人却

① 《顾准文集》第244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② 《顾准文集》第243页。

③ 《顾准文集》第246页。



从诡辩中发展出完整的逻辑学和一整套文法学。“我们文字很美，但是文法学直到《马氏文通》（清·马建忠著）才有专著。”<sup>①</sup>且这部《文通》也是马建忠留学法国，学了西方的文法学才弄出来的。

顾准没有停留在文化。在他看来，中国先秦文化与古希腊文化的差别，植根于两者与地理环境有关的社会制度中。东方文化所以一直屈服于政治权威，主要原因在于东方社会制度及国家形成途径与希腊为代表的西方迥异。在被马克思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东方国家，耕战是国家威力所寄，在大陆中通过征战建立领土王国或帝国，相应的政治特征是东方专制主义。在这里，有工商业，但它在王国控制之下，那些制造武器和供应王室消费的手工业更是如此。与此同时，知识与文化也没有独立的余地。在这里，“知识无非‘求禄’，是‘货予帝王家’换口饭吃的玩意。”<sup>②</sup>否则，便消极退让，明哲保身，“不是禄蠹，就去出家”。于是，“有一种个人主义在中国很少见：像布鲁诺那样宁肯烧死在火刑柱上不愿放弃太阳中心说；……像生命可以不必要，航海却不可不去的冒险精神……像马克思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基本标帜——每个人都能够‘自我实现’（原话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那种个人主义。”中国“好像只有一个类型，文

① 《顾准文集》第242页。

② 《顾准文集》第396页。

天祥、史可法之类，而这已是中国专制政治到了末日时候的从容就义，不是社会上升进步中的殉道精神与自我实现了。”<sup>①</sup>

希腊所代表的西方文明是海上文明。“海上文明者，从土生土长的地方漂洋过海移民到新地方去之谓也。这种移民，不同于游牧民族的陆上迁移，它是经过一段并非与人斗而是与自然斗争的历程。”<sup>②</sup> 他们建立城邦国家，与春秋以前的中国有神授王权的最高政治权威驾临于各小邦之上的状况不同，古希腊各城邦很快就抛弃了被称为“万民之王”的最高政治权威；他们一般都采取“同盟”的形态处理各邦之国的关系，与东方通过兼并、征战建立的帝国有别；在内部也发展起法治、民主政制。在城邦制度的基础上，确立了公民权利观念，个人创造能力有充分发展的余地，文化得以独立发展，因而在吸收东方文明的基础上，很快就超过了东方。

紧紧抓住是从属还是独立于政治权威作为区分中国文化和以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别，以及海上文明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根本差别，顾准在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尖锐的挑战。

例如，从 30 年代开始便热闹非凡的中国古代有没有奴隶制问题，在顾准看来全是教条主义的谬误。“中国的

① 《顾准文集》第 379 页。

② 《顾准文集》第 283 页。

历史学家闭着眼睛跟斯大林走，现在读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李亚农的《史论》，觉得他们实在可怜。”<sup>①</sup>因为“奴隶要占优势成为‘制度’，这唯有在商品货币关系十分发达的工商业城邦中才有可能。”<sup>②</sup>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没有这个条件。在中国有的是鸳鸯、裘人一类家内奴隶和困苦的赋役农民。

没有宗教是不是中国文化的优点？顾准的答复是：“‘史官文化’固然杜绝了宗教发展的道路，可是它也同时杜绝了无关于‘礼法’的一切学问的发展的道路。”<sup>③</sup>“范文澜痛诋宗教，他不知道，与基督教伴生在一起的有唯理主义，这是宗教精神。固然窒息科学，也培育了科学。”与此同时，东方各国“政治权威的平民化，却不比驱逐宗教精神更容易。”<sup>④</sup>

为了证明中国有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数十年间中国史学家们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真不知耗费了多少时光。“到庚子、辛丑才醒过来的中国，说会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真是梦呓！”<sup>⑤</sup>这个直截了当的论断，是基于他对中西社会和文化特点认识的必然结论。资本主义是多种因素汇合的产物。“我们有些侈谈什么中国也可以从内

---

① 《顾准文集》第286页

② 《顾准文集》第291页。

③ 《顾准文集》第246页。

④ 《顾准文集》第352-353页。

⑤ 《顾准文集》第326页。

部自然生长出资本主义来的人们，忘掉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sup>①</sup> 而在中国，在东方专制主义统治下，城市自治体绝对不可能产生，因为中国的法是和刑而不是和权联在一起的。同时，与罗马法权传统迥异，也没有公民权利观念，“在皇帝面前，宰相也可以廷杖”，难怪“马克思讥讽中国是普遍奴隶制”！<sup>②</sup> 仅此一端，资本主义就难以产生，更不用说其他因素了。

顾准谈论这些问题自然不是墨人骚客闲来无事，发思古之幽情。他一再说，历史没有什么好后悔的。可是，要正视中国历史的重负，“如果探索一下中国文化的渊源与根据，也可以断定，中国产生不出科学与民主来。”<sup>③</sup> 这是与潜存着希腊文明因素的西方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与骑士文化不同的。他就是为着摆脱历史重负而去研究和比较中西文化的。

与时贤越唱越高的东方文化颂歌相比，顾准真是满肚子不合时宜。我想，即使不被戴上“崇洋媚外”乃至“洋奴”、“买办”等大帽子，“民族虚无主义”的责难恐怕是免不了的。一个毕生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至死仍念念不忘自己的祖国何时“雄飞世界”<sup>④</sup> 的知识分子，如果真的被

① 《顾准文集》第318页。

② 《顾准文集》第317-318页。

③ 《顾准文集》第348页。

④ 《顾准文集》第330页。

“左”爷在90年代又一次戴上这一类帽子（其实仍是“右派”），这就不仅是某个人的幸与不幸的问题了。

问题的实质是我们这个民族有没有自省精神。顾准的任务不是编写中国文化概论，他没有必要一一评述四大发明、楚辞、汉赋、唐诗、宋词。思想家关注的通常是历史前进的主要障碍。在70年代一针见血指出屈服于政治权威的史官文化无助于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化，在当日媚世谄上的浊浪滔天之际，固然不愧为中流砥柱，时至今日似亦不无教益。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对某种文化持批评或者是赞扬的态度是不是爱国与否的分水岭？读者切莫以为笔者胡编乱造。从鸦片战争至今日升平盛世，不断有以忠臣义士自居的人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文坛。他们有些思维模式是颇为奇特的。简单说来不外是：赞扬西方、批评本国、否定传统都有卖国之嫌；而不按某一调子去论述传统也有离经叛道之责。总之，就是不愿让文化还给文化，令知识分子难以从容论道。

19世纪的突出典型是郭嵩焘。只因在19世纪70年代说过一些赞扬西方政教的话和建议朝廷稳妥处理某些事件，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被加上“卖国”的恶谥。20世纪的标本是胡适。在满目疮痍的20年代，说了一句中国“事事不如人”，无非是劝国人承认落后、不甘落后而已，却一直被认定为如假包换的买办文人（中国大陆有些人士至今仍作如是观）。

毫无疑问，中国文化中有不少瑰宝。但中国传统文化

也有一个致命弱点是华夏中心主义，并由此派生出民族自大、自我封闭等一系列反常心理。它与政治权威至上的东方专制主义结合，成了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过程的重大障碍。一部现代中国思想史很大程度上是对华夏中心与专制主义思想的抗争或自省史。所谓启蒙、民族觉醒都与此密不可分。其中影响最深远的自省莫过于新文化运动。奇怪的是近年流行的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批判，一句史实根据很不充分的“全盘性反传统”，竟被不少人奉为圭臬。<sup>①</sup>仿佛民族自省不但早已完成，而且已经过头了！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东方文化颂。似乎中国近年经济的迅速发展不是来自改革开放，而是来自中国文化或某一地区文化有与众不同的基因；至于过去一百多年的落后，则是侵略者的罪行，与本国固有文化的本质是没有关系的。于是，萨伊德此时驾临中国，正是圣之时者也。

可是，不识时务的顾准终于露面了。如果此时要谈东方文化，任何人都无法回避顾准的挑战。同时，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他还提出了其他学术上的重大问题。王元化先生说他最感兴趣的问题有八，“这就是作者对希腊文明和中国史官文化的比较研究；对先秦学术的概述；对中世纪骑士文明起着怎样作用的探讨；对宗教给予社会与文化的影响的剖析；对法国大革命直到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的

---

<sup>①</sup> 参阅王元化先生的有关大作及袁伟时：《胡适与所谓“中国意识的危机”》（《文化与传播》上海文化出版社1993年版），兹不赘。

总结；对直接民主与议会制度的评价；对奴隶制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阐发；对黑格尔思想的批判与对经验主义的再认识等等”。<sup>①</sup> 挑战极为尖锐，神圣被视为敝屣。研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中外历史、中西文化和现代化问题的学者，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学者，如果没有读过顾准，实在是极大的缺陷。你可能痛斥他，但无法回避他。

有位才华横溢的青年学者读了顾准的笔记后，在其研究法国近代思想的博士论文序言中，动情地写下这么一段话：“这是当时被排斥在主流学术界之外，一个优秀思想家写给抽屉而不是写给出版社的思想手记。也许被排斥的遭遇恰恰保护了真正的生命，我在本书中费 30 万言所欲说明而且不一定能够说明的内容，都已被他在 20 年前点破。面对如此犀利的先知先觉，我不能不肃然起敬。”<sup>②</sup> 也许这是一个报春燕子，预示着将会有更多的中国青年才俊在顾准启迪下，写出无愧于时代的论著。更企盼《顾准文集》的出版是值得人们久久注视的信号，标志着中国人在思想文化领域终于告别野蛮，学会现代文明所必需的思想自由和宽容。

原载《读书》1995 年第 5 期

---

① 《清园夜读》第 217 页，海天出版社 1993 年版。

② 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序，第 9 页，上海三联书店 1994 年版。

## 企盼学派崛起与回归五四 ——答《南方周末》记者谭庭浩

---

### 个人的变与不变

谭：你有两个出人意料的转折：一是从大学本科到研究生班念了六年经济学，却转去研究19、20世纪中国历史。二是你的《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上卷）以翔实的史料和出色的分析赢得广泛的赞誉，不继续写完这部巨著，却拿出一本《晚清大变局的思潮与人物》（以下简称《晚清》），这是为什么？《晚清》一书新见迭出，几乎改写了一部中国近代史，且说得有理有据，思想与学术交融，有很强的现



实感，你有没有受到外来的压力？

袁：了解我在人生追求中的三点不变才能理解我的变。不变的是对祖国命运的关怀；独立思考；心口一致。这是告别山村到广州上高中时养成的。以为富强就要成为现实，所以念经济。毕业后，经济失控，经济资料保密，讲课、写文章口径要统一。没有独立思考的空间，不能说自己的话，这是难于忍受的。现代哲学史写到1927年，眼看写下去敏感问题太多，只好先说说道光至光绪年间的事。根据自己的研究心得，对一系列流行观点我都不同意，结果就有了对中国近代史的另一种解读。从同行专家到青年学生、普通职工，许多人喜欢这本书，说了很多鼓励的话。也有人很不同意我的观点。在学术领域，这是正常现象。令我一再沉思的是，为什么说说19世纪的陈芝麻、烂谷子也有那么多禁忌？是不是中国的知识阶层阿Q化了？“光也讳，亮也讳……连灯、烛都讳了。”我们知识界的某些人迄今仍停留在地把一切纳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生死斗争的水平上，根本没有学术自由、平等讨论、自由交流的观念。而学术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不同学派的竞逐。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不同的学派，等而宣告文化专制主义仍在那里逞威，或是思想文化的不毛之地，也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

#### 五四与现代思想文化制度

谭：说到文化教育制度，使我想起5月3日你在“鲁

迅与五四”座谈会上的发言。你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本质是现代思想文化制度的建立。这个论点很新鲜，你的根据是什么？

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已经有过一次群众性的启蒙运动。甲午战败后，严复总结历史经验，石破天惊地宣告：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别和富强与否的关键是“自由不自由”，标志着这个运动的开始；戊戌政变后没有中止，一直延伸到辛亥革命前。它主张学习西方，冲破传统思想文化的罗网，批判以三纲为核心的中世纪意识形态，倡导确立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实行道德革命；鼓吹小说革命、诗界革命、史界革命、语文合一；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建立新的文化教育体系，创立报刊，以新式学堂取代科举和旧教育；实行法治和民主（君主立宪）。从倡导和反对的内容看，新文化运动不过是它更深、更广的重演。说到底，两者都是方生的现代新文化取代该死未死的中世纪意识形态的过程，或者说是思想革命的过程。

要进一步思考的是这两个运动的差别在哪里？走出中世纪，实现现代化的实质是要实现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思想自由，这些自由必须体现在制度上，法治和民主是为这些自由服务的。两个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追求的是两个目标：1. 保障思想自由。为此努力建立以言论自由为核心的思想、文化、学术在国内外自由传播和交流的制度。2. 保障思想、文化、学术不断自我更新。为此要建立现代教育和研究体系，其核心是建立以学校独立、学术自由

为基本原则的现代大学制度。人们通常说的文化现代化主要就是由这两个方面构成的。新文化运动与第一次启蒙运动的根本差别，就在于它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建立了现代思想文化制度。戊戌前后的启蒙不得不托庇于官僚或外国势力，不少重要的启蒙报刊是在日本、港澳或租界出版的。那时虽然建立了新式学堂，但仍在中世纪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之下。辛亥革命后虽有短期的言论自由，袁世凯政府很快就继承清帝国的衣钵，恢复书报发行前的检查制度。袁氏逝世后，这个例行逆施被取消。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按照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改造了这间著名学府，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大学，并成了其他学校仿效的榜样。离开上述制度变迁，就无法理解全国在一两年内便冒出四百多以新文化为指针的报刊，也无法理解各种思想文化流派争芳斗艳，各种现代学术、文化艺术纷纷建立，思想、文化艺术和学术新星乃至大师不断涌现。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现代思想文化制度是难于分割的一体两面。虽然其持续时间仅为10年左右，仍不愧是20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大事。它虽深受守旧者的反对，最大的威胁却出自打着革命旗号的国民党。它从广州开始推行“党化”和“三民主义教育”，并随其势力扩大而推广到全国；与此同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出版物原稿审查制，取消了言论自由；现代思想文化制度被扼杀，新文化运动也就寿终正寝了。

### 为何主张“回归五四”

谭：所以您主张“回归五四”？可流行的观点是“超越五四”。您的主张意味着什么？

袁：两种主张至少在口头上都赞成“继承五四”，这是共同点。任何事物都要发展，不可能一模一样地回归，从这个意义去理解超越，我也是同意的。不过，“超越”论的提出是另有含义的。他们认为新文化运动出了偏差，“全盘反传统”、“全盘西化”，要回到“创造性转化”的路上来，才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我以为这个主张有两个失误：

第一是片面了解历史带来的迷茫。人们似乎不太了解中国现代文化瓦解与取代旧文化是不同流派多元互动的成果，不是严复、康、梁、陈独秀等人一锤定音的产物。新文化既不依仗政府的权力，亦无一统天下的语言霸权，在自由传播、自由争辩的状态下，某些偏颇言论对社会生活不构成任何危险。人们还忽视在第一次启蒙运动中，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已有良好开端，不但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人于此有卓越建树，国粹派诸子也作了有益的尝试。从上一世纪之交开始，中西融合就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夸大“全盘”论的危险，并不符合实际。

第二是观察现实的偏颇。许多人大约也会和我一样，很难理解面对历史积垢如此沉重的社会，面对规模空前的古籍出版狂潮，人们忧心忡忡的竟是深怕传统文化失落。

这是认识的偏颇，但也不排除其中有些人有对现实状况视而不见之嫌。

据我观察，当务之急是回归五四。其实质是携手为创建现代思想文化制度尽心尽力。不容否认，中国公民的创造力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挥，在全球一体化无法逆转的形势下，这是非常危险的。除深化制度改革，再造一个像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的那样的思想、文化、学术自由发展的环境，我看不出有其他出路。

原载《南方周末》1998年5月15日

## 推荐三部好书

---

### 1. 《爱默生与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

（钱满素著 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

这是作者在哈佛苦读8年写就的博士论文。

爱默生这个名字对不少中国人是陌生的，但这部书说的却全是与当代中国人息息相关的问题。“人是观念的囚徒”，真正的革命是观念的革命。从19世纪30年代起，爱默生在美国推动了一场观念革命。生活要求冲破清教徒带来的加尔文教的束缚。这场革命的中心是

确立个人主义。“唯一的罪就是限制”，“每一个人都相信他有一个更大的可能”。为什么个人主义成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现代社会的支柱？个人主义过时了吗？如何看待对个人主义的种种指责和忧虑？从上一世纪70年代起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中国人写个人主义，写得如此精辟的却极为罕见，这大约与体验过文革的“全面专政”不无关系。

## 2. 《自由与繁荣的国度》

（路·冯·米瑟斯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本书原名《自由主义》，译者选择了一个含混不清的译名，大约同严复在世纪初把穆勒的《自由主义》译为《群己权界论》一样，考虑了中国特殊的国情。走向世界必须了解世界。中国人最需了解而又所知最少的莫过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两者互为表里，是建构西方现代社会制度的最重要的思想基础。近年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自由秩序原理》及其他思想家的自由主义名著陆续有了中文本。对广大读者说来，米瑟斯的这部名著仍不失为了解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优秀读本。自由主义的历史和定义；它与自由、平等、暴力论、政府行为、反社会行为、各种所有制及干预主义、垄断、官僚化、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自由贸易等等的关系；在与种种批评意见的论辩中阐释得娓娓动听，引人入胜。

### 3. 《公共论丛》

(刘军宁、王焱等编辑, 北京三联书店, 第一辑:《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 第二辑:《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 第三辑:《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 第四辑:《自由与社群》)

这是中国特产——所谓“以书代刊”的连续出版物, 所以每一辑还有个书名。随着全能政治逐渐消褪, 中国人开始懂得必须严格区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而由于现代公民意识的觉醒, 对公共事务如民主、自由、法治、宪政、公共道德、文化、民族主义等等的关怀日益增长。这个论丛应运而生。在我看来, 它有三点特色: 1. 以学理回答现实问题。文化层次较高的中国人关注的每一热点几乎都在这里有所回应, 且是深层次的分析。2. 从古今中外的思想学术中寻求资源, 针对中国学人和广大读者的弱点, 介绍有关的基础文献和基础知识。如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就是在第 1、2 辑中第一次介绍给中国读者的。3. 打破学科壁垒, 以现实问题为中心, 综合论证, 兼顾学人和一般读者。这是三联继《读书》以后贡献给读者的又一优秀刊物, 而其敏锐和深度已超越前者。

原载《南方周末》1998 年 5 月 15 日



## 寻求现代社会的共同性 ——我看黄仁宇的“大历史”

---

三联书店一下子推出黄仁宇的四本书：《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国大历史》、《哈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万历十五年》，而且每本印数高达两万五，大约是看准了这是雅俗共赏的好书。读了过去没见过的头两本，颇受启迪，有三个基本思想更值得讨论。

### 跳出牢笼“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

在《中国大历史》中，作者重申：“我写的历史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中文版自序》）

在“文以载道”已成传统的中

国，此话有点不太中听。但正如作者所说，“道德是真理最后之环节，人世间最高品质，一经提出，即无回旋余地，故事只好因之结束。”<sup>①</sup>道德如何才不至成为认识的屏蔽？

道德，特别是私德，不是评价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拿破仑是登徒子，藉革命营私，兄弟姐妹，裂土封王。吴佩孚则“不纳妾，不积金钱”，“不出洋，不走租界”，洁身自好，坚持民族大义。但鸿鹄燕雀，如何比拟？

中国文化有个重要传统：在政教合一体制下，假道学口若悬河“卫道”，乃至打小报告制造文字狱，屡见不鲜。凡事先问个是华是夷，姓社还是姓资，“历史为路线服务”。按照此辈的观点，19世纪以来一切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人，都是汉奸、卖国贼，从轻发落也是买办、洋奴。流风所及，时至20世纪90年代仍有人大骂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先驱郭嵩焘。这是十分有趣的文化现象。

从技术而不从道德看历史，实质是冲破意识形态的偏见，以基本事实为基础去看历史。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道德都很重要，但其内涵必须符合时代和历史的要求。对一个史家说来，不为权势与私利所动，按历史的基本面貌秉笔直书，无疑是最高的史德。这样的“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是应该击节赞赏的。

---

<sup>①</sup> 《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270页。

### “大历史”：高瞻远瞩与削足适履

黄仁宇说他写的是“大历史”。我想，其大有三：1. 跨度大。用百年、几百年乃至千年的眼光去观察历史。2. 视野大。把一国放在世界全局中去考查，从多国比较中发现其中的共同性。3. 向现代社会发展困难大。以中国为例，从“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sup>①</sup>

大的或宏观的史学统揽全局，气势雄伟。其长在揭示历史发展的主流，往往一语破的，有时读来不禁拍案称奇。但弄得不好，也可能为了坚持某一观点而强物就我，削足适履。《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考察了11国，但同其他几部书一样，其立足点在中国。笔者的印象是“大历史”的长短，在评述中国之际，均自自然然地流露出来了。

在黄氏笔下，“鸦片战争以来之事并非一连串，做得无头无脑上下不得的错误。”“也不能说中国已放弃了很多机会，坐费了不少宝贵光阴。”<sup>②</sup> 仿佛一切都是在劫难逃。从北洋军阀到蒋介石、毛泽东包括其成就与错误似乎都是历史的必然。

问题回到历史必然与个人选择这个古老问题上。历史

---

① 《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

② 《中国大历史》第294、295页。

是对昨天以前的事实的记述和分析。记下已经发生过的，视之为当然，有过于简化之嫌。必然与选择是互相制约的。走向极端，抹煞个人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作用，在历史宿命论的泥淖中失足，无法把错误转化为历史智慧。

以对蒋介石的评述为例。黄仁宇在列举蒋氏在政治、经济和对外战争中的成就的同时断言：“蒋曾受无数指摘。……可是批评的人自己就不能说明如何可以避免这些错误，此外他们也没有另辟途径的讲出应采取的路线。”“要是忽视他的作为的积极性格，则任何人无从以技术角度解释何以中国在 1980 年代和 1920 年代会有如是剧烈的差异。”<sup>①</sup>如此说来，蒋氏的错误也无可厚非。

其实，蒋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是不是在 20 世纪的中国只能实行专制或权威政治？黄氏有个观点是不准确的：“蒋介石可以被认为首先给中国制造了一个原始型的统一政府。”<sup>②</sup>民初的袁世凯已经有过这样的政府，但他自己以称帝的倒行逆施毁灭了这一局面。蒋介石没有从袁氏的死亡陷阱中学到足够的东西。他同袁氏一样用践踏现行法律的行动扶植起反对自己的力量。1931 年，仅因对要不要制定约法等问题有不同意见，蒋便把对他实行个人独裁有所牵制的国民党另一重要领袖胡汉民软禁起来。结果是国民党又一次分裂，广州成立了另一个国民政府，中国又一

① 《中国大历史》第 285—286 页。

② 同上，第 297 页。

次走到内战边缘。接踵而来的是 9·18 事变。当时实行的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权威政制，胡的主张没有任何触犯现有体制的意图，这一事件显然是“可以避免”的。

黄仁宇的“大历史”一再强调中国向现代体制蜕变的困难，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黄氏忽略了经过甲午战争与义和团两次惨败的剧痛，也由于自强运动推动下社会内部多种因素的渐变，从 20 世纪初开始，中国已经出现多次以现代社会管理制度（包括政治体制）取代传统体制的机会。就客观条件而言，至少不比明治维新前的日本逊色。不能忽视丧失机遇的主观因素。历史曾经把实现现代化的机遇摆到摄政王载沣、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等人的面前，失之交臂的缘由与其推诸客观，毋宁从他们自身的素质和选择中去寻找。

与此同时，黄氏也忽视了有些社会因素具有自动调整和生长的功能。他认为：“中国在 1905 年停止科举考试，实际上已截断了高层结构与低层结构间的联系。”<sup>①</sup> 其实，这个姗姗来迟的改革不但没有截断而是扩大了上下层的联系。光绪年间，每科进士在 300 人左右，历时 30 年，共考取 4087 人；而每科乡试参加者约 19 万人，录取的举人还不到 1500 名，百人挑一狭窄之至。<sup>②</sup> 这是下层上升的唯一“正途”。为博得“正途出身”的美名，连留学归来并已身

---

① 《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 476 页。

② 张仲礼：《中国绅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61、169-170 页。

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和监督（校长）多年的严复也要低声下气地三度赴考（限于篇幅，其他途径从略）。向现代社会转型则意味着这一途径大大拓宽。清帝国灭亡前，仅大学和专科学校毕业生已达 3184 人<sup>①</sup>；而据 1909 年的统计，新式学堂已近 6 万所，学生已达 164 万人；此外还有 1 万多人在海外各国留学。这些学子不但所学内容与生员、举人们迥异，也为新的社会上下层建立了更加广泛的联系。

“大历史”面对的是上下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任何史家都难于操纵自如，不露瑕疵。于是，称孙中山为“医学博士”；陈独秀为中共“秘书长”，1942 年“因癌症死于狱中”<sup>②</sup> 这一类疏误的出现，无非表露了通达方家也难免对某一时期历史细节的不熟悉。这亦可算“大有大的难处”吧。

### 中国“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

黄仁宇直截了当地宣称：“近代中国面临的最大一个问题乃是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sup>③</sup>。作为长期在美国执教和研究的史家，他认为“资本主义几乎与现代同质而异名”，因此，这一论题在他笔下常常表达为：“为

①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 30 页。

② 《中国大历史》第 267、277-278 页。

③ 《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

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sup>①</sup> 只要理解作者的语言习惯，把“姓社还是姓资”之类腻味透顶的问题留给有足够牙力的人们去唠嗑，其论述不乏教益。

这一问题不是黄氏首先提出的。几十年前冯友兰、李约瑟先后提出了类似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科学？顾准的提问和结论更与黄氏几乎同声同气，虽然彼此没有什么联系，各自独立探索，殊途同归。心同理同，他们都在为中国现代化的障碍迟迟未能排除而焦虑。

现代社会的标志是什么？“一个现代国家，其社会由货币管制。……物品和交换工作彼此交换……权利和义务全有法律明文规定。一个多元的社会成为可能……能使其公民做以前不能做的事。”<sup>②</sup> 简单说来是：让市场经济成为整个社会运作的基础；充分保障包括财产权在内的各种公民权利，任其在自由竞争中展现其才能和个性；并相应地建立严格的法治制度。按照这个已成为许多共识的标准，黄仁宇对中国社会作出好些发人深省的分析。

我们的史书曾反复告知人们，外力是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主要障碍。黄仁守却以确凿的史料证明，现代体制在各国，都“非经内外煎逼，不会平白的被采用”。<sup>③</sup> 当年威尼斯商人在英国就曾享有治外法权。日本更曾被迫让外国人享有治外法权，直至 1899 年才废除。中国现代化的艰

① 《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 26 页。

② 《中国大历史》第 231 页。

③ 《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 33 页。

辛的主要原因也应从社会制度本身的缺陷中寻找。

热衷为外因论寻找根据的史家们曾煞费苦心在明清乃至宋代寻找“资本主义萌芽”，以证明要是没有外来侵略，中国可以自行缓慢地发展至资本主义社会。同顾准一样，黄仁宇嘲笑这类在伪问题上翻跟斗的尴尬。如有兴趣，这类“萌芽”在先秦时期就不难找到。问题在于这些成分为何不能成长为占支配地位的经济体系？

首先，这是由于中国传统的财政经济体制“不容易容纳一种商业体制”<sup>①</sup>。分封制早已废除，收支均由中央政府统筹，加上防兼并、重“均田”的传统，从地方政府到个人都不致力于绝对的私有财产权的确立，各种经济因素无法自由公平地交换，作为现代经济首要条件的“有效率的私人财产权”就无由建立了。

随之而来的是中国传统的法制也成了资本主义难以逾越的障碍。中国既没有司法独立的传统，也没有城市自治抗击专制政权干预的传统，民众权利的保障本来就非常薄弱。法律内容本身也处处为经济发展设防。历代法律常常有“人子不蓄私财”的规定，《大清律》写明：“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这是《明律》抄来的。而在唐宋时期处理更为严厉，同一罪名要坐三年牢。关于财产的获得、转移、买卖、分割、租赁、破产及其责任等等的规定都极简陋或根本没有。法律以维护

<sup>①</sup> 《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第456页。



道德和意识形态为最高原则。这些都与西方法律传统迥异，工商经济系统的发展也不能得到应有的支持。

最令时贤侧目的可能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论断。与当前响彻云霄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携手共进的欢乐曲相反，黄仁宇在两个基本点上反复揭示了两者是格格不入的。

一是防止兼并、压制豪强的“均平”思想。其实质是在标榜道德的外衣下，令私人财产的绝对性无从固定，培植出千百万安于现状的小农，以金钱为基础的经济网络就无从编织和日益壮大。

另一是以息争、内省为基础的和谐观念。从历史的角度去观察，这个为人们称颂不已的思想，不过是补法制不足，用以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它的压制竞争的效应，遏制着资本主义在中国诞生。

结论明确而尖锐：“传统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结构与西方现代型国家的经济组织相去甚远，而且自思想理论至生活经验，中国文化中可以改造利用者相当少。”<sup>①</sup> 这个结论的前提是：任何国家进入现代社会其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的基本架构必然具有共同性。反对者可以大骂这是“西方中心论”。但史家的思维只能以历史事实为基础。当今世界公认已现代化的国家千差万别，其基本制度不是都与西方大同小异吗？

---

<sup>①</sup> 《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第453页。

正因为清醒地认识到现代社会的共同性，而中国传统社会与传统文化与之相差甚远，黄仁宇才把百多年来的动荡和“革命”视作中国摆脱历史重负的必要代价。鉴往知来，决定中国现代化成败的主要因素仍在能否扩大开放，各个方面敢于“同国际接轨”。无视历史教训，高唱辜鸿铭、林纾等人早已唱得烂熟的“中国文化救世”歌，固然可以赢得虚幻的心理满足，但于实事无补。这样说，毫无糟蹋一切真正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之意，这里讨论的仅是过时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吹沙见金，自当别论。这样说，也不是什么“全盘西化论”。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有与众不同之处。何来“全盘”相同之虞？以青年陈序经的一句稚话吓人，实在没有什么意思。

1997年8月28日

## 路标与灵魂的拷问 ——读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

---

1997年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是洋人在叱咤风云。光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自由秩序原理》已令人心潮激荡，思绪万千，何况还有其他大开眼界的好书。遗憾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声音太弱了。还是顾准与陈寅恪的余波，没有新的热点。进入1998年，传来意外的惊喜：手稿在多家出版社辗转旅行的《现代化的陷阱》终于在北京出版了。

不少所谓国情研究读物，往往是不堪卒读的宣传材料，真正称得上学术著作的不多。这部书不但有当代中国颇为难得的学术水准，而

且显示了作者高度的学术良知和道德承担。从书稿到正式出版，两次捧读，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这是一部追问中国路径取向的书，也是拷问知识分子灵魂的书。

20年改革开放，人们已写下了不知凡几的颂歌与忧思。在总结时贤的焦虑和智慧的基础上，何清涟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把一个关乎国家发展前途的重大问题摆到中国人面前：中国正在十字路口上，“中国的社会转型现在已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面临着极富现实意义的选择”<sup>①</sup>，“对转型期的中国来说，走向法治化的现代‘公民社会’与走向‘意大利模式’的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sup>②</sup> 后一模式的特征是官场大规模腐败，官、商、黑互相勾结，黑社会横行，治安恶化，分配严重不公，民众贫困，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后一状况加上环境严重破坏，在拉丁美洲、南亚和东南亚屡见不鲜。

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日益浮现在中国的现实。作者以确凿的材料描绘了这么一幅图景：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美国；由于来路不明或害怕政策多变，资本外逃比例已达每年新增外债额的 52.3%，90 年代后已接近或超过了新增外债额；在这个还有 6000 万人吃不饱穿不暖的国家，每年公款吃喝挥霍近两千亿元，外加洗桑拿浴花掉 200 亿；黑社会已在各地广泛出现，黑白勾结，不少地方的娱

① 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8 年 1 月版，第 282 页。

② 同上书，第 350 页。

乐业、色情行业都在他们卵翼下……

这是十多年来大规模的中国特色的资本原始积累——自发私有化的恶果。其特点是特权阶层和贪官污吏以世界罕见的速度巧取豪夺，侵吞国有资产。国有资产平均每年流失 500 多亿元，每天 1.3 亿元；而流失的成本高达 70%，仅有 30% 有望转化为重新投入经营的资本。

不管多么惊心动魄，这些都不过是中国人耳闻目睹的经验事实的系统化。作者没有停留在这个水平上，而是深刻地进行了两个有重大意义的追问。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改革成了权势者的盛宴？80 年代中后期开始的股份制改造成了“社会主义的免费午餐”；1992 年达到高潮的“开发区热”成了中国式的“圈地运动”，权势者大量瓜分土地资源及其收益。楼价的 20%—50% 成了向他们进贡的买路钱，孳生了一大批亿元级的富豪！

作者反复强调，不是改革而是改革不彻底和改革的指导思想失误导致这些恶果。我们推行的实际上是国际上流行一时的效率优先，认为发展与公平不可兼得的战略。在追求 GNP 增长的时候，把社会公平和正义置诸脑后了。

长期以来，海内外学人对公平和正义有不同的诠释。经过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显然已把平均等于公平、侵犯个人自由混同于正义的荒谬不屑一顾。作者认同的是起点的公平和过程的正义。

以财富差距的扩大来说吧。一个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

大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实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这是无法避免的现象。在市场正常竞争的条件下，一些地区得风气之先飞快前进，某些地区或一部分人却因基础条件太差而迟滞不前，即使贫富差距暂时大于现代化的欧美也不可怕。人们会理解这是现代市场经济与落后的自然经济的反差，也期盼在前者逐步推进中改变这种状况。可是，当不是市场的平等角逐，而是特权让一些人暴富成为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乃至主要原因之际，这种后患无穷的畸变就成了难于容忍的毒瘤。

到1993年3月，已有县以上开发区6000多个，占地1.5万平方公里（当时全部城市用地面积也仅有1.34万平方公里）。在这造就亿万富翁最多的中国特色的“圈地运动”中，只有10%的土地是通过正常市场程序拍卖或招标的。那些避开市场而操作的黑幕有谁能够查清呢？拒绝发展是愚蠢的，黑暗不是来自开放和市场。只有深化改革，建立公开透明的法治和市场，才是现代社会足以信赖的公平和正义的保证。

“深刻反思改革中的全部难点就会发现，成为改革最大阻力的因素就是权力市场化。”<sup>①</sup> 政权和腐败是孪生的。在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期间，腐败赖以滋生的土壤更为广阔和深厚。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经济资源大都掌握在政权手中的国家，由于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紧密结合，几乎社会

---

<sup>①</sup> 《现代化的陷阱》第362页。

生活的每一环节都潜藏着腐败的机会。近20年所以出现世界罕见的自发私有化和惊人的原始积累，主要原因就是权力没有受到应有的限制、监督和牵制，形成了权钱交易和结合的黑暗局面。

因此，对腐败的义愤和公平与正义的诉求应该集中指向体制改革的实践。“在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大家才发现，所有被小心翼翼绕开的问题，最后都形成了一种滞后效应，累积成今日无法避开社会矛盾。”<sup>①</sup>人们说反腐败的成败将决定国家的命运。说得更准确一点，其实是体制改革的成败将决定国家的命运。

作者一再尖锐地指出：“必须将权力尽快分离出经济领域，使政府由过去经济生活的主体变为仲裁者……只是这种制度安排必须通过非经济领域的改革才能完成，可以说，这种制度创新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根本性制度建设。”改革多年，从整体看，国企却至今没有走出困境，说到底就是没有抓住这个“根本性制度建设”。

人们已经认识到中国应该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经济体制。同样决不可少的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权力应该是多元、公开、依法运作的。基础是强大的“公民社会”和受到严格监督的“有限政府”，近似于报刊上流传多时的“小政府，大社会”。这是中国避免重蹈“意大利模式”，建

---

<sup>①</sup> 《现代化的陷阱》第3页。

立现代法治社会的必由之路。

第二个有重大意义的追问指向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某些所谓专家。

作者的感慨是由腐败盛行之际居然有经济学家高喊“腐败有理”引起的。问题的实质是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学者应该如何定位。

作者猛烈抨击了曲学阿世之辈，揭露人文教育的失败，为经济学、伦理学、史学……的沦落痛心疾首。这些现象背后蕴含着什么？

在中国，知识分子是过于笼统和用得滥的概念。其实这个笼而统之的名词包含着有重大差别的几类人：宣传干部，忠顺的文员，各专门学科的技术人员和学者，有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的探索者。只有最后一类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近半个世纪我们的教育在数量上有飞跃的发展，源源不断地培养了为数不菲的前三类人。可是，也出现了两个极为严重的问题：

一是用民族主义的眼光去看待学术，几十年间，从物理、化学、生物……等领域到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搜寻“资产阶级学术观点”成为时尚。中国学术文化成了自我封闭的围城，尽管经过十多年的冲刷，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有形与无形的堤坝仍若隐若现。

二是以忠顺为最高品德，把宣传混同于学术，把创新视为离经叛道。在继承东方文化尊经崇圣的基础上，又加上种种有形无形的桎梏和禁忌。学术文化的更新和创造的



能力摧折殆尽。

于是，在最需要经济学的时刻，却难于找到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经济学和有真知灼见的经济学家。在急需哲学和伦理学之际，拥有人数可能已超过其他国家总和的哲学教授的当代中国，有没有自成体系的哲学家却是尚待认真考证的难题……人文与社会科学在不应缺席的时候缺席了！

道德的责难是应该的。在同样的环境下，有人媚俗谄上，有人却不顾险阻在寻求学术生命的真谛。

但归根到底，问题出在教育制度。请听听何清涟的诤难吧！“我们的人文教育品质出了严重的问题。”“‘文革’之前的30年，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的人文研究和人文教育。”而直至当前，“代表着爱和智慧之源的人文科学在中国正处于日益衰竭之中。”“从而导致中国现在出现了大批拥有博士、硕士头衔的知识贫乏者。”<sup>①</sup> 这些刺耳的声音应该引起良知未泯的人们深思。

由于教育制度不良，缺少知识分子顺利成长的环境，中华民族仍然在创造力衰减的低谷中爬行。富裕如新加坡，由于冲不破东方文化的羁绊，仍在哀叹创造力不强。中国的状况更等而下之。不是说要把中小学转到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吗？作为龙头的大学教育不转轨，这是难于彻底实现的目标。人类的自然素质相差不远，道德水平和创新能力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制度。对社会正常运作必不可少的强

---

<sup>①</sup> 《现代化的陷阱》 第372—375页。

大的知识分子群体能否顺利形成也取决于制度。各国的高等教育都有各自的特点，但凡是合乎标准的现代大学都奉行以保障学术自由为核心的一系列共同原则。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大学制度，已经成了深化改革中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

为此，必须首先解决两个重要的认识或是非问题。

一是大学要不要与国际接轨。有些论者反复说，各国没有统一的教育制度，怎么与国际接轨！这个说法忽视了一些基本情况。首先是包括中国现行教育体系在内的各国教育，都是按照现代西方的教育体制建立起来的。中国的大学本是学习西方的产物。其次，各国的大学诚然有自己的特点，但异中有同，凡真正的现代大学必然奉行一系列共同的基本原则。核心是保障学术自由，鼓励师生自由探索，创造思想，创造知识，创造科学和技术。不但出科学家和工程师、企业经理和公务员，还要出思想家。这就如一位西方哲人所说的那样，把我们大学变成“一个催人思想的思想之家”，有“对例外和奇特的宽容”。<sup>①</sup>与此同时，教学和研究的内容应该力求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同步，应该有同各国同行紧密联系的信息系统，教师的任用应该有严格的学术标准等等，更是不言而喻的。经过多少年的反复折腾，人们终于醒悟，中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要生存和健康发展，关键在必须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现代企业（金融）

---

<sup>①</sup> 《詹姆斯集》，第452、455页，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度。以中国特色为借口去抗拒这个趋势的人似乎不多了。真不知中国人还要付出多大代价，何时才能惊醒，察觉不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大学制度，必然大量产生出怕烧伤自己手指的庸人，创新能力萎缩的局面无法改变，科教兴国难以实现。

另一是要不要培植有强烈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没有臻于极限的学术文化，也不可能有止于至善的制度和各项事业。批判是前进的动力，“闻过则喜”是先哲明训。把批判现存黑暗等同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40年前的噩梦不堪回首，也不想絮叨批判计划经济主张市场经济被视为“自由化”的昨日的事，还是让我说个几年前的外国故事吧。1988年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利根川进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后回到祖国，人们问他：为什么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科学家大都是在国外工作的？他坦率地说：症结在东方文化。要有大的创造，就必须借用释迦牟尼的一句话：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这与东方实际生活中的文化氛围是不相容的。（大意）对习惯于把批判视为异类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不可忘记的当头棒喝。真正关心祖国命运的中国人，不妨扪心自问：你喜爱的是恭顺还是批判？

中国社会转型的艰辛和曲折呼唤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复兴。一个弱女子以基于道义力量的敏锐视野和扎实的研究写出一部切中时弊的好书，这是值得庆贺的。可是，这部小书历时一年多的旅行经历也令人心酸。不必苛责踌躇再三终于退稿的编者，应该理解他们的苦衷。“我劝天公重抖

擻，不拘一格降人才！”1839年，龚自珍悲不自胜，奋笔疾书，冀图改变既无才相、才士，亦无才商、才盗的庸人年代。本世纪初梁启超引用这一名句为古老中国焕发青春大声疾呼，但腐朽的清帝国依然无动于衷。1958年毛泽东再次叨念这一名句，期盼中国“大跃进”，不幸，他自己又运用体制的力量制造万马齐喑的局面。整整160年过去了。理应扣问历史，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永远结束这一可悲状态的时机难道还未成熟吗？出众的书，不甘平庸的知识分子，总是有棱有角，不可能与先验的规范吻合。偌大的中国，为什么不能有“对例外和奇特的宽容”？

原载《粤港周末》1998年2月20日

## 中国现代化的陷阱在哪里？ ——再读《现代化的陷阱》

---

何清涟有一双锐利的大眼。《人口：中国的悬剑》，这是她在 80 年代发出的警报。时至 90 年代，当人们庆幸经济软着陆、低通胀、高增长之际，她却写出洋洋 30 万言的《现代化的陷阱》，大声疾呼：中国正处在十字路口，现代化正面临危险的陷阱！陷阱究竟在哪里？权力没有受到分权制度的制约和纳入法治轨道，从而成了寻租的资本。制度缺陷的揭露和克服途径的探讨，是这部新书的基本线索。

今日中国朝野上下异口同声谴责腐败。贪污和贪污的潜在威胁是与政权的存在相始终的，差别仅在

于它是会受到及时和严厉打击的个别现象，还是已成社会风气的群体性腐败。中国当前的情况显然属于后一类。作者以确凿的材料证明，伴随 20 年的改革开放出现了以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为特征的自发私有化——原始积累，形成了世界史上罕见的大腐败。

有人也许会说，站得更高看得更广一些，国有资产流失并不可怕。联邦德国不是把民主德国的有些国营企业以 1 马克的象征价格白送给私人吗？明治维新时期也以极低价格把国有企业卖给三菱等财阀，这些都是导致国家或企业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上述说法没有注意到中国平均每天流失的 1.3 亿元中，只有 30% 重新流入经营过程。在日本和德国白送或低价奉送的条件是私人要注资经营，既提供了工人就业的机会，又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反差如此巨大的原因在于他们的私有化是公开、依法进行的。而在我国，却是权势者所干的见不得人的勾当。于是，大部分横财或成了酒池肉林的养料，或逃往国外，都对社会进步无益。

这个权力资本化的更大危险是把中国现代化事业推入歧途。印尼、泰国、韩国、菲律宾当前正在苦苦挣扎的经济危机，说到底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内的官商勾结。端倪已见，沉重打击现代化进程的这类悲剧在中国出现的危险并未消失。同时，即使付出沉重代价后实现了经济的现代化，出现的很可能不过是“意大利模式”的又一变种。这一模式的特征是官、商、黑互相勾结；从总理到一般官员贪污受贿成风；黑社会横行，治安恶劣；分配严重不公，贫困

层很大；社会动荡，政局不稳。这一模式的幽灵早已在亚、非、拉各国游荡，对中国亦已成为巨大的威胁。

从中央到地方，几乎天天讲反腐败，也动真格处理了一大批贪官污吏，还要讲什么“陷阱”、“十字路口”，是不是哗众取宠，混淆是非呢？问题的严重性在于顶风作案者比比皆是。道德教育、惩办乃至杀头，虽不无作用，却无法根治。决定性因素在制度。人的行为归结到底是受制度（包括凝结在制度中的文化）所制约的。现代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建立一整套现代社会管理制度，不管姓社姓资，概莫能外。走出陷阱的唯一途径在制度改革。

作者一再强调，应该同一切现代化国家一样，“必须将权力尽快分离出经济领域，使政府由过去经济生活的主体变为仲裁者”。现代国家当然要调节和管理经济，但调节只能通过经济杠杆，管理的手段是法治。没有政府机构和相应的观念根本性的变革，真正把我们的政府变为“小政府”——以法治国的有限政府，权力的寻租活动就不可能根绝。改革的先导是观念。观念不变，寸步难行。不久前，有位“理论家”还把揭露权力寻租看作是否定政权的作用，提倡“自由化”！此事的艰难，可见一斑。

作者还指出，今日的改革已不可避免要触及非经济领域。例如，如果我国的国有银行的活动及其干部的升迁仍然在地方党政一元化的领导之下，经济活动的主体必然仍然是当地的党政，“交学费”的剪彩工程和分利活动必然连绵不绝。

有法不依是当代中国的重症。症结仍然是制度。如果法官的任免和法院经费要听命于党政机关，司法独立只是一句空话，权大于法——“领导亲自关怀”的人治就无由根绝。值得高兴的人大九届一次全国会议上有的代表也尖锐地提出了如何保障司法独立的种种问题，关注的人多了，就有解决的可能。

20年的改革开放增强了综合国力，也让中国人眼界大开。过去的发展与失误都与制度息息相关，提高制度改革的自觉更是争取今后发展不偏离正轨的关键。这是读这部新书的最重要启示。

原载《羊城晚报》1998年4月2日



## 个人主义的无罪辩护 ——读《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

---

个人主义在中国已蒙冤受屈半个多世纪。党政要员，平民百姓，大都视之为“万恶之源”。学界中虽然理解者日增，抨击之声仍不绝于耳。如何正确理解个人主义的内涵及其社会效应，这是关系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钱满素教授的《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三联书店 1996 年版，以下引用此书只注页码），初稿是她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不是辩论之作，但对这些问题作了淋漓尽致的剖析，读后深受启迪。

### 三缺一意味着什么

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学者大都认同，现代社会的所谓现代化主要包括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个人主义三个方面。这个观点虽然迟至本世纪60年代才由美国社会学家柏森斯完整地提出，但它是17世纪以来的历史经验的总结，理论渊源亦可从文艺复兴时代算起。

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质是经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次史无前例的大挫折后，重新睁开眼睛看世界，学习和重建现代性的过程。经过20年的实践和辩论，这些现代性在中国的命运如何？

尽管离“与国际接轨”的要求还很远，市场经济的重建，成效最为显著。从1992年起，已名正言顺成为基本经济制度了。

最为奇特的是民主政治。从名份上说，它一直是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原配。各式红头文件和政要的口头禅，从来不乏“实行民主”、“发扬民主”等字眼。至于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朝野上下，海内海外，均心知肚明。不过，既然名份就在，循名责实，仍然有话可说。

最可怜的是个人主义。在某些人的笔下和嘴边，它从来是“万恶之源”，绝对“必须批判”。甚至睿智如杜维明教授，亦认为个人主义是西方的迷误，并非有普世意义的现代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反思个人主义”？

头一桩应该考虑的是鼎足而立的现代性，三去其一，会带来什么后果？

波普、罗素都认为个人主义的源头在古希腊。但正如钱满素所说，这是个现代的概念，它的直接来源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千万不能把个人主义混同于“自我中心”或“自私自利”。因为“个人主义是直到近代才从西方文化中演进出来的一种现代观念，而‘自我中心’或‘自私自利’则从人类可记忆的时代就存在了”。（第197页）不同国家的不同思想家对个人主义有过不同的阐释。寻章摘句，痛予驳斥，是最廉价的寻求精神满足的方式。可是，历史面对的一个无法逾越的课题：任何国家要走出中世纪，实现现代化，首先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即让国民从顺从的臣民变为自由、平等的现代公民。他们应有高度的人的尊严和充分的自由、自主权利。这就是个人主义的历史内涵。<sup>①</sup>

换句话说，个人主义不仅是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实践问题。准确地说，它是人的解放历程及其权利和尊严的理论概括。“从中世纪到现代，西方的个人经历了一个逐级的解放过程，先是从神的权威下解放，再从人的权威下解放。换句话说，人本主义是第一阶段，紧接着就是个人主义的第二阶段。最终，个人的神圣性终于成为习俗和法

---

<sup>①</sup>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所说的个人主义，指的是唯我主义（egoism），与国际学术界说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说的是不能混淆的两回事。本文讨论的是后者。

律”(第197—198页)。在现代西方社会,它已成为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无所不在的观念,以至有的学者把它的基本思想区分为:政治个人主义、经济个人主义、宗教个人主义、伦理个人主义、认识论个人主义、方法论个人主义,如此等等。<sup>①</sup>

不妨作个大胆和有中国特色的假设:在某个已经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发动一次强有力的“文化大革命”或文化运动,剿灭个人主义,而实行保护其他现代化性的政策。结果会出现怎么样的局面呢?

市场经济将逐步萎缩和消亡。市场经济的前提是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个人有充分的权利和承担相应的义务。没有敢于和能够抗击侵犯其尊严及合法权益的独立的个人,没有自主和自由的竞争精神,就不可能有正常的不断发展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发育和成长,必须以人从各种前现代的非经济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条件。看看中国的实际吧。如果公民仍是“驯服工具”,何来市场经济?后者的复兴,不是以前者的自主、自由权利的恢复为条件吗?目前的种种困扰,说到底也与人的解放过程仍未完成息息相关。结论只能是,消灭个人主义就是消灭市场经济。

人们一再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一些国家和地区为

---

<sup>①</sup> 参阅史·卢克斯《个人主义:分析与批判》,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

什么法治比较健全？最重要的原因是那里的公民深受个人主义熏陶，有强烈的保护个人尊严和权利的意识。而在中国，法治屡遭践踏，归根到底也是由于公共权力还没有真正成为维护公民权利的工具。它或是仍然奉行权大于法的前现代原则，带头侵犯公民的权益；或是对公民的尊严和权利受损视而不见；而公民也还没有养成坚决维护自身权利的习惯。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也是，消灭个人主义，就是消灭了法治自身。

“现代民主说到底就是个人权利的法律化。”（第198页）“个人主义是对抗专制的最佳方式。……每个个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都是对犯有自大狂的独裁者的纠正。正因为如此，一切独裁者都反对个人主义，他们从来不喜欢老百姓把自己看作像他一样的个人。”（第231页）如果真的消灭了个人主义，冀图循名责实，把民主政治变为现实，无异南辕北辙。

由此可见，个人主义是现代性的灵魂，把它赶尽杀绝，实质是全面消灭现代性。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和法治的每一真正进展，都离不开个人主义或明或暗的支持。如果在中国公民的尊严和权利远没有得到应有尊重的历史时期，拒绝和抨击个人主义，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必然走入歧途，又一次招至不应有的损失和挫折。

### 晚清以来的历史经验

回顾一下晚清以来的历史经验，问题就更加清楚了。

中国人讨论个人主义，不自今日始。1877年，在法国学习的马建忠向李鸿章报告：西方政事粲然可观的基础是“人人有自主之权，即人人有自爱之意”。<sup>①</sup>薛福成也强调：“惟人人欲济其私，则无损公家之帑项，而终为公家之大利。”<sup>②</sup>后来他又重申：“人人之私利既获，而通国之公利寓焉。”<sup>③</sup>他们都是有所指而发。清帝国正在“借法自强”，可是，当政者不愿让臣民享有自主、自由之权。以经济领域来说，办工商企业实行的不是现代各国通行的登记注册制，而是批准制，非经地方大吏甚至朝廷首肯，不得办理。同时，他们迷信公家的力量，用官帑大办似乎可以立即强国的军火工业。即使批准公家或私人（多数是得风气之先的官绅）办一些纺织之类的日用品工业，也要附上一个条件，给予他们垄断权（通常是10年以上），不准他人办同类新厂。理由呢？有利于从洋鬼子手中夺回利权。也就是说，他们不顾有识之士的忠告，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剥夺了国民在经济领域的自主、自由之权。集体主义压制了个人主义。结果是：企业染上官僚病，除少数例，投产之日，就是亏蚀之时；甲午一战，一败涂地，国家——集体利益也成了泡影。

---

① 马建忠：《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适可斋记言记行》。

② 薛福成：《筹洋刍议·商政》，《薛福成选集》第54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③ 薛福成：《出使英法比四国日记·出使日记续刻》第586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

甲午战败后，朝廷承认了过去 30 年的道路走错了，官办企业“所费不貲，办理并无大效。亟应从速变计，招商承办，才不致有名无实。”新的道路应该是：“一切仿照西例，商总其事，官为保护”。<sup>①</sup>与西方接轨。在 20 世纪第一个 10 年，更以西方大陆法系为蓝本，建立了现代经济法律框架。辛亥革命后，北京政府承袭和完善了这一套法律体系。经济领域的个人主义大体上已被认同，但角力并未结束。

清帝国经济方向的转变，是实践的教训和几代启蒙思想共同努力的结果。对鸦片战争后 50 年的历史作出最精辟的总结的是严复。他把中西富强反差如此巨大的原因归结为“自由不自由”五个大字，而高举“身贵自由，国贵自主”八个大字为奋斗目标，达此目的的道路则是自利、自由、自治。具体说来是：“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顾处士曰：‘民不能无私也，圣人之制治也，在合天下之私以为公’。然则各私中国奈何？曰：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是道也，欲民之忠爱必由此，欲教化之兴必由此，欲地利之尽必由此，欲道路之辟、商务之兴必由此，欲民各束身自好

---

<sup>①</sup>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上谕），《光绪朝东华录》总第 3637 页，中华书局 1958 年版。

而争濯磨于善必由此。呜呼：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sup>①</sup>

严复在国家生死存亡关头挥笔写下的这几篇振聋发聩的雄文，提出了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两者是密不可分的）救中国的完整纲领。在现代中国，它是一组承先启后的极为重要的思想文献。“公车上书”前发表的这组文献，不但直接指引了戊戌前后的中国第一次启蒙运动，而且包括新文化运动在内的屡仆屡起的 20 世纪历次启蒙运动，按思想内容来说，大体上都没有超出它的范围。百年中国的历史经验还证明，这些思想是如此深邃和正确，顺之则昌，逆之则厄，屡试不爽。

还是以经济来说吧。有的学者曾感到困惑，为什么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对经济自由不那么关心。其实，严复对经济自由的关切是非常突出的。除了上面已经谈过的，他还根据达尔文和斯宾塞的进化思想，把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建立自由竞争制度融为一体：“顾富强之盛，必待民之智勇而后可几；而民之智勇，又必待有所争竞磨砢而后日进，此又不易之理也。”<sup>②</sup> 在他为《原富》中译本所写的按语中，又一再重申了这类观点。当清帝国和民国初年的政府采纳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状况下，思想家们的眼光自然转向更为突出的政治、伦理、认识论等领域如何扫除中世纪专制意识形态的束缚了。

---

① 严复：《论世变之亟》，《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 1 册，第 2、17、27、31—32 页，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② 严复：《拟上皇帝书》，《严复集》第 1 册，第 65 页。



20世纪中国的新特点是：摧残公民的权利和尊严的专制主义，披上了一套革命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集体利益等等极为华丽的外衣。

就理论的鼓吹而言，这是由孙文开其端的。辛亥革命后，他一再宣扬要限制甚至取消个人自由：“在今天，自由这个名词究竟要怎么样应用呢？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sup>①</sup>他没有执掌过全国政权，即使在他掌权的地区，权力也很不巩固，无法全面、彻底地贯彻这一主张，尽管如此，已经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

他是国民党（包括其前身）的创始人和领袖。在这个组织内部，他是有权有势的。在一再强调，在党内应该实行人治，而非法治。“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义而后可。”<sup>②</sup>而在他手定的党章中更明确规定：“总理有全权总揽本党一切事务。”<sup>③</sup>“总理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有最后决定之权。”<sup>④</sup>从而使自己成了高踞在党组织之上不受监督和约束的特殊人物。这种前现代的组织原则，立即遭到民主、自由观念较强的党员的

---

① 孙文：《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选集》第722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北京。

② 孙文：《致陈新政及南洋同志书》，《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2页，中华书局北京。

③ 孙文：《中国国民党总章》（1920年11月9日修正），同上书，第5卷，第402页。

④ 孙文：《中国国民党总章》（1924年1月28日），同上书，第9卷，第154页。

坚决反对。黄兴等重要领袖且因此坚决拒绝参加改组后的中华革命党，把一度生气勃勃的国民党弄得四分五裂。同时，这开创了反民主的政党组织的恶劣先例，把现代中国的政党政治引入了歧途。

更为严重的是，他宣扬的要国家自由，不要个人自由的错误理论，被蒋介石等人所继承和利用，成了推行全能政治，实行专制统治的理据。蒋氏不但按照孙文的腔调，一再要别人“不讲个人的自由平等”，<sup>①</sup>而且运用政权力量，取消了言论和出版自由，建立了严密的控制和监视公民的网络。据说，这些都是为了国家、民族和革命的利益。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伦理道德全面破产。

蒋介石的专制统治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垄断资本经济。这也可以从孙文的庞杂甚至自相矛盾的思想中找到渊源。在孙文的经济思想中包含着十分突出的空想社会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成分。除了不切实际的土地税计划外，作为晚年定论，他一再强调一定要“制造国家资本”，“发展国家实业”，即“交通、矿产和工业”三大实业，都“由国家经营，所得的利益归大家共享，那么全国人民便得享资本的利，不致受资本的害。”<sup>②</sup>除了华丽的外衣外，他实际是要重蹈晚

---

① 蒋介石：《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开学式上讲话》（1926年3月8日），《蒋介石谱初稿》第543页，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

② 孙文：《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选集》第842—843页。

清官办企业的覆辙。

要是说国民政府时期各方面仍然大体上保持着混合结构体制的话，人民政府统治时期则是公字压倒一切，近20年才有所改变。记忆犹新，不必言记。

政要们的选择出现这样那样的迷误，固足引人深思，更令人目瞪口呆的是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似乎也总是在盘山路上打转。从康有为开始，既讲日本变政，又对大同世界一往情深。例如梁启超、章太炎、章士钊、陈独秀、胡适、张东荪……乃至包括严复本人，几乎无一例外，在为人的解放、自由、民主、权利高歌之余、之后或同时，总是对形形色色的千年王国、无私天堂眷恋不已。把严复早期提出的“自利、自由、自治”吟咏终生，无怨无悔的思想家，寥若晨星。

于是，一个不能不回答的严肃问题摆在人们面前：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令人惶惑的图景？

思想的惶惑来自现实的惶惑。一面是东西方的强烈反差刺激着他们的神经；另一面睁开眼睛看到的又非白璧无瑕的世界，社会冲突和危机，特别是血流成河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国的思想家们的双眼，还无力穿透彩虹与风暴交织、幽深与险峻同在的复杂图景。世界性的难题需要走在世界前列的思想家去解决，中国的文化土壤似乎还没有为这类巨人的出世作好准备。

与此同时，他们的脑后都生就一条与文化母体缠绵盘结难分难解的辫子。与生俱来的民族自尊把来自传统的文

化幻觉编织成东文文化救世曲的各种版本。而公忠体国等同于高尚、私欲与罪恶无异的文化积淀又足以构筑把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拒诸门外的思想堡垒。

不过，国号三变的 150 年历史已经给我们留下足够的经验教训。历史的行程已不容中国人再踌躇止步。当个人主义再次成为争辩对象之际，千万不应忘记历史的启示。

### 三大责难辨析

时贤对个人主义的责难，粗略概括，不外三个方面：

第一，不顾公共利益。

有的论著认为，提倡个人主义就是把国家、社群乃至家庭统统抛到脑后去了。这是极大的误解。其实，焦点根本不在要不要各种名目下的集体，而是个人在这些集体中的位置，以及这些集体是如何结合的。

孙文和其他许多大人物曾一再谴责中国人像“一盘散沙”，面对外敌，不能团结御侮。为此，孙文鼓吹以传统的宗族关系为基础加强全国的团结。<sup>①</sup> 这个建议值得重视之外，正好是中国人应该如何结合。传统的宗族是血缘和三纲为基础的结合，在这样的集体中，人际关系的特点是恭顺和服从长上。这是与现代公民和现代社会的要求格格不入的。

在与之相反的个人主义指导下，表面看来疑似一盘散

---

<sup>①</sup> 参见孙文：《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选集》第 674—677 页。

沙，但每一个都是独立、自主的公民，他们可以在自由、平等基础上结社，并依法尽纳税和服兵役等义务。这种现代公民自由、平等结合所产生的强大凝聚力，是绝对非恭顺的臣民和奴才的结合所可比拟的。

结合的方式总是体现着制度的性质。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人和制度。但有一条是确定无疑的：奉行个人主义的自由人的结合形式比较合乎人性和社会进步的利益，也比较容易不断改进，因而比已知的其他形式都略胜一筹。

对个人主义的指摘突出的一点是它与利他不相容。窃以为这是想当然的推论。请先看看事实：“美国人无疑在权利观念上是最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但在道德观念上恐怕是最典型的‘公共主义’者。据国际组织‘世界价值调查’1990年统计，82%的美国人至少为一个（平均2.4个）志愿公益组织提供义务服务，这个比例在德国为68%，加拿大65%，英国53%，法国39%，而日本与意大利名列七国之末，都只有36%。”<sup>①</sup>另一资料是：“据美国盖洛普民意研究所民意测验显示：年纪在14岁以上的美国人中，有占半数的人做过义工。”<sup>②</sup>两个材料虽有出入，但都证明了奉行个人主义的西方公民绝非与利他誓不两立的冷血动物。

这个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首先是奉行个人主义、自

---

① 秦晖：《“儿子到父亲家吃饭要付钱？”》，《南方周末》1998年7月17日。

② 《粤港周末》1996年10月12日。

由主义的国家和地区通常较早告别了中世纪，从而推动经济、文化达到较高的水平。比起仍在温饱线上挣扎的人群，他们往往追求更高层次的心理满足——以利他为利己。其次，孕育个人主义的基督教文化，本来具有强烈的博爱精神。再次，个人主义并不等于鼠目寸光。他们的政治家考虑公民的个人利益，建立了鼓励行善的税收制度。于是，各种慈善组织和非营利的基金会和服务机构如雨后春笋，那些号称集体主义的国家绝对无法望其项背。

第二，应该用东方文化修改和纠正。

这是上一责难的延伸。

自打开国门以来，形形色色的东方文化救世论便不绝于耳。在 19 世纪，叫“以夏变夷”。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梁启超、梁漱溟、孙文等人更大声疾呼，要以东方文化救世，不但救助中国，还要用之救助西方。

应该感谢这些思想家的善意和苦心。从长远来看，创造一个比西方更为高明的东方生活方式也许是可能的。没有多元的声音，意味着没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就会导致思想僵化，从而带来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这类现象，中国人见得够多了。因此，应该欢迎思想家不断探索，也许有一天真的能以东方的现代性修正或补充西方的现代性。

不过，20 世纪的历史记录还无法给予中国人这样的荣誉。

各种东方文化救世论奉献的主要是两种观念，一是以公代私，二是东方式的“和谐”或“天人合一”。

在中国，私和利与丑恶无别，已有几千年的历史。难怪中国人要一再出面修改个人主义。最新的说法是现代性可以在团队精神或人际网络中实现，不一定表现为个人主义。人总要以各种方式结成团队，联成网络。要问的是这是什么型号的团队和网络。如果是东方式的，其特性是尊长的权威、等级森严的服从。如果是自由人的平等结合，恰恰是西方个人主义的应用，那里谈得上什么取代和修正！

据说有了东方式的“和谐”与“天人合一”，就既不会有战争惨剧，也不会有惨不忍睹的环境破坏。可惜，这不过是 20 世纪中国人编造的最大神话。

如果花点时间去翻检历代东西贤哲的嘉言、语录，都可以找到和谐无上美满的教导。但是，一部世界编年史，无论东方、西方，都是满纸相砍相杀。一场太平天国战争，死去的中国人，萧一山在其巨著《清代通史》中断定为五千万，而葛剑雄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则是一亿一千二百万。<sup>①</sup>都高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如按葛教授的数字，且高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至于在 20 世纪连绵不断的内战中，中国人杀了多少中国人，恐怕是一笔很难算清的糊涂帐了。

说到要以东方文化——“天人合一”作为治理环境破坏的法宝，华夏儿女只能凄然苦笑。黄河已有近一半的时

---

<sup>①</sup> 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第 251、253 页，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间断流，科学家们正发出警告：如果不采取断然措施，十年内，黄河会蜕变为内陆河，也可能逐步消失，让后世的中国人只能从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名句中去想象黄河的壮美。而祖先拥有的本是林茂草丰的神奇土地。科学家们还告诉我们，长江也正面临成为第二条黄河的危险！让中国或东方思想去教训洋鬼子如何治理环境，不是为时过早吗？

如果愿意拒绝虚假的心理满足，中国人还有理由追问：“天人合一”是怎样从天人感应的神秘观念，摇身一变成为现代环境保护圣典的？作为严肃的学术工作，人们的华章巨构是不是应该注明从西方绿色和平的有关论著中汲取了什么？

### 第三，重蹈西方覆辙。

西方的发展绝对不是温馨浪漫的小夜曲，它无疑伴随着许多污秽和罪恶。但一些学者把西方的一些重大失误或转折中的无序状态归咎于个人主义，却未必是公允的。

指摘最多的是所谓个人主义奉行人类中心主义，因而造成了严重的环境破坏。世界面临严重的环境问题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可是，同样不能否认的是，正是这些个人主义者正积极地千方百计解决环境破坏问题，且已取得显著的成效。这有力地证明，与其说个人主义的本质导致环境破坏，毋宁说这是一定历史时期人们认识的局限带来的恶果。

人们还把犯罪率居高不下归咎于个人主义。与自给自足、活动半径很小的前现代社会相比，犯罪率必然随着市



场经济发展、人口流动频率的加大而提高，不论奉行什么主义概莫能外，至于犯罪过程显露的人性中的凶残、丑恶，自古就有，亦与什么主义无关。那么，是不是提倡个人主义，就会引起道德上肆无忌惮，而令犯罪率提高呢？“个人主义更不是为所欲为的许可证。个人主义同时包含了个人的权利和责任两个方面，”它只告诉人们：“个人权利是至关重要的，个人利益是合法的，但每个人必须服从一定的法则，作出自己的贡献。”（第230页）以维护个人尊严、自由和权利为基本内容的个人主义是道德高尚的标志，它有助于遏制而不是助长犯罪。

有人还把离婚率的提高和同居者愈来愈多说成是个人主义的恶果。这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两性结合的形式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从学术角度去考察，未婚者的同居多半是思想和经济的独立性越来越强的个人的自愿结合。在西方，这个家庭形式源远流长。深受中国人尊敬的恩格斯，与第一个性伴侣是在她临终前才补行婚礼的。著名哲学家萨特与伏波娃更是同居者的典范。对这种不可能禁止的新的家庭形式中国人急需认真研究，而不必轻率地谴责。说到离婚率提高，社会学研究已经证明，在中国很大程度上包含着妇女地位提高，敢于摆脱不合理的羁绊的因素；但近年来先富起来的那批人中喜新厌旧者也日渐增多。前者确是个人独立性增强的成效，而回应后者的最正确对策，仍是大力提倡个人主义，让弱者坚强地站起来，自立、自强、坚决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权益。

有人说：个人主义在西方也已过时，一再受到批判，再提倡它，十分不合时宜。在西方非议个人主义的声音的确不绝如缕，在多元的开放社会中，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何况个人主义自身也需要在批评的声浪中充实、发展和改进。不过，如果把这个现象理解为个人主义已经过时，那就大错特错了。

钱满素博士的一段鞭辟入里的议论是最好的答复：“在民主国家里，个人主义的基本精神不仅已被普遍接受，而且被机构化法律化了，因此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个人主义已经过时。但是怎么能设想一个没有个人主义的现代民主社会呢？浪漫主义是感情上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是思想上的个人主义，多元化是社会领域的个人主义，放任主义是经济领域的个人主义，民主则是政治上的个人主义。……它不仅被法律化，而且成了一种生活方式，表现在人们的习俗举止上”。（第228页）在中国，个人主义正大步向我们走来。任何行政措施和语言暴力都无法阻挡这个历史潮流。它是现代化事业的孪生子，是现代社会的精神支柱。你要现代化，就不能不要个人主义。谁打击个人主义，就是打击现代化伟业，逆历史潮流而动。百年中国联翩而至的挫折都与没有完成人的解放的历史任务息息相关。不应忘记严复百年前的狮子吼：“身贵自由，国贵自主。”后者已成现实，前者恐怕也无法拒诸门外。

1996年7月初稿

1998年7月改写

## 这些官员和报刊的法治观念 到哪里去了？

---

今年1月22日《光明日报》第四版发表了该报记者采写的通讯：《为了四十一元钱的“公道”》，说的是建国以来邮电部门首起官告民案，历时4年，以民胜官败告终。全文支持正义，读来深受鼓舞。令我惊诧不已的是这篇专讯竟以这么一段文字结束：

“内蒙古高级法院还透露，包头市委已对此案的责任人员作出处理：青山区法院一审审判长、包头市中院二审审判长给予行政记过处分；对负有领导责任的包头市中院副院长、

包头市中院原民事审判庭庭长、青山区法院原民庭庭长等3人给予行政警告处分；对负有领导责任并由于不能正确对待舆论监督而造成不良影响的青山区法院院长给予党内警告、行政记过处分，免去青山区法院院长职务。”

中共包头市委对干部严加监管，当然是对的。但它的决定除党内严重警告一项外，都是违法的。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在地方两次人民代表大会之间，如果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人民法院院长需要撤换，须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报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这些法律是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违反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也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显然，中共包头市委的决定既违反了国法，亦触犯了党章。它发觉自己管辖的党员干部不适宜担任这些法院职务，可以建议人大或其常委会依法罢免，但无权越俎代庖。此外，“行政警告”、“行政记过”亦是行政的权力，中共党组织可以建议而不可决定的。

问题的严重还在于人们对这些现象熟视无睹。以这篇通讯涉及的方方面面来说，消息是由内蒙古高级法院（官员）透露的，可见，这些法院官员已见怪不怪。通讯由中

央大报的记者采写，经过中央大报内部层层审稿，郑重刊出，该报居然没有人察觉这个违法现象。法治观念在这些官员心目中如此稀薄，叹为观止。

没有法治就没有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也不可能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法治能否建立的关键何在？在各级官员知法守法。为此必须千方百计开官智，让他们懂得，此事关系现代化大业的成败和国家的盛衰，千万马虎不得。在这里，舆论导向，极端重要。通讯发表快两个月了，如果中央这家大报仍未察觉这一导向性的错误，更证明此事不可等闲视之。

民主与法治的重要，近年传媒竞相宣扬，人们耳熟能详。但中国传统中偏偏缺乏这两件法宝，要把口号化为实际，不可能靠上帝把它做成大馅饼送到每个中国人的嘴边。只能靠朝野各界认认真真，每事都问是否符合民主与法治。这种植根于公民权利与义务自觉的认真和无所不在的监督，是一切违法现象的天敌。都说人民代表大会是我们实行民主的基本制度。面对侵犯人大的法定权利，无视官员任免的法定程序的现象，中国人如果缄默无言，现代化事业就有再成泡影的危险。

原载《南方周末》1998年4月10日

## 闲话“实事求是”与“蠢蠢欲动”

许多中国人可能还没有认识到，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改革，其紧迫性绝不在国企改革之下。有心人在因特网上冲浪之余，关注一下身边事物，论据几乎可以信手拈来。考古学家可以在一块石头或一片破瓦上解读出百、千、万年前的文明信息，我们身边也有不少值得重视的信息载体。日前拜读一篇短文：《实事求是论历史》<sup>①</sup>，其内蕴之丰，亦令笔者大开眼界。这主要不是因为此文直接针对拙作《晚清

---

<sup>①</sup> 杨殷平、杨文：《实事求是论历史》，《读书》1998年第2期，第93-95页。

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一书，而是此文把学术与“蠢蠢欲动”连结起来。对“避席畏闻文字狱”的我辈说来，这涉及学术研究的基本准则，不是个人毁誉的小事，讨论一番，似非多余。

### 口诵“实事求是”的各色人物

“实事求是”与“蠢蠢欲动”是此文的两个关键词。百年中国，特别是近半个世纪，前者出现的频率甚高，其形象至大至刚，一出场，人们莫不肃然起敬。不过，此词已出现二千余载，利用者众，其中有的或别有用心，言行不一；或动机与效果参差；未必都是正心诚意之辈，亦未必臻家齐国治之境。

戊戌政变，改革大都中断。慈禧的一道“懿旨”，振振有辞：“际兹邪说暴行之际，自当以名教纲常为己任，以端学术而正人心……事无巨细，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皆当实事求是。”<sup>①</sup>另一“上谕”下令废新复旧，不准士民上书，禁办时务官报，已裁撤的腐朽衙门“照常设立”，最后也没有忘记把种种倒行逆施归结为“共矢公忠、实事求是”！<sup>②</sup>在大清帝国的最高统治层中，“实事求是”云云，竟成了阻挡历史前进潮流的遮羞布。

慈禧太臭，说个香一点的。这回是张之洞的故事。

① 《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总第4219页。

② 《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总第4204页。

1997年是中国的回归年。香港回归，普天同庆。但另一重要的回归，却并未引起普遍注意，甚至有关专业的学者也不甚了了。这就是新《刑法》通过和付诸实施而使现代法律的三项基本原则的回归。这三项原则是：罪由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当。在本世纪第一个10年，清末新政制订新的法律体系之际，已写进有关法律。不管是否真正施行，民国历届政府在法律条文上沿袭不误，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后来的解放区也沿用写有这三项原则的《六法全书》办案，直至1949年有关方面下令“以蔑视与批判的态度对待”国内外的现代法律后才被丢入粪坑的。<sup>①</sup>

当初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在日本学者协助下修律曾激起轩然大波，张之洞是激烈反对者之一。反对的理由就是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罪由法定”来说吧，“中国旧日律例中，如果审讯之案为条例所未及，往往援三礼以证之”，如果法律没有列为罪行的不叫犯罪，以经典为最高指示，科人以罪的千年传统就要中断。如此“全盘”反传统，那还了得！因此，“值此环球交通之世，从前旧法自不能不量加变易……然必须将中国民情风俗法令源流通筹熟计，然后量为变通，庶免官民惶惑，无所适从。”<sup>②</sup>用

---

① 参阅拙作《刑法变迁与20世纪中国文化的若干问题》，载张志林主编：《自由交谈》第一辑，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② 张之洞：《遵旨核议新编刑事民事诉讼法摺》，《张文襄公全集》卷69。



现在的流行话语来说，就是改革虽然需要，但不能割断传统、无视中国特色。于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成了抗拒现代文化普世原则的遁词。

“实事求是为成事要诀。”“所谓科学方法的基本，就是‘实事求是，精益求精’这两句话！”切莫以为这是摘引中共那一代领导核心或领导集体成员的语录，这是笔者多年前从蒋介石著作中抄下来的。前者抄自国民党中宣部编的《总裁言论选集》卷九第2205页，后者则是蒋氏《剿匪技能之研究》中的一句话<sup>①</sup>，都是可靠的版本。至于20世纪上半叶，蒋氏如何“实事求是”治理中国，中国人大都耳熟能详，毋庸再费笔墨。

那么，“实事求是”到了革命者或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情况会不会根本改观，带来的都是正面效应呢？这也未必。众所周知，延安整风是以实事求是为旗帜的，且在组织上确立了“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的制度<sup>②</sup>。但就在1943年4月3日作出的《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中竟断言：“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sup>③</sup>于是，“治病救人”要紧，来个“抢救失足者”，结果是制造出大批冤假错案，有的直至80年代才平反。“大跃进”恐怕是空前绝

① 见张其成编：《总统蒋公全集》，第676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31页。

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162页。

后无与伦比的主观主义恶性大发作的典型，但在开其端的南宁会议上，仍然打着“实事求是”的旗号：“全党提起干劲，打掉官风，实事求是，与人民打成一片，肃清一切作风上、工作上、制度上的错误。”<sup>①</sup>

百年历史清楚地说明，在实事求是的美名下，既可做出济世安民的业绩，亦可干成祸国殃民的勾当。上面说了一大堆闲话，无非想为看官提供一点资料，不必看见招牌上写着“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便屏气敛迹，肃然起敬。名要成实，有许多必要条件。“实事求是论历史”当然是件大好事，但同样要具备好些必不可少的条件。且不说客观条件，仅从治史者本身来说，对所论史事的全局和当时的世界大势不说了如指掌，至少也应有基本的了解，这是史识的基础。更重要的似是应严格遵守学术规范。例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务须证据确凿”。这两条是绝对不能违反的，如果明知故犯，很有可能被人疑及史德。

### 三种奇特的思维方法

具体看看杨先生怎样“实事求是论历史”，倒是能领悟好些不容忽视的信息。在我看来，有三条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第一，口说“实事求是论历史”，“务必证据确凿”

---

<sup>①</sup> 中央文献出版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24页。

者，居然不提供任何证据，就可作出判断。

讨论的问题是鸦片战争后不断发生至义和团事件后才止息的驱赶洋人的事件之一：福州神光寺事件。《实事》（即“实事求是论历史”，下同）一文说：“事实是，《南京条约》签订八年后（道光十年），林则徐因病乞休返籍期间，适遇英国人违背与地方达成居留城外的约言……强居城里乌石山上神光、积翠二寺。”

怎么证明英国人“强居城里乌石山上神光、积翠二寺”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呢？作者没有提供任何论据。积翠寺住的是英国领事李太郭，那是按照 1842 年中英江宁条约规定“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指通商的五口）城邑”租住，当时朝野上下亦不敢公开坚决反对，根本谈不上什么“强居”或“占用”。

神光寺的情况比较复杂。按照江宁条约的中文本，只准洋人的官员住“城邑”，其他英国人则住“港口”，但英文本无此区别，因此双方各执一词。具体说到神光寺，租住的两名英国人，一是医生，一是“讲经人”。英方曾“将租约送侯官县用印”，县官“即于租约内用印交给”<sup>①</sup>。手续完备，“强居”、“占用”云云，也不知从何谈起。

笔者在这里列举的都不是什么冷僻史料。写史学文章而不查阅有关史料，这不是咄咄怪事吗？

第二，口称“实事求是”论中国近代史，却不冷静地

---

<sup>①</sup> 徐继畲：《松龕全集》奏疏卷上第 18 叶。

区分民族正气和狭隘民族主义情绪。

《实事》一文说：“林与乡人共议驱英于二寺，也是出自爱祖国文化、亦家园深情所致吧，使之不致落入强人之手，不致被破坏，并非无端寻衅刁难外国人，更不是像《晚清》一书所说‘告老在家的林则徐为首一派’、‘摆出不惜为此一战的姿态’云云。”作者还宣称：“被侵略国家人民最具有民族意识和反侵略精神的，很自然地会作出些强烈反应。我们认为，这样的万民公愤就是‘同仇敌忾的民族正气’，无论如何也安不上‘群众性的排外行动罪名吧。’”

被侵略的落后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往往会对外来事物，特别是来自侵略国的事物，不分青红皂白，“作出些强烈反应”。这是屡见不鲜的历史现象。而这些国家面临的历史任务是既要反对侵略，又要承认落后，向那些先进国家（包括侵略自己的）学习。因此，为了被侵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知识分子必须以批判的眼光，谨慎地区分反侵略的正义斗争与体现官员和民众群体性愚昧的盲目排外蠢行。如果不具备区分两者的常识理性，而要“实事求是论历史”，非陷入南辕北辙的困境不可。

时至今日，即使仍然坚持赞扬义和团事件是一大“革命高潮”的史家，也认为团民割电线、掘铁路、毁学堂、乱杀洋人和“二毛子”的盲目排外行动是错误的。可见，此类“万民公愤”并非“就是同仇敌忾的民族正气”。至于鸦片战争结束后和平时期的各种驱赶洋人的事件，支持

者固然大有人在，林则徐亦是其中之一（其主要组织者和支持者道光皇帝和其他对世界现状缺乏深切了解而坚持“严华夷之辨”的官绅，无知小民不过是被利用的工具）；反对者则是当时思想最为开放的早期维新派（郭嵩焘、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人）和洋务官僚（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两者之间的是是非非，一言难尽，拙著已详加剖析，只好请有兴趣的读者费点时间去翻阅了。

林则徐当时是不是“摆出不惜为此一战的姿态”，他的举动是否妥当？当时的福建巡抚徐继畲向皇帝报告福建官方与林则徐为首的绅士之间的分歧时说：“臣等若扶同绅士调兵演炮募勇，一经各夷侦知，势必信致香港，该夷因此藉口，是以小事而堕其奸计，臣等何肯出此。且回忆从前军兴时，各省招募水陆乡勇者不下十余万人，帑金之耗于口粮者不下数百万两，然卒不闻何处得一乡勇之力，而易聚难散，沿海地方数年来盗贼之充斥，半系乡勇流毒。”<sup>①</sup>林则徐等人为驱赶两个英国平民一要调兵演习炮火，二要募集乡勇，扩大军事力量，如果不是准备打仗，难道是闹着玩吗？

福建官方，顶住压力，没有听从林氏的极端主张，稳妥地处理了神光寺事件，换来“民夷两安”的局面，没有授人以柄，办了一件福国利民的好事。这表明写出《瀛寰志略》的徐继畲的见识已比林则徐高出一筹。

<sup>①</sup> 徐继畲：《复官绅意见不合疏》，《松龕全集》奏疏卷上第28叶。

不过，徐氏也有封闭的一面。例如，他密饬“官员”授意“有关人士”以“士民公议”的形式宣布：“如有敢与夷人修理寺屋者，即捆送重惩，并将其住房拆毁”，并令民众“不准赴该寺听经就医”。英国人想购买台湾煤炭，这本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他却认为“台湾非通商之地”，且台湾“鸡笼山为全台总脉……久禁开挖，以培风水！”他还下令有关文武官员，“时时密查，如有私挖煤炭者，立即杖毙，以杜勾串夷人之渐”！<sup>①</sup>

林、徐的言行都不仅是个人的失误。这是 19 世纪中国传统文化封闭性的体现，也是中国法治传统极其薄弱，假借“士民公议”，公民权利就可随意剥夺甚至“立即杖毙”的可耻记录。“文化大革命”的暴行为什么畅通无阻？近 20 年开放与反开放的斗争为什么那么复杂？“实事求是论历史”不难发现传统与现代，不但无法截然割断，有时还难解难分。回顾百年中国史，中华民族自身的重大弱点之一是出于无知而盲目抗拒外来的先进事物。好不容易才换来开放及“与国际接轨”成了无法抗拒的趋势，如果摆脱不开狭隘民族主义的恋旧情结，让封闭思潮自由泛滥，有人说不定还会玩弄出一些千奇百怪的花样。

第三，在学术见解中竟解读出“蠢蠢欲动”！

据 1986 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蠢蠢欲动”是“指敌人准备进行攻击或坏分子策划破坏活动。”

---

① 徐继畲：《松龔全集》奏疏上第 23、20 叶。

作者显然是按现代汉语约定集成的贬义使用这个词。

两位作者是怎样察觉“敌人”或“坏分子”准备或策划破坏活动的？作者说：“近年蠢蠢欲动的‘脱离革命思潮’欲将近百年革命斗争史翻个个儿，历史人物也要重新定位。”

历史人物要重新定位本是学术史上常见的现象。新的史料或认识的变化都会导致对历史人物的重新定位。在当代中国，由于几十年“左”毒肆虐，积重难返，许多历史人物都被歪曲、丑化或溢美，弄清他们的本来面目，更为紧迫。胡适是历史人物，过去的定位是“买办文人”，“美帝走狗”，但观其一生，爱国和民主、自由的信念一直未变，不“重新定位”，行吗？王实味则是在40年代被砍了头的历史人物，罪状是所谓“托派”。查一查，纯属冤案，不“重新定位”又行不行？清代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是位杰出的历史人物，生前备受昏愤愚昧的士大夫攻击。在错误思潮影响下，时至20世纪80年代，有的史家仍让他头戴“投降”、“卖国”帽子，如不恢复其本来面目，我等吃历史饭的人真要愧对前人和后代子孙了。

再说所谓“脱离革命思潮”。对这个非常模糊的概念，作者没有作任何界定。众所周知，50年代以来对近代中国的研究流行一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张，具体说来则是以三次革命运动高潮为纲。三次革命指的是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这是一个历史学家的学术主张，既无法律效力，亦不是划分是与非的标准。学术领域在正常情况

下总是不断推陈出新，不承认有永恒的结论。可是，由于多种历史因素的汇合，这个学术观点竟被一些人视为独得马列真谛，有所触犯就是离经叛道。这既违反提倡者的初衷，也堵塞了学术正常发展的道路。因此，近20年间有不少史家在尊重此说是一家之言的同时，纷纷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对中国近代史作出新的诠释。其中最引人注目且已硕果累累的一个流派，提倡以从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为这个时期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有人简称之为以现代化为纲。这是不是就是作者要声讨的“脱离革命思潮”呢？

近20年间，以往对所谓三次革命的诠释大都受到严峻的挑战。太平天国的热烈赞颂者与批判者已形成势均力敌的两大流派。称义和团事件为伟大革命者虽未绝响，冷静地剖析其逆历史潮流而动贻害中华民族的主张则认同者越来越多。平实地分析辛亥革命成败的论文也日益增多。这些都是摆脱了“左”的羁绊后的学术进展。

应该正视一个问题：任何历史事件是不是只要宣布它是革命，就不容质疑呢？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无疑是人类历史的重要里程碑，二百年间，对它的批判性分析连绵不断，写出了不少影响深远的论著。例如托克维尔深刻地剖析了“从刚刚推翻王权的民族的腹部深处，突然产生出一个比我们列王所执掌的政权更庞大、更完备、更专制的政权”的复杂因素，揭示出自由与平等、理论与行



为、旧与新等等的内在矛盾。<sup>①</sup>他和其他思想家对这次大革命的批判性的研究成果深刻地改变着人们对自由、平等、民主等重要问题的认识。说革命只能歌颂，不准以批判精神缜密地审视，人类思想文化进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生长点就被摧毁了。革命或其他急剧的社会变动，本是文明与野蛮、智慧与愚昧、善与恶……的最充分的展示，史家如不留下真实的记录，不认真分析反思，不仅失职，也意味着对良知的亵渎。在这里，判断的标准应该是真还是假，全面还是片面，是否“脱离革命”，不是学术应予考虑的问题。有些事件是否称得上“革命”，就极富争议性。何况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后，有些武装革命时期的旧经验如不坚决“脱离”，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以阶级斗争为纲、吃大锅饭……中国人为了脱离这些革命遗物，付出了多少代价！判断应是研究的成果，而不是先验的不容置疑的框框。“光也讳，亮也讳”的阿Q式愚昧，与现代史学是格格不入的。

### 精神贫困及其根源

百年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苦难，却没有像法国人那样留下发人深省的论著，中国学者至今仍未能写出震撼人心的历史哲学。如是的精神贫困，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和对人类的欠债。

---

<sup>①</sup>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240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不要责怪中国学者无能。近半个世纪的“不断革命”，长期的封闭，除少数特立独行之士外，灵魂都不能不受到程度不等的扭曲。惶恐不安的心灵，贫乏的思想文化积累（缺少自由交流，加上经济贫困的恶果），不可能产生意气纵横、震古铄今的著作。更值得重视的是一种奇特的文化氛围已经成了学术文化正常发展的绊脚石。

《实事》就体现了这种奇特的文化氛围。

首先，学术文化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政治的附属物，一看到自己不熟悉的学术观点，立即想到“蠢蠢欲动”的阶级斗争新动向（顺便说说，有些等而下之的文人甚至立即向有关部门举报，争功邀宠）。

其次，凭片言只语，甚至没有读过有关著作，可以立即“闻出一种感情倾向”，讨伐也接踵而至。一个无法辩驳的事实是，《实事》的作者根本没有读过《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否则，就不会把资中筠教授的概述当作《晚清》的原文，也不会对长达16页的对神光寺事件及林则徐与徐继畲之间的分歧的分析毫无所知了。

再次，不讲逻辑和学术规范。文章说的是神光寺事件，有关史料颇丰，也不难找。可是，作者拿出的唯一论据是竖立在弥陀寺前的碑文，它说的是1876年的事。以此证明1850年的事件，已叫人拍案称奇；更令人忍俊不禁的是：此碑不过是近年刚刻制的，作者竟妙想天开，冀图据此判断一个半世纪前的史事和人物的是非。

《实事》虽非学术论文，也体现着作者的学养。笔者

无意苛责作者，他们不过是不合理的教育制度的牺牲品。

在现代社会中，大学是独立的。它不但要传授知识，更要创造知识，创造思想，更新文化，陶铸现代公民独立自主，绝不侵犯自由、法治的人格。它的灵魂是学术自由。可是，一茬又一茬的当代中国人在官本位社会中成长，耳濡目染的是领导指示、思想统一、政治第一，什么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诸如此类的现代教育常识都是“不合国情”的右派“自由化”言论。习非成是，他们想的、说的、写的和其他行为举止，很难超出已经成为思维定势的社会规范。

现代化事业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只有工具理性缺乏自由思想的人不是现代公民。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国人的创造力不充分释放，中华民族就只配永远疲惫地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苦追。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一再证明，在学术和思想自由没有受到真正尊重的国度，不管如何高举爱国主义大旗，也无法阻挡最优秀的青年才俊源源外流。中华民族不应长期忍受戕害民族生机的大失血。

令中国人脸红的是，在20世纪中国仅在新文化运动前后10年左右的时期里基本上享有这种思想和学术自由。自从国民党在20年代首倡“党化教育”、“三民主义教育”以来，大学和整个文化教育就陷入了在政治淫威下挣扎的困境。人们说要“超越五四”，但他们没有注意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本质是建立了一个思想和言论自由、兼容并包的现代文化教育制度的雏形。奢谈超越还为时过早，当务

之急是继承和回归。一些学人以新文化运动领袖们某些言论的偏颇作为超越论的主要论据。其实，世上从未有过通体发亮、句句是真理的圣人。这个时期初步形成的自由争辩和互相制衡的制度，恰恰是消解偏颇的负面作用的良方。而以自封的真理去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其灾难性后果，中国人则记忆犹新。

戊戌前后也有过一次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它肇端于甲午战争失败后的 1895 年，延伸至 20 世纪第一个 10 年。比较戊戌与五四前后的两次文化运动，如果单从弘扬新文化、批判旧文化的内容而言，后者提出的问题和主张几乎都可以在前者的出版物中找到。批判儒学；提倡人的解放和民主、法治；提倡新道德；主张文字和语言统一，进行诗歌和小说革命；提倡科学，比较中西文化，批判传统的思维方法……先驱者在戊戌前后甚至更早展示的思想亮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重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戊戌启蒙运动的继承和更猛烈、更深刻的重演。历史任务没有完成总会顽强地重现。但两者亦有重大差别。首先是前者不得不借重官僚和外国势力的庇护。特别是在戊戌政变后，稍有生气的报刊和其他出版物仅能在租界、港澳和日本等地生存。而在新文化运动中新闻、出版事业已成为社会生活中独立的不可缺少的行业。其次，新文化运动已有以北京大学代表的现代大学为基地，与戊戌前后仅有仍在官僚控制下处于萌芽状态的高等教育——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京师大学堂等不可同日而语。

这两大差别都是制度性的。随着这两大变化而来的则是知识分子已成为稳定的社会群体，在学术和思想、言论自由的制度保障下承担思想文化更新的重任，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学科和艺术。对学术著作喷涂“蠢蠢欲动”之类蠢话的年代应该结束，基本途径是建立现代文化教育制度，在高等教育中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大学制度。这是深化改革中不应忘却的重要角落。

1998年4月16日

## 编后余绪

编好，校完，还想说几句。

两个儿子，各有所长，无所偏爱，挺公平的。文章可不同啦，有的篇章总是牵肠挂肚，撩动心思。

在读《天朝的崩溃》以前，我不知道有位青年史家叫茅海建。可能在某个学术会议上见过，但没有留下一丝一毫印象。1995年夏天，他托人带给我这部长达600页的巨著。同好些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朋友一样，读来一再为他的深邃思想和严谨史笔所震撼。“十年内不必再研究鸦片战争了。”“研究也白搭！”这是一位友人亲耳听到的两位优秀史家的对话。也许有点情绪化，说得过于绝对，但的确表达了不少研究百年中国的学者对这部杰作的强烈感受。不言而喻，学术观点不可能也不应该统一，当时也有朋友对此书颇有微词，那是很自然的。

可是，过了不久阵阵冷风便从北方吹来。大道塞车，小道特灵。风传有人从这部学术著作中读出有严重政治错误！要组织批判了……如此等等。我怎么也想不通，人人

都有一个脑袋，有话可以尽情交流，自由辩驳，为什么有的脑袋总要自居特殊，一言九鼎？当年毛泽东一个脑袋代八亿脑袋想事，风云突变，四海翻腾……豪情消歇，别人替他收拾残局，有的损失已永远无法弥补。难道这些人比毛泽东还要高明？

因此，当还在编《读书》的沈昌文兄嘱咐为“天朝”写评论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书评还没有写完，老实巴交的海建兄来信劝我别写，免招麻烦。但生为男人，虽然其貌不扬，还是有点认死理的牛脾气。在为茅兄的诚挚感动之余，一口气把文章写完。但《读书》易帅，文章寄去，听说已制好胶片，仍是没有刊出。这就是此书第一篇文章的由来。

一叶知秋。这个小故事不过是90年代寒潮中微不足道的一丝涟漪。研究古代史的，可以从一块破瓦残砖读出千百年前的社会状况。“天朝”的故事蕴含信息恐怕要直观得多。

这是从40年代开端，“文革”到达颠峰的革命大批判的余波。一个国家，最可怕的是知识阶层出现群体性的愚昧。19世纪中国主要的蠢物孵化器是科举。20世纪下半叶生产同一产品的生产线则复杂一些。主要装置之一是革命大批判。在这一类“革命群众运动”中，各式人物都自觉不自觉地裸露自己的灵魂。殉道、无辜受难、逆来顺受、盲从、明哲保身……最恶心的是打小报告、吮痂舔痔、先意承旨、见风使舵、含血喷人！更有甚者，则深谋远算，

呼风唤雨！

中国的读书人，你为什么那么卑微、软弱、轻信、怯懦。……吝惜地只让顾准、张志新等寥若晨星的名字勉强承续着快要消逝的正气？中国的读书人，你又为什么那么凶狠、野蛮、无耻，却又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正人君子脸孔？难怪一百多年来，一代又一代启蒙大师总是苦口婆心地大声疾呼：改造国民性！

修心养性或许可以使某位个人改恶从善，但拯救不了已陷入愚昧泥淖的群体的灵魂。群体愚昧来自中世纪的文化积淀，而这些积淀通常固化在有关的制度上。拷问灵魂必须审视发展路向，而目光尤须聚焦于有关的制度。

说是厄先生作怪，气候是那么反常。卑微如笔者，不能不躲进蜗居，避灾远烦。小人物说制度，无关姓社姓资、姓中姓西、姓公姓私……高曾祖辈，圣哲贤人，对国计民生，已有详悉训示，我等毋庸置喙。小民企盼的仅是既能饱餐，又能自由思考、自由交谈的日子。毛泽东曾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郑重地向世界宣布：中国“将是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sup>①</sup>。

<sup>①</sup> 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10月8日。



什么是“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这就是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和免受恐惧的自由。今日的大学生和大学教师能完整说出的恐怕不多了，遑论他人。作出这些承诺时的毛泽东的心确实是与中国知识分子是相通的。

路标如果真的指向四大自由（在现行宪法中，仍然写得明明白白），指向毛主席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承诺，中国知识阶层自然将流露出无限欣慰。

遐想伤神。还是回到今日中国。“‘梁效’一声吼，地球抖三抖”的日子毕竟一去不复返了。仍有报刊愿意发表信口开河的大批判文章，但有更多的报刊和编辑自尊自爱，喜爱说真话的文字。小民无权决定新世纪是以2000还是2001为记，但引领以望新世纪降临的愿望却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扼杀的。

袁伟时

1998年7月24日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路标与灵魂的拷问

作者 =

页数 = 2 5 7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